

口述 Lucie

成露茜教授口述自傳

成露茜口述
溫洽溢記錄整理

本篇口述訪談，乃台灣大學政治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究中心所執行之「邁向頂尖計畫」的「中國學的知識社群」子計畫的成果之一。在此感謝計畫主持人台大政治系石之瑜教授授權使用。

時間：二〇〇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地點：世新大學舍我樓

溫：可否請您先談談家庭背景跟您走上中國研究，兩者之間有什麼樣的關聯？您的童年在中國大陸度過，哥哥姊姊也都留在中國大陸。這對您做研究是個方便呢，還是會有情感上的糾葛？第二，可否請您談談在美國所看到的中國

研究概況。

所謂的「中國研究」，我分成兩個部分來談：一個部分是比較單純的學術研究；另外就是美國的中國研究有其特色，把社會科學引進中國研究裡，這就不同於傳統的漢學研究了。費正清曾提到他當年在哈佛裡進行研究時，想辦法把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帶進來。以您在美國所受的教育，對於這部分有何看法？

如果是站在華人的角度來看，用美國人的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來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中國，有什麼優點，又會帶來什麼後遺症？

另外就是美國的社會機制對學術研

究的影響，有很多基金會會支持學術研究。這可能要講到兩個時期。尼克森是在一九七二年二月訪問中國大陸，但是您到大陸的時間比尼克森還早。我想以此作為分界點。在此之前，中國研究因為涉及政治，所以對研究者會不會有所不便？例如《翻身》的作者是比較左派的美國學者，他們在美國的中國研究學術圈會不會受到壓抑？在七二年之後，美國的戰略有了調整，對美國的中國研究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另外，您當初在推動學術交流計畫時，是如何居間聯繫？碰到什麼困難？美國的學生是抱持什麼樣的學習態度？美國學者在中國做田野調查時，有什麼

困難？

以您跟大陸官員的接觸，會如何評價中國的領導人？中國從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以來，走到目前這個局面，您有什麼看法？當年美國懷抱理想的左翼人士看到現在大陸整個往右轉，心裡有什麼樣的矛盾和衝擊？

成：因為我父親去世的時候，我寫過一篇文章，後來大陸還重印了這篇文章，標題叫做〈海天遠隔 日夜夢牽醒〉，裡面提到很多關於我父親對我的教育方針，他是怎麼教我的。

最重要的一點可能是，我們這些小孩子都是被潑冷水長大的。我父親很少稱讚我們，像是我們考上北一女，或是台大，大家都來恭喜，但是我父親就會說，這完全是「蜀中無大將」。如果我們得了個第一，父親就會說，像你這樣的程度也可以得第一，那現在台灣的教育實在是太差了。基本上，父親就是這個論調。

我覺得這個在我們當中產生的效果之一就是，我們都不斷想測試，到底要做什麼樣的事才能得到他的稱讚。父

親會讓我們覺得這個還不夠、那個還不夠，但是父親也從來不說，你應該很努力或是什麼的，他也不這樣講，可是你可以看到他工作的那種執著、那種精神，因為我們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就知道，他就是一天到晚工作的人，從來沒有說出去玩什麼東西的。

我記得我五、六歲的時候，我們在北平。我父親是有《世界日報》、《世界晚報》，通常他是等報紙降版以後他才回家，那個時候我們已經睡覺了，早上我們去上學的時候他還沒起來，我們放學回家他在弄晚報，所以根本都見不到面。

可是每天一定有一個鐘頭，他會跟我們在北平的中山公園見面。有車子到家裡來接母親和三個小孩到中山公園，那一個鐘頭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有人說父母應該多花點時間陪小孩，否則小孩長大會怎麼樣，我對此很不以為然，其實在一起的品質是最重要的。

那個鐘頭，我們會坐在中山公園的來今雨軒，喝茶、聊天、吃花生，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全家都愛吃花生的原

因。父親就會講唐詩，然後大家就爭著背唐詩，他也會講他小時候各種各樣的故事。我覺得我們國學的基礎，其實是在這種情況下培養的。

所以我們到了小學五、六年級，都看當堅毅志錄之類的書。父親經常講，人要自強不息。自強不息是對我們的教育很重要的一個指示吧。我還記得我小學畢業時，父親題的字是「吃苦努力，一切靠自己。」父母、兄弟姐妹都只能鼓勵你向上，但不能保證你成功。

溫：那麼您父親對中國的看法對您走上中國研究，有沒有什麼影響？

成：我是家裡最小的，一般也是覺得父親最疼我。我常常在我父親身邊轉來轉去，就是這麼個小孩。他的朋友像是左舜生，常到家裡來聊天，我總是會搬個小凳子坐下來聽，聽懂多少也不知道，可我就是很喜歡聽他們聊天、批評時政、講些內幕，我覺得這個對我可能有很大的影響。尤其是後來父親參加了《自由中國》，比方說寫文章，或者討論可能造成的一些影響，那個時候我已經唸中學了，所以就有點理解。

我裡面也牽涉到一個父親教育我們的方式。我從小就聽他說，他的錢是他自己的，跟我們沒關係，所以我們也不要指望以後會有什麼遺產。他說他只是供養我們到中學畢業，讀大學的話，他可以繳學費，但除此以外，我們自己想辦法。那個時候我哥哥已經走掉了，我從中學的時候，就開始跟姐姐兩個人打工。

我們家是沒有零用錢的，要零用錢，就要自己去賺，從小學就是如此。零用錢哪兒去賺呢？可以到他那兒去賺，因為他有剪報的習慣，把報紙剪下來，貼在五乘八的白報紙上面，我們就去替他貼，貼一張一分錢之類的。到有一點的時候，就開始就可以做一些分類；再大一點的時候，開始就給他抄稿子，所以後來他替《自由中國》作的稿子，都是我跟姐姐和我給他抄的，所以我們對他的想法其實是蠻熟悉的。從小我們就知道，這些資料是很可貴的，這對我們治學的方法其實也有影響。

溫：您父親很強調自力更生、勞動創造價值的層面，這樣說來，他似乎偏

向左派？這對您後來到美國學社會學有沒有影響？

成：我父親當然是非常複雜的一個人。他最早是受李大釗的影響，進北大是李大釗介紹的，當時陳獨秀是文學院院長。

溫：當時毛澤東擔任圖書館員。

成：對！不過我父親對毛澤東的評價也不能說低，但他覺得毛澤東只是個圖書館員，當時我父親就是在北大唸書嘛。

溫：您父親曾參加李大釗的學會嗎？

成：沒有！其實李大釗很想吸收我父親進共產黨，所以我父親曾參加過一次聚會。我父親並沒有跟我講這件事情，不過因為我自己好奇，所以在《新青年》上找到兩篇他的文章，一篇是他翻譯《共產黨宣言》，另外一篇他是翻譯托洛斯基的文章，他用的名字是「成平」，這是他以前的名字。

他自己完全沒有跟我講這一段，我後來是因為大陸出了一本書，叫《世界日報興衰史》，有人把稿子給了我，要

我帶給我父親過目，看看有沒有什麼錯誤。我父親看到有一段，就說這是胡扯的。那一段在講什麼呢？說成舍我在北大唸書的時候，就是第一次去參加那個共產主義的集會，回來之後，就把帽子丟在宿舍的床上，說他完全不贊成共產主義，為什麼呢？共產主義就是，你的就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我父親說根本沒這回事，根本不是這樣。可是到底是怎麼樣，他也沒說。

因為我有整理我父親的口述歷史，他說他很感謝李大釗和陳獨秀。那時候他可能只有十六、七歲，他寫了文章講帝國主義，被李大釗看到。李大釗覺得這個年輕人很不錯。我父親因為家裡沒錢，只有小學畢業，沒有唸初中，所以他能進北大，都是李大釗介紹的。

溫：這對您後來從社會學走進中國研究，這段家庭背景有影響嗎？

成：這我可能要想想，因為我做些有關中國的研究，背後的心路歷程其實是很曲折的。我剛到美國，可能是寫第一篇文章的時候，發生了劉自然案。當時台灣這邊有反美，後來美國人就把

雷諾弄走了。我很生氣，我當時就讀夏威夷大學，因為我是大學二年級就去了美國。我用這件事寫了一個作業，批評「美帝」。但我並不覺得自己那時是左，基本上是民族主義的情懷。

在台灣，接觸不到毛澤東寫的東西。我在夏威夷大學的最後一年，開始在圖書館打工，所以接觸到很多大陸出的東西。而且念社會學也都會念馬克思，所以開始有接觸，這對我有很大的影響。

溫：您的家人在大陸，這對作中國研究會有什麼困擾或幫助嗎？

成：對我研究中國來說，最大的幫助倒不是留在大陸的家人，而是我父親的聲譽，或者是說他的人脈吧。因為我在一九七二年第一次回去的時候，周恩來就接見了我。我就是背了個書包就去了，這說起來也很傳奇。

溫：大陸那時准您回去嗎？

成：那個時候還沒有建交，但已經有乒乓外交了，不過美國人還是不能去。我就到香港的香港旅行社，表示希望能夠回去，找我姐姐跟哥哥。那人就

叫我填一個表，填完之後就送進去。然後旅行社的社長就從裡面出來，跟我聊幾句，問問我父親的情況。

我也不知道我的兄姐在哪裡，但是很有趣的是，我告訴父親說我想去大陸的時候，父親就跟我講，你哥可能老早在文革中死掉了，可是你姐因為一直都是共產黨員，大概還在，可能是在外交部。他說因為前幾年，中印邊界有糾紛的時候，印度人衝進中國大使館，當時法新社發了一張照片，有個女子站在大使館的門口，說這是中國的領土。我父親說，那個就是你姐。

所以我在填表的時候，地址和職位欄我就寫，哥哥不知道，姐姐在外交部。他們就說那找找看，就叫我等。我就在香港的YMCA住在兩個禮拜，都沒有消息，於是我就給他們打了電話，說如果再不給我的話，我就要回去教書了。他們就說，這樣好了，人我們還沒找到，那你先去好了。所以我就穿了藍衣服、買了一個書包，從羅湖就這樣走過去了。這趟旅行對我影響很大。

溫：怎麼說呢？

成：因為我覺得中國跟我去過的所有的國家太不一樣了，它有一個精神面貌，是我沒有見過的。

溫：所謂精神面貌指的是哪方面？

成：一個就是非常樸素，你幾乎看不出什麼物質的欲望，也沒有人談這些東西。

溫：這是因為您跟美國社會作對比？

成：那當然是。每個人好像都可以滔滔不絕，跟你講世界大事，同時都有一個論述。其實我是會把美國的社會運動跟中國的實際情況聯繫起來的。

溫：這正是我想請問的，您剛好經歷了六〇年代美國的狂飆運動，這會讓您對中國的社會主義有一種想像嗎？兩者之間有什麼聯結呢？

成：這個很複雜吧。我可能要從我自夏威夷大學畢業開始講。因為我是夏大社會學系的第一個博士，所以夏威夷大學就覺得，我要出去替他們打天下。因為系主任每年都會到「美國大陸」網羅人才，他去UCLA的時候，就把我的履歷給了他們，說這是我們第一個博士

畢業生，看看你們有沒有興趣。結果UCLA就把我的履歷丟到字紙簍裡，因為UCLA覺得自己是「十大」之一，夏威夷大學跟他們是不能比的，所以不可能找一個夏威夷大學的博士來教書。同時，UCLA又向另外的「九大」去問，有沒有好的人才可以推薦。

夏威夷大學有一個好處，因為地處海外，氣候很好，所以美國本土有很多大牌教授都很想到夏威夷大學來客座。所以我在夏威夷大學的那幾年接觸到很多客座教授，其中有一位是耶魯大學的教授。他就寫了信給UCLA，說我自己沒有什麼好的博士，可是夏威夷大學有一個人，你們可能有興趣，於是UCLA才看我的東西，問我要文章，後來就對我很有興趣，就叫我去面談。

我去面談的時候，有三個可能的人選，一個是哈佛大學，一個是西北大學，一個是我，前兩個是男生，只有一個女生。那兩個人，一個是拉丁裔，一個是黑人，都是從很好的學校畢業的。他們到UCLA，就只做了一個演講，跟大家吃了飯就走了。但是他們

要我做兩次不同的演講，然後他們的執行委員會，每一個人都個別跟我談，所以我在那兒待了三天，才回夏威夷。不久，我有一個哈佛畢業的老師接到一封信，是UCLA的系主任寫的，說這個職位我們很想給Lucy Hirata——我那時候冠我先生的姓。可是我們要確認她是不是會來，她的先生可不可能辭掉工作，跟他太太一起過來。如果他先生不能來的話，那這個職位我們就不給她。

對方要確認，我一定會接受這個職位，他才會給我這個機會。結果我的教授大發雷霆，那個時候正是民權運動盛行的時候，所以我的老師認為這是對女性的奇恥大辱，就回了封信，說你們要請的是Lucie Heirata，不是她先生。那你們有沒有問另外兩位男士，他們的太太會不會辭？如果你們沒有的話，我就要告你們，因為這涉及歧視。這把UCLA嚇死了，趕緊改口，說這跟我先生無關，我們還是要給他這個職位。這是我第一次親身經歷到性別歧視，對我影響也很大。

後來我到UCLA之後，在學校裡

大大小小的性別歧視、種族歧視，多得不得了，不勝枚舉，每一次當然都給我一個刺激。我在芝加哥第一次經歷到種族歧視，倒不是在學校裡面。芝加哥大學給我一個機會，到公立圖書館去做社會科學類的圖書館員，就得另外找住的地方。我當時住在大學的洛克斐勒大樓，室友是個黑人。我到北邊去找房子，看到空屋招租的牌子，就去敲門。一個白人開了窗子，就說房間滿了。明明有四、五家的門口有招租的牌子，為什麼人家都說沒有空房呢？我回來跟室友說，我找不到地方住，她問我是到哪裡找，我就告訴她，她說那地方是不租給有色人種的。那是一個工人階級的社區，不是很高級的住宅區，但那就是白人的區域。這也讓我嚇一跳，因為夏威夷好像不會有這個感覺。

那個時候，我的思想開始左傾，看了很多毛澤東的東西和文革的做法，很快就投身這些運動，而美國的一些運動都跟身分認同、歧視有關，我覺得有很多的方式是抄中國的，比如大學教授開始拒絕給分數，認為對於真正的教育來

講，分數是負面的東西，然後也開始鼓勵集體創作，而不是個人的創作。

溫：您指的是那個毛主義那個時代講求平等，打破階級的想法？

成：對！同時也是反個人主義。幾乎毛澤東講的每件事情，美國人都拿去用。因為毛澤東很多東西就是針對資本主義底下各種制度的批評，真有點對症下藥的樣子。在UCLA裡，就有這樣一批教授，很鼓勵學生批評教授。一個有自覺的老師就會讓學生批評，大鳴大放，打破老師跟學生之前的權力關係。當然，很多做法是有點天真啦，可是我覺得對學生、老師都有很大的影響，當時也有一些行動劇等等，反正就是大陸在進行的各種東西。

溫：您覺得這是美國人的實際和激進狂飆的天真嗎？這給您什麼樣的影響呢？

成：我覺得，這整個是給我的一個教育吧。我在美國這一段時間，是我個人在智性與政治上成長最大的時期……。

溫：這跟您關心婦女的地位、移民

的這種……

成：性別、種族、階級很複雜的勾連，這是我以前沒這樣想過的。比如我參加 Conscious Raging 的運動，差不多七、八個女性，背景各不相同，有的是工人、有的是大學教授、有的是學生。大家坐在一起講自己的故事，講到後來每個人都痛哭流涕的，那給你的衝擊是很大的。

溫：很像集體治療？

成：對！這讓你覺得你埋在心裡的疑問其實是政治的，是大家共有的問題，無論你是什麼階級，都有同樣的問題。不過有些會是各色人種都有的，有些只有有色人種的，甚至只有黃種人的會，感覺都不一樣。這會讓你理解其間的複雜性，雖然有其共通點，可是那個共通點是有差異的。

溫：在當時美國那種右傾的氣氛下，對於比較懷抱左派思想的教授，包括您在內，會受到什麼歧視或壓力嗎？

成：有兩件事情可以講，一個是教學，在教學這方面是受到很大壓力，可是那壓力很難說是因為你左，因為像

UCLA這樣的學校不會去懲罰一個比較左的人，而且在每個社會學系，如果沒有幾個比較左的教授，會被人家看不起的，所以總是要有幾個那麼兩、三個比較左的人，點綴點綴。在當時，比較左的老師比較受學生歡迎。我那時教了一門課，叫做「東亞社會」，是拿大陸、台灣、北韓、南韓、日本這五個社會作比較。修這門課的人非常多，總有一百個學生左右。但這門課後來也成為我不能回台灣的原因。

有個職業學生給我打了一個報告回台灣，所以我父親託人給我送一個條子，叫我不要回去，說回去很危險。所謂危險就是國民黨可能會在我行李裡面放一些毒品啊，說我販毒什麼的，反正叫我不要回去就是了，所以我就沒回去了。後來我要回去的時候，他們就不給我允許，就沒能回去。我最後之所以能回台灣，其實是拜美帝之賜。

這是個很有趣的故事，不過我們先講教學。我並沒有因為是左派而受到什麼明顯的抵制。我那時候還是助理教授，還沒拿到終身教職，一般人都會很

謹慎，但我也沒有很謹慎。倒是後來我已經升了正教授，我有個很左的同事，我覺得他是很了不起的人，不過並沒有升到正教授，那完全是對他的打壓。我自己的左是沒有受到什麼直接的打壓，可是左派的教授確實有受到打壓。這位教授本來跟我合開兩門課。一門叫做「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另外一門課叫做「馬克思主義方法論」。這兩門課在我離開之後，系上就把它取消了，所以我這個同事也沒能開。我在的時候，系上有四個馬派，現在只有一個馬派，我覺得整個美國現在是往右轉得很嚴重。

我覺得在教學上比較受打壓的其實是種族，我開始做亞裔研究的時候，負責主持亞裔美人研究中心。這整件事是個政治鬥爭，我那時要求學校開放有色人種的課程。講美國歷史不講華人，不講日裔，什麼都沒有，頂多只有一段。但是他們對美國的影響很大，美國對他們的影響也很大，這些卻沒有進到課程裡頭去。好像要講Be American Family，就只有白人的結構可以講，但是黑人、

華人的家庭根本跟白人的家庭結構是很不一樣的。所以我那時就一直在鼓動要有這樣子的課，帶領了一群人去抗爭，不斷衝擊學校的建制。

學校有一個專門討論課程的委員會，要開新的課，就要這個委員會通過。但這個委員會一直不給你通過，原因就是這個領域沒有文獻。沒有文獻、沒人做過研究，怎麼能開這門課呢？但我們說那就是因為你一直都不重視這個，所以沒人來研究嘛，那現在用這理由說又不能開課，那就是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永遠都不可能有的結果的嘛。我反正一天到晚就在那裡吵、在那裡爭，當時還跟校長拍桌子，弄得校長很怕我。

但那校長是個政治動物，這就講回為什麼我說自己回台灣是拜美帝之賜。我後來成立了一個環太平洋研究中心，但是有很多人反對，做區域研究、亞洲研究的人都反對，可是最後我還是說服了校長跟其他的人。

溫：別人反對的理由是什麼？

成：他們質疑什麼叫做「環太平

洋」(Pacific Ring)。我們已經有了區域研究，你可以研究中國、日本或亞洲，要不然就是研究拉丁美洲，可是什麼叫做「環太平洋」？

我當時的理由是，你們那種研究根本不能解釋什麼東西。你研究中國，就只是研究中國，可是中國為什麼會成這個樣子，是因為中國跟其他國家的關係所導致。這是一個世界體系，你不能只看中國，所以一定要有些人來研究之間的關聯。光是研究中國，有些內在的問題可以解決，可是你如果要看到中國之所以成為現在這個樣子，其實要看他與外在環境的相互關聯。這個環太平洋中心研究的就是彼此之間的相互關聯。所以，我不吃到你的地盤，可是你也不要反對我來做這個研究。

溫：所以您是挑戰他們既有的以國家主權為主的區域研究概念？

成：對。這個中心反正後來是成立了，但我走了以後又被他們弄掉了，那沒辦法。這個中心成立之後，我就負責學校從拉丁美洲到亞洲的交流活動。剛好當時美國在一月一號跟中國建交，我

們在一月二號就到中國，我們是第一個去的學校。

很快台灣就邀請我們過去，校長就問我說，你要不要去台灣，我說他們不讓我去，他說沒關係，你把護照給我，我就把護照給他。他就把我跟他的護照一起送到舊金山，他就說，“I don't go anywhere without Professor Chen”。台灣政府沒辦法，也就給我去了，可是很丟臉的是，他們給他簽多次入境，給我簽一次入境。這個校長很厲害，他根本就不要去台灣。我們到了台灣，一下飛機，就接到火車站的希爾頓飯店。進了飯店不到十分鐘，他就跟接待的人講，對不起，我剛收到UCLA來的電話，得馬上回去處理事情。所以在這裡所有的談判都交給Professor Chen負責，說完就走了。這邊的人就傻眼，沒辦法，只好就按著之前的那個行程安排。所到之處，他們一聽到我是成舍我的女兒，那當然都認識嘛，就說你父親跟我是朋友啊之類的。

我去台大的時候，當時的校長是閻振興。他一看到我，沒幾分鐘就掉眼

淚。他說，你常常去大陸，可不可以幫我找找我的家人，他離開大陸的時候，媽媽已經八十歲了，都沒有來得及見上一面，現在也不知道是怎麼了。另外他有個弟弟，也沒消息。我就說我想辦法，後來我真的找到他弟弟，母親已經去世，弟弟還改姓楊。我就讓他們兩個在香港見面，後來閻振興感激我得一場糊塗。後來他終於跟我講，我第一次回台灣到台大之前，政府有打電話給他，說等一下有個成教授會到你那裡來，你跟他講話要小心一點，因為成教授是共匪。

不過這次以後，我就常常回台灣，可是每一次回到台灣，一到機場，我的護照一送進去，就「嘩」地會響。海關人員就說，對不起，請你等一等，然後就到後面去，過了一下就跑出來，要你在旁邊坐一坐。我就在旁邊坐一坐，然後差不多過了十分鐘。就有一個穿西裝的人就跑出來，就說成教授您回來了啦，您父親年紀大了，以後應該多回來看看啊，反正就是有的沒的跟你講一堆，然後才放行。每次我離開，他們就

會去找我父親，通常是兩個情治單位的人，問我這次回來，有看什麼人嗎？有特別的事嗎？我父親說，我這個女兒小學的時候就翹家、逃走，她從來就是她幹她的。她不告訴我，我也不過問，就這樣。

溫：您剛提到左派的教授在美國所承受的不是制度性的壓力。如果要申請研究計畫，會排擠比較左傾的教授嗎？

成：我覺得美國……這也是我對民主政治很……

溫：反感。

成：對！這種資本主義下的民主，我是很不能苟同的。從學術界來講，因為主要都是採委員會制。這聽起來是有很程序正義的，可是委員是怎麼產生的，就是個大學問。就像我們這裡一樣，如果要升等，我找三個人審你的東西，如果我要你過，我要就找這三個人；不要你過，就找另外三個人。這是一樣的道理。

像美國這樣子的國家，其實他有相當的歧異、多樣，所以你可以選到三個左派的人、或者三個右派的人來看你的

東西。比如說我剛講的課程委員會是由什麼人組成的？比較資深的人會當選，因為是個選舉，由所有的教授投票。而左派就是個弱勢，怎麼投也投不進去，所以很有權力的委員會，左派是進不去的。

溫：政治局勢改變之後，有改善嗎？譬如尼克森訪問中國、中美建交之後，美國必須開始理解中共時，美國的學界有改善嗎？

成：改善可能是有一點啦，就連費正清的東西都有點改變了，對不對？有些以前很傳統的——這麼說並沒有貶義——像是《亞洲研究期刊》這些已經有地位的刊物，偶爾也會出現一篇有左派觀點的文章。不過，基本上不會有什麼改變。當時比較大的改變是出現《近代中國》（*Modern China*）這個刊物。這份刊物是UCLA的黃宗智辦的，他跟我是很熟的朋友。這份刊物之所以出現，是因為這一批研究中國的左派學者，他們寫的文章沒人要登啊，所以他就自己弄了刊物，我自己登。

這一方面是有改變的，可是我覺得

在一個很基本的層面上是沒有改變的。

比如說像韓丁（William Hinton）這樣的人，我在六〇年代末、七〇年代初在課堂上用了他的書，可是沒人會覺得他是個學者。我覺得韓丁的研究做得很棒，但是沒人承認他是個學者，所以學校請他去做個演講而已，沒有請他去當教授。

溫：這跟他帶有人類學的寫作風格有關嗎？還是因為他立場比較左的緣故？

成：你如果看人類學的一些著作，其實韓丁的東西很能稱為一個經典的ethnography。所以至少人類學可以找他來做教授。

溫：像美國這一套研究方法，您的評價如何？

成：在我唸書的時候，政治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強調的是量化研究。可是到了七〇、八〇年代的時候，量化研究已經被攻擊得一塌糊塗了。不過，很正統的社會學研究、期刊還是很重視統計、計量。

溫：可是當時美國學者很難去大

陸，那要如何做這方面的研究？統計數據的資料是怎麼來的？

成：所以社會學裡頭很少有研究中國的東西出現，像《美國社會學評論》這類期刊裡面也很少，到九〇年代才開始有一些，我要講的是，不是說完全沒有，可是基本上中國研究有個現象，這讓美國人有反感，比如說，誰能拿到資料？

華裔比較容易拿到資料，可是這個華裔的人也分兩種。一種是有關係的，一種是沒關係的，你沒關係還是拿不到資料。什麼樣的人是有關係的呢？我是其中之一，但別人認為我可以更好地用我的關係，但我不會用我的關係。在這方面得到最大利益的，是李政道的兒子李中清。他因為父親的關係，拿到了滿洲人口、宗族的資料，反正他一輩子都吃不完。像這種人可以掌握別人掌握不了的資料，等於是享有獨佔的地位。所以他的文章會在很多很正統的期刊上出現，後來有一些從大陸去美國的學者，因為以前的關係而拿到資料，他就用這個資料去寫論文。

溫：那麼美國人在做這方面的研究時，是不是也要養一些可以拿到資料的人，方便他做研究？會不會因為怕資料來源中斷，而不能站在客觀的立場做研究？

成：我聽到的、或者我知道的人，其實可以用剝削兩個字來形容。有些人來念博士，他的教授不懂中文，也拿不到資料，尤其是一些大型調查的資料。因為社會學都喜歡做調查，而中國是禁止外國人去調查的。所以通常就是要找一個單位來合作，由那個單位去進行調查。這就需要一些橋樑、關係。如果你本來是北京大學畢業的，在中國也有人脈關係，現在跟著美國教授唸書，教授請他做助理。那麼美國教授要做個調查，通常就給這學生安個頭銜，去替教授安排，做些蒐集、分析資料的工作。美國教授當然有他理論架構，最後會把文章寫出來。可是，有些教授就不讓這些學生畢業。學生就一直寫論文，但是教授就一直說不行。所以學生只好一直寫，一面還要幫教授找資料。我知道有幾個從大陸去UCLA的人後來就沒畢

業，心裡很憤慨，就不唸了。

溫：這就是美國做研究的生態？

成：當然不是所有的都是這樣啦。

但是因為在社會學的領域裡，能不能拿到資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你沒資料就沒辦法弄。

溫：到現在還是這樣嗎？

成：最近這一、兩年我是不知道，

已經沒有什麼接觸了，不過，因為中國現在等於是開放了，所以有些東西也很需要西方的社會科學學者去做些研究。說得不好聽一點，他有了共生關係。因為現在中國的社會科學崛起，但多半都是歐美的東西，所以也常常需要請國外的學者過去，讓自己的聲譽可以起來，就像我們這裡的國際交流一樣。所謂「國際交流」就是請人家來講講，而對方的交換條件就是蒐集一些資料。

溫：可否請您談談您近年來所做的中國研究？

成：這跟我剛講的什麼人能找到資料是有關係的。而我這個研究其實跟周恩來、鄧穎超有關係。在國共合作時，在重慶有個參議會，我父親是參議員，

周恩來和鄧穎超也是參議員。三人都是從香港過去參加參議會。中間有段他們一起坐火車，所以我父親跟他們夫妻倆是朋友。我在一九七二年回去，見了周恩來。

溫：您對周恩來的印象如何？

成：我對他印象非常好！我覺得這個人太了不起。

溫：您可以說一下嗎？

成：我見他的時候，他已經生病了。我是在七二年是一個人去的，不過當時有一群保釣的朋友同時也在北京。那個時候的中國還是很神秘，但我總是喜歡一個人在外頭跑來跑去。某天早上，有個人來跟我說，今天晚上不要出去，吃完飯以後就待在房間。我問他幹麼，他說因為今天晚上有個重要的活動，我問他什麼活動。他說到時候就知道了。他要我不能帶任何東西，皮包也不行。大約八點鐘，他就來了，說現在可以走了。我問上哪兒，他說到了你就知道。

於是我就到了人民大會堂，還看到我那群保釣的朋友。他們一看到我，就

問說我怎麼在這兒。他們說周總理要接見這個保釣團體，我就說我又不是跟你們一起來的，不過反正就一道進去了。進去之前，有人來跟我說，周總理知道我的情況較特殊，所以等下講話的時候會用我的日本名字，也就是我先生的名字。

坐下之後，大家就開始講局勢、釣魚臺的問題、跟日本的關係，反正什麼都講。

溫：您會因為先生的關係，跟保釣的人在一起而有些尷尬嗎？

成：也沒有，因為我在洛杉磯也參加了保釣，跟他們都認識，不過那個團裡頭有的是東部的保釣人士，那我不就熟。

周恩來手上有個名單，他就會問他們問題，跟這些人談。周恩來有時也會問我：「Hira太太，你有什麼意見嗎？」

周恩來跟哪個人講了一次話，再回到他的時候，就已經記得叫什麼名字，可以馬上叫出來，也記得你剛才講了什麼，可以馬上回應。

溫：周恩來那個時候已經生病了，記憶力還是那麼厲害？

成：很厲害、很厲害。他可以把這個人講的和那個人講的，全部串在一起。他有這種本事。我們大概從九點鐘開始，到了十二點半，他的秘書進來好幾次，大概是要他休息吃藥的。後來他就站起來，我們大家都以為要散了，有的人就伸個懶腰。他指著我說：「啊，你們這些年輕人，怎麼就累了？我們休息五分鐘。」就休息五分鐘又回來了，結果談到早上三點。

溫：早上三點啊？

成：對啊，這個人的精力真是了不起！完了之後，大家就一起照相，就有一个人來問我，照相對你父親不方便？我說應該沒問題，然後大家就照了相。有個人就跟我說，等下等大家走時，請你留步，總理想跟你講幾句話。

大家走了之後，周恩來就問我，你父親如何，好不好。我說還不錯。他說：「請你轉告你父親，我們都錯了。」在一九四九年時，他們透過廣播說我父親是人民公敵，「人民公敵成舍

我」，所以把《世界日報》沒收了。

不過周恩來在七二年就跟我說，這是不對的，說我父親是民族資本家，就是平反啦，是共產黨的朋友，不是敵人，我們還是歡迎他回來。之後每次我回去，大概都有人通報鄧穎超，因為不久周恩來就死了。鄧穎超都請我吃飯，他都會問，當然每次他請我吃飯時，相當於現在國台辦主任都會在場。這些人都是搞統戰的，就說有什麼需要啊，需要什麼忙啊？因為那時我替CCLA做很多交流，我設計了一個東西，後來被中國看成一個典範。

溫：您講的設計是什麼？

成：那時中國跟美國開始談很多合作啊，但我都覺得是錯誤的。一九八〇年前後，我們這個團到了廣州，周培元來接我們。我跟他一直辯，從南辯到北京。我跟周培元講，他的做法是錯誤的。他們那時在研究上想要很快趕上國際的水準。

可是他們的人都只會俄文，不會英文，但又想很快讓這些人——尤其是研究科學的人——能在國際會議上發表文

章，所以就把他們大量送到美國去，第一年都是學英文。

那時一個人一年起碼要花到三萬美金，他要送幾百、甚至幾千人出來。我跟他談的時候，他正在送大概一百人到華盛頓學英文。我跟他說這太浪費了，同時對於中國來說，也沒奠定自己的基礎。所以應該要有個學習組織的想法。當時我帶了UCLA一個專門研究應用語言學的人，這人已經在中東等國家設立過語言中心。所以我在去之前，就跟他想出一個模式：我們跟中國合作，由中國找一個學校當我們的夥伴，我們學校負責這個中心的學術工作。招生等行政工作由中心自行負責。這個學校每年送兩個人到我們學校念應用語言學，唸完後就回到中心工作，再換兩個人過來，總共以九個人為目標。

第一年我們送九個人過去。這九個人彼此搭配，有人負責syntax，有人負責testing。他們送人來，我們也是這樣配套訓練，所以過了五年後，我們人全部撤走，他們的人也都回國，教學什麼工作由他們自行負責，我們人就不再

過去了。在這五年當中，我們同時跟他的人在美國設計教材。設計教材的方式，譬如今年的主題是生物學，他們來的人就去聽生物學課，然後到實驗室去看。這些都錄影，並寫成英語教材。到時候，他們有人、也有教材，這樣不是很好？每一年，我們都會派某個學科的教授和我們老師一起去，該學科的教授就在這個學科用英語講習，而教英語的老師配合著教英語。那些學生也是科學家，他們也學到專業知識，等於一舉數得。我跟同事設計了這個五年計劃。

他們都沒想過這個問題，我就說毛主席說要自力更生，你們不要老是依賴美國去做這個事，還花那麼多錢，我這個便宜得不得了，而且可以大量訓練。我們若是替教育部做這件事，第一年可以招收四百個人。學員進來時要接受測驗，通過的話，我們學校可以擔保一年讓他進步到一個程度，讓英語不再是一個阻礙。你可以用英語發表論文、參加學術討論。

我們之後到了教育部，當時的副部長叫李齊，是周恩來以前的秘書，是

個滿好的人。結果變成李齊跟周培元，我跟我同事，四個人不斷爭論。爭到最後，他們兩個人就說這個聽起來很好，就指定中山大學。

溫：不是嶺南大學？

成：不是，是中山大學。嶺南大學本來是中山大學的一部分。這個模式出來之後，第二年中國科學院就找我，那個時候我在北京，他們請我幫他們辦一個，我就幫他們在北京辦了一個。然後，社科院也來找我，當時的社科院副院長是趙福三。但是社科院沒錢，那有什麼辦法弄點錢？我說那就跟福特基金會要錢。

福特基金會也覺得這個模式很好，福特和露絲基金會這兩個基金會就出錢。因為他們希望中國研究社會科學，所以就替社科院設了一個培訓中心，這個培訓中心很有意思。因為第一年我找了一個左派的美國史學者Alex Sacks。非常好的一個人，他們喜歡他得不得了；第二個是Jack Alexander，現在是很有名的社會學家；第三個是一個法學院的教授。反正他們也都很滿意。我聽說後來

中國在海參崴那邊開了一個會，說這是最好的交流典範。

溫：那時美國參加的學者有左右派之分嗎？

成：沒有，都搶著來，一直問我「什麼時候輪到我？」我後來還認識了汪道涵。他有一天到北京飯店來找我，就說：「你已經替我們辦了三個，再替我們辦一個吧。」汪道涵當時是負責國務院底下一個經濟發展的委員會，我說你們底下又沒有一個學校，沒有學校的話，我很難跟你們這樣的委員會合作。他說好，那就找一個，就找了北京外貿學院，所以我就在北京外貿學院又成立了一個。我的對口是汪道涵，後來他到上海去做市長，於是就換了江澤民，所以我又認識了江澤民。都很有趣！

這個經濟培訓中心第一屆的畢業典禮，江澤民還有來。但是我對江澤民的印象不是那麼好，對汪道涵的印象非常好。

溫：您可以講講這個部分嗎？

成：汪道涵後來到美國去了幾次，每次來都打了電話給我。我有一次還自

己開車帶他出去玩。我覺得汪道涵是個非常有親切感的人，他來找我時當然穿得很整齊，可是他坐下來以後，就跟我說：「成教授，我可不可以隨便一點？」我說當然沒關係，他就把西裝脫掉，襯衫的領口也打開，鞋子也脫掉。

溫：跟我們對共黨的印象中差很多。

成：很不一樣。

溫：您覺得這跟他在兩岸關係表現得比較靈活有關係嗎？

成：我覺得他是一個高手。

溫：高手？

成：他是一個談判高手，他很少直接跟你說他要什麼或你要什麼。但是，他就跟你模模糊糊談，交代下去，事情就這樣成了。我還滿喜歡這個人的。

溫：江澤民呢？

成：江澤民這個人就是有點官僚。我第一次碰到他，就覺得這個人非常官僚。他當然也是給你握手的，但那個感覺是不一樣的。汪道涵就是很親切，然後跟你好像一下就很熟。

溫：江澤民是不是握手握得很重，

沒有感情的？

成：不是的，他握手握得不重，有點像連戰。我就說這兩個人握手就像死魚一樣。

當時有好幾個計畫同時在進行。我們在中山的培訓中心，一開始時頭痛得一塌糊塗。我在LA，差不多每個月，中山這邊就打電話來：「成教授你非來不可，我們這邊有個大問題。」不然就是美國老師打電話來：「Lucy, we have a big problem. You have to come.」

不過我在這裡真的學到很多，不過有可能是因為我的orientation的關係。我常跟美國老師講，中國跟美國不一樣，你不能把美國那邊的習慣帶入中國。譬如說他們的big problem是什麼呢？沒有白板和白板筆。我說那就不要用白板，有黑板啊。他說黑板不方便，黑板很重。我說那你就用紙盒子也可以啊，就是那種習慣性的問題，沒這個又沒那個。我覺得他們又很浪費。我說你要知道這些錢都是中國出的，尤其中山這邊的錢是教育部出的。後面幾個都是美國出的錢，比較有錢，但是中山比較沒

錢，你不可能叫人家幫你進口這個筆那個筆，是不是？然後洗澡沒有熱水，問題一大堆，一場糊塗。所以我就覺得乾脆弄個研究計畫，就在那邊自己做，不必整天往那兒跑。

溫：您在那待多久？

成：我爲了這個專案，在那兒住了三個月。

溫：您對於中國當時的改革有什麼看法？

成：那個時候還沒有後來的這個樣子，後來我就不太愛去中國。我哥哥去年還是前年跟我說：「你以前一年來好幾次，怎麼現在都不來了？」我說：「我以前很愛來，是因爲到了中國，真的就像到了很不一樣的地方，什麼都不一樣，就像我剛說的精神面貌，整個感覺都不一樣。可是我現在到中國，就像到任何第三世界國家一樣，我可以去菲律賓賓去別的地方，不一定要去中國。」

溫：您常常跟您哥哥聯繫嗎？

成：對啊，我們常聯繫。我每次跟他見面，我們都會爭論。可是我哥到最後都會說，「其實我倆沒有相差那麼

遠！」

溫：這爭論是什麼地方？是發展的方向，還是……？

成：因爲我哥哥很不喜歡我說他們是走資派。我哥說，當然有這個傾向啦，但中國還是很重視分配問題。還是認爲貧富不均是個必須解決的大問題。不是說好像現在不管了，就隨便了。

時間：二〇〇八年四月七日

地點：世新大學舍我樓

溫：我們回到上次的主題，您提到在中美的文化、教育交流中扮演媒介人物。在交流的過程中，您碰過有什麼文化、觀念的衝突嗎？

成：我想這有很多，可是不知道記不記得那麼多……。有的是很小的事，但也許可以從小見大。有的問題牽涉到美國到中國的交換學生，有的牽涉到老師。一開始的時候，學生的問題是比較大。很多是物質條件的問題。當然，物質條件的問題跟文化也有些關係，譬如

說，我們有五個大三、大四的學生在廣州中山大學，他們去之前都說要跟中國學生住在一起，不要特別待遇。他們的想法是，他們都住在在一起的話，中國監視起來比較容易。中國那邊反倒堅持，說他們這樣是受不了的，所以一定要給他們特別待遇。但他們堅決反對，中山大學就說，好吧，那你們就住宿舍試試看。當時的中山大學跟現在不能比，非常簡陋，而且很多人住一間。學校對他們也禮遇了一下，沒那麼多人住一間，但我記得一間還是有六、七人。後來，學校那邊就打電話來，說他們現在有很大的問題：這些學生晚上不想待在學校，就跑去東方賓館去喝啤酒，回來發現門都鎖了，進不去，就在門外大叫，把其他學生都吵起來，他們第二天就去抗議，說這些外國學生吵得我們都不能睡覺，爲什麼要允許這些外國人到我們學校來。中國學生那時候對美國還是一種很矛盾的情感……

溫：一方面是尊嚴，一方面是自卑……？

成：對，就是覺得好像不應該任由

他們到這邊胡鬧……

溫：覺得美國學生有特權嗎？

成：倒不是特權，而是中國學生會覺得美國的學生養尊處優，不能吃苦，要中國學生照顧美國學生，也可以接受，但不能妨礙到他們的學習。美國的學生就認為這是干涉他的自由，美國的宿舍沒這麼早關門的。結果，兩邊吵得不可開交，然後打電話要我們去處理。這類事情很多。

溫：中國方面讓他們住比較好的地方，這涉及面子問題嗎？

成：其實我不這麼解釋這件事。就像我在一九八〇年去台山做研究，我帶了一個華裔的同事去，他是在美國唸大學，拿到哈佛的歷史學博士，然後我把他找到UCLA。我們去中山大學之前，他們也是說，你們真的能去農村嗎？妳們身體行嗎？吃得慣嗎？就是生活上一種關懷的語氣與態度，所以我不覺得那是一個面子的問題。他們的想法就是，美國人物質條件那麼好，不能吃苦……

溫：他們不是那種家醜不可外揚的心態？

成：我覺得不是。我們後來就一直

說沒關係，我們都可以。最後他們也就說，好吧，你們覺得可以就去吧。

溫：人類學的田野調查都會涉及與當地研究對象的互動，甚至當地人會誤導研究者，您曾經碰過這種情形嗎？您有沒有什麼技巧去探究問題的面貌？

成：有時候想想，也挺可笑的。那時候農村基本上還沒開放，我們去的農村沒有所謂的高級知識份子，程度最高的人也就是中學畢業而已。當時已經沒有所謂公共食堂，大家也就是回家吃飯，小孩也是自己帶，但是托兒所還是有的。

我們的這個項目是跟中山大學合作，所以中山大學有一位教授和兩個研究生跟我們一起下去。之前我先到中山大學去教了三個月的書，那兩個研究生是我班上的學生，跟我已經很熟了，後來就帶了他們兩個一起下去，加上一位教授。三個人是男性，而我跟同事兩人是女性。我覺得農村裡面，比較重要的是性別差異，如果沒有這三個男生的話，我覺得那次的田野會做得很差，可

能根本都進不去。

我們一到農村，村裡的頭頭就來看我們，沒有女的，都是男的，每個人都抽水煙袋或香菸，吞雲吐霧。

跟我們一起去的那位教授很會這一套，之前就叮囑我們，香菸要多帶，所以一去馬上就請大家抽菸，好像根本都沒談正事。這跟我們的習慣很不一樣，就是天南地北地聊，而且持續相當久。而在聊天的過程中，他們就會探聽我們到底來這幹嘛，想知道什麼。大家就在這種很放鬆的情況下，解釋我們來這裡是要做移民史的研究。這個地方我記得叫秀敦，有很多人移民出去，尤其是到美國。這也是研究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我們本來希望做非常有系統的社會學研究，說拿人口資料、做問卷啊，但是你們到了農村之後，發現好像都行不通，因為他們根本不能理解你在幹什麼。

溫：所以這不是政治的禁忌，而是本身的條件根本沒辦法做？

成：對，我覺得這個部分跟政治毫無關係，就是雞同鴨講。譬如說填個

問卷，他們的理解就是官方要他們填的東西，理解成這樣就很難弄。所以後來我們放棄了很多這樣的做法。應該怎麼進行，我們都設想好，可是到我們開始跟他們講話之後，就知道那根本都行不通，所以後來就變成挨家挨戶去聊天串門子之類的。我們不久就找了當地的兩個女孩子做我們的助理，帶著我們去串門子，這也引起很多很可笑的事。我們被安排住在一個所謂「空白戶」裡，因為有很多人早就走了，房子就一直都沒人住，頂多就是有遠房親戚在那邊養雞、鴨、豬。

溫：在一般的印象中，中共的戶口制度是很嚴謹的。這樣看來，農村似乎有落差？

成：不會有落差。後來我們知道，要到保健處去拿資料。他不是沒有資料，而是要找對單位；同時，你要的資料不是他有的。我們在談合作條件的時候表示，我們不蒐集「解放」以後的東西，所以都是解放之前的。我們研究的是華僑史，而不是現在的情況。所以我們要知道的是這些人什麼時候走

了？走了對這個地方有什麼影響？我們想知道的就是所謂「僑鄉」的研究。他們幾乎每天下午就來串門子，反正就是來來往往，每次來了，那個教授趕快拿煙出來，有一些小酒請他們喝。他們就問，你們到底要找什麼資料？我就說，譬如包括一九〇〇年美國人口普查在內的很多華人移民的材料都毀於一九〇六年的三藩市大地震。當時華人集中在三藩市，很多華人就說自己的資料也被燒掉。當時華人每過幾年就會回家一趟，再回美國的時候，就會說我回家之後又生了一個小孩。移民局就會登記，某人生了一個小孩，以後這個小孩就可以來美國。當時因為美國排華，一般的勞工只有在這樣的情況下才可以來。可是因為材料都燒掉了，所以根本搞不清楚到底誰有沒有小孩。中國人很聰明，你的小孩不一定會想去美國，所以可以把這個名額轉給別人，這也可以變成一門買賣。可是，美國移民局很快就知道中國有這樣的做法，所以船到美國的時候，就先把人留在天使島問一大堆問題，看你答不答得出來。如果說法對不在一

起，就認為你是假的，不讓你登陸。甚至有人被關在天使島好幾年，不能上岸。於是中國人就開始弄「口供簿」。這是用手抄的，裡面以問答的形式，把移民官員會問什麼問題，應該如何回答，都寫出來。有的很厚，有的很薄，像我在國會圖書館看到的大概有二十幾頁。

我就跟他們講，我找的大概是這樣的東西。有個老人就說，喔，這個啊，這個我們多得是，像你住的地方可能就有這個東西。人都走了嘛，可是東西都有留下來，你們可以自己去找。於是我們就在空房裡找到很多信，是外出的人寫給家裡人的信，還有口供簿，各式各樣，東西很多。口供簿是很有趣的東西，因為裡頭問的問題，是你根本不可能知道的，譬如說你家裡有幾個窗戶，窗戶離地有多少尺，你祖母有幾顆金牙？有的標準答案竟然是「我不知道」，意思是說，美國的官員也知道你可能不知道，所以你如果真的知道了，反倒是不好的。

我們請來的那兩個女孩大概二十幾

歲，都沒結婚。她們帶我們去串門子的時候，就有媒婆來作媒，一天到晚追著她們，讓這兩個女孩也很害怕。

我覺得最有意思的就是，我們在那裡待了大概一個多月以後，有一天跟這些農村的人吃飯時，有個人說明天要請大家吃飯，因為他申請去美國跟親戚見面獲准了，所以要請全村的人吃飯。我就說：「喔，那真是恭喜你了！」他很得意，從口袋裡拿出一張紙來：「你們看，這就是我的許可證！」我一看，那根本不是許可證，而是一個通知函，表示你可以申請到美國去跟親戚團聚。可是他已經要慶祝，請人家吃飯了。我當時也不知道要怎麼跟他講，但後來還是偷偷跟他講，這可能還有一些手續要辦，沒那麼快。他就問大概要辦些什麼手續，我們就說你要填這個表。他說不會填，我們就替他填一填。另外還要照相，美國駐廣州領事館就說要彩色照片，但農村沒有彩色照片，只有黑白照片。領事館說不行，一定要彩色照片。後來我就到廣州去，跑去跟他們說，你們這根本就不合理，農村到哪兒去弄彩

色照片？那個人就說，好好好，黑白的也可以。那個人反正後來就申請到了，結果後來不知道怎麼傳的，說我們是美國政府的代表，可以替人家做這個事兒。之後每天門口都大排長龍，要我們替他們填這個玩意兒。

溫：這表示他們在美國有很多親人？

成：很多。我們當時選這個村莊，是因為有九成五的家庭有外移的歷史。

溫：這情形讓我想到溫州。溫州的發展其實是靠僑資，這個村也有這種情況嗎？

成：對。我寫了一篇文章，還跟別人合寫了一本《華僑跟新穎鐵路》，就是談僑鄉。我的看法是，僑匯要促進家鄉發展，需要有很多條件。在這個地方，僑匯的影響是負面的，讓地方沒有很多發展。它的商業有很大的發展，這個村莊是在台山縣縣府台城的外圍。縣府有不少妓院、鴉片煙館、首飾店、糕餅店，但實際上沒什麼工業。第一條民營鐵路就是在台山蓋的，是僑匯與華僑蓋的。因為很多中國人到美國去築鐵路

嘛，所以有這個技能，回來以後就造鐵路。那出錢最多的人叫陳儀西。當時孫中山是很支持築鐵路，但是鐵路就跟當地的文化起衝突，因為會經過一些墳地，當地的人就會說妨礙風水什麼的，所以一定要繞道而行，所以造價大增。鐵路蓋好之後，貨物只進不出，因為它不生產東西。很多回去的老華僑，每天都要喝咖啡，但這地方也不產咖啡，都是從外面運進來。運輸是單向的，還有很多軍人坐霸王車之類的事情，鐵路當然沒辦法生存，所以就垮掉了。

溫：僑匯在解放之後一點影響都沒有嗎？

成：雖然我們表明不蒐集解放之後的資訊，可是你在訪問的時候，這些人都會跟你講，因為他對解放前後根本也沒什麼概念，他反正就是跟你講他的故事嘛。

在外面的村民拿錢回來進來蓋學校、修廟宇之類的，這跟清末是一樣的，到解放之後才有拿這些錢來發展工業。以前把錢寄回來就是家裡的，所以這個地方的房子都是很漂亮的。像我

們住的房子是兩層樓，樓下養豬，蓋得很好，有雕刻啊什麼玩意兒的。那個錢都是用來做消費的，可是你如果要它來發展工業，那是需要積累的，要把很多錢弄在一起。以前的政府根本是不管這些，可是解放以後就會開始注意這個，但這當然就是有些人會反對。我這些錢本來可以拿來買電視幹嘛的，現在等於要我把錢拿出來。

溫：我比較好奇的是，南方北方的解放，情況不太一樣。因為南方有軍閥的勢力，北方有共產黨盤據的地點。南方的解放是軍隊向中共投誠。一來，南方天高皇帝遠，二來有海外的聯絡管道，所以在解放後的治理，像是溫州，自主性要比其他的地方強。溫州的改革似乎又跟它的獨立自主性有關，當然還有走私啦之類的。

成：溫州情況我不清楚，不過你拿廣東來看的話，廣東一直都是自主性比較強，中共很知道這一點，所以它對於僑鄉、僑匯、海外關係，都有很特殊的處理方式，跟其他地方是不一樣的。譬如說地主的問題，在僑鄉地主的問題跟

其他地方地主的問題，那個處理是不同的。這在國內引起過很大的辯論，因為其他地方的地主是世襲，可是僑鄉的地主通常都是人到外面去做工賺的錢回來買地的，所以可能他上一代就是勞工，不能當成世襲的地主來看待。所以他的地是不是應該要被沒收，或是地主的階級是不是要這樣定，其實是有爭議的。

溫：這種雙重標準可以算是遷就南方既有的地方勢力嗎？

成：這當然可以有不同的解讀。有一種解讀是說爲了要爭取更多的僑匯，因爲當時中國很窮，尤其沒有外匯。因爲大家都被土改搞怕了，所以這種僑鄉的地方我們應該不要那麼……

台山有個很有趣的情況，這也跟到海外去是有關係。你可從很多方面去考察，譬如建築很像東南亞殖民地的建築，而且這個地方是全中國報刊雜誌最多的縣，這是很奇怪的。這裡每一個族都有族刊，此外還有各式各樣的文藝刊物。那裡有一個心寧雜誌，應該是光緒三十年開始的，到現在都還在出，中間當然漏過幾年，但就是一直都有出。

我們設法弄了一整套回來，水準都蠻高的，學校的程度也很好，女性的識字率非常高。

這裡面有個矛盾性，有些婦女是不願意嫁到華僑家的，因爲男性幾乎都從來不回來，可能你嫁了以後，也許一輩子都看不到這個人，所以有些家庭就不願意把女兒嫁過去。於是常常要談條件，我可以送你的女兒去唸書。那個時候的開平中學、台山中學收了很多女生的，這是差不多民國十年左右的事。

溫：這是去之前就蒐集的資料嗎？

成：我們去之前不太清楚，是去了才知道。

溫：解放之後也是這樣嗎？

成：至少我去的時候，差別不大。我們在美國知道的倒不是教育，而是從美國人的眼光來看夫妻結婚以後，丈夫走掉了，妻子就在家裡，一輩子都看不到先生。美國有些人寫過這件事，像是Maxine Hong Kingston（湯婷婷）在七〇年代寫過一本 *The Woman Warrior*，就講到這個情況。因爲他是台山出來的，聽家裡的人講的。

這在台山是很普遍的事情——我有一篇文章也是寫這些，可是用不同的解釋——這種婚姻的目的之一，是因為男的已經走掉了，沒有人來照顧他的父母親，所以娶一個太太來照顧老人家。書中的父母親對準媳婦的監督是嚴厲的。我是把這看成一種交換，先生要從美國寄錢回家裡，他的父母親要確認兒子不會在美國又跟別人結婚，如果在美國跟別人結婚的話，搞不好就不會把錢寄回來，於是打算讓他回家鄉結婚。有個太太在家鄉，他就會繼續寄錢回來。所以他的父母親就要特別的保住準媳婦的貞操，看得特別緊，如果有一點風吹草動說她有什麼不規矩的話，懲罰是很嚴重的。我們在美國看到的資料，會把女的擺在豬籠裡面，然後把豬籠丟到池塘裡，把她淹得半死。然後這女的去買一頭豬，到祠堂去謝罪，謝完罪把豬殺了，挨家挨戶去送豬肉。我們做這種研究的人就比較知道有這種情況，但並不知道其實僑鄉的婦女教育程度比一般婦女高。

溫：她們有繼承財產的資格嗎？

成：她們不能繼承，還是要那兒子回來繼承。

溫：您提到左派對毛澤東的崇拜。在美國，有關毛澤東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有很多爭論，您怎麼看待？

成：這牽涉到底有沒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問題，也牽涉到正統馬克思主義的分析。當然，如果你把年輕的馬克思對於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或是後來的共產主義國家的想像，或是回到馬克思主要強調的所謂人文（humanism），那麼我們所看到的這些社會主義國家都不能叫做社會主義國家。

所以，有些左派會覺得像蘇聯的解體是好事，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是社會主義國家。反倒是有些所謂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會覺得蘇聯的解體很讓人難受。所以這完全要看我們怎麼理解馬克思。

溫：那對於中國呢？中國的改革往資本主義的方向來走，現在連產權也都承認了。這該如何去理解？又要如何跟毛的中國接續起來？毛也強調要走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要跟蘇聯有所區隔，那要如何去認定毛的社會主義？

成：我覺得很多左派對毛——至少在天安門事件之前——是比對蘇聯友善得多。至少沒有一個美國的研究學者會說史達林是好，可是對於毛澤東的評價一向都是很高的。就像William Hinton很推崇毛澤東，像他這樣子的人會覺得毛是在實踐社會主義，而且確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以我們不能用馬克思的那種很傳統、很正統角度去看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因此Hinton會覺得現在中國走這樣子的路線是對社會主義的背叛。可是也有人會覺得中國走這樣子的路恰恰證明了馬克思是正確的，因為中國沒有經歷過資本主義這個階段，所以他沒有一些條件。

溫：您的意思是說中國在補資本主義的課？

成：我自己比較這麼看就是了。第一，即使是馬克思的階段性發展，也不是鐵板一塊。因為馬克思自己就講了很多的條件，每個階段當中還是有很多條件需要實際考察的。他不是一個命定的關係，如果你把這看成鐵板一塊，死死的，那根本就誤解了馬克思。所以我不

覺得這是因為沒有經過資本主義，所以要回去走資本主義這條路；當你走了資本主義這條路之後，又產生一些其他的結構性問題。這些結構性的問題不是說不要就不要了，這會影響後面是不是還能走社會主義的道路，難道還要再來一次社會主義革命嗎？我覺得至少這是中國共產黨還沒有講清楚的問題。

溫：當時美國的左派信仰馬克思主義，背後的文化因素到底是什麼？像很多法蘭克福學派成員都是出身銀行家族的猶太人，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猶太人對於當時歐洲文化的不滿、被壓抑、也涉及認同問題。而馬克思提供一個解決歐洲資本主義矛盾的辦法，所以這些人走向共產主義，信仰馬克思主義。以您的生活背景來看，很難想像您對左派有一種信仰。您想過這類問題嗎？

成：當然我們會想自己思想的成長、轉變過程，可是我很難講是轉變，因為我從來就對資本主義沒太大好感。我前面講過一些我在美國實際上對種族、性別、階級不一樣的遭遇。

我是在大學二年級去夏威夷，本來

是要去學音樂的，我拿了一個音樂獎學金，可是生活費要自己賺。當時有人介紹我到一個白人家庭去帶小孩，那個人家的小孩已經十幾歲了，一個十一歲、一個十三歲。因為第一次出國，對美國人沒什麼了解。我還沒給這家人帶小孩之前，這家的男主人就去世了。這個女主人我不知道她以前是怎麼樣，但等我到了時候，她很愛喝酒，經常爛醉如泥。她的兩個小孩就是典型的美國青少年，很自由的，也很愛抽煙。但是他們被媽媽發現在抽煙時，都說是在在抽。

他們媽媽也不會追問，反正認定就是我在抽煙，這種讓你覺得很冤枉的事情很多。我以前沒見過冷凍食品，我記得我第二、三天到這戶人家去做事的時候，她就跟我講今天晚飯吃冷凍的豆子，在冰櫃裡。我把冷凍豆子拿出來，等於結成一盒冰一樣，我不知道要怎麼弄。我不會弄，就看說明。我相信你也能理解，我從來沒有看過這種說明，也從沒見過冷凍豆子，結果弄得亂七八糟，豆子也沒熟，這太太就很不高興，就跟我講：“I don't care how smart you

are. Here, you are my maid”，就是很強調階級的關係。

當這家人吃飯的時候，我是不跟他們一起吃飯的。他們三個人還用一個鈴鐺，在吃飯時如果要加點水什麼的，就會去搖鈴。很多這樣的事情。我覺得如果我不是從我這個背景出來的，也許這對我沒有什麼大關係，我不會去想這個問題。可是因為我的背景不太一樣，突然到了這樣的情況，就會讓我去思考這個問題。

這樣強烈的階級對比，對我是有點影響的。後來我在美國念大學時，曾經同時打五份工，我在餐館做女侍，也有很明顯的勞工跟雇主的關係，可是這些衝擊都沒有第一次那麼大。

溫：雷根、柴契爾夫人在八〇年代上台，一方面轉向右派，一方面採取自由化政策。冷戰結束後，這套新自由主義的邏輯下，全球化時代來臨。中國在面對全球化的時代，似乎沒辦法再去堅持社會主義，而是愈來愈遷就全球化的過程。左派對於中國、美國這樣的一個轉變和理解到底是什麼？

成：我覺得美國的左派很注意蘇聯和古巴，倒並不是那麼注意中國，因為蘇聯跟美國的對立關係，但中國一直都是是一個遙遠浪漫的國度，去中國的人很少。首先，文字就是個大障礙，也很少人用英文去寫中國。所以，在我的左派朋友中，幾乎沒有什麼人對中國有興趣。他們對中國有一種好奇，想知道中國現在如何。只有真的研究中國的人，才會去念點東西。你看*Monthly Review*，裡面講中國的文章非常少，主要都是拉丁美洲之類的。

溫：這是不是說美國的左派也走到了某個侷限？您剛剛是把性別、階級放在一起來看，這些屬於弱勢團體，可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談的是階級的問題，資本家跟工人之間，比較少人會觸及到性別之類的問題。

成：美國的左派對這一點有很大的分歧：所謂種族跟性別是不是真的附帶現象。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我們兩個人常在一起寫東西，他一直都認為，種族是一個附帶現象，他的物質基礎是來自階級，可是我覺得他也有點改變。

溫：如果用這個來解釋台灣的族群認同，有人說南北有族群對立，可是看起來好像也不一定是族群，背後還是有階級的問題，比如南部勞工比較多……

成：階級一定是個很重要的東西，但是不是所有東西都能用階級來解釋，那是有疑問的。

溫：您上次提到，美國做中國研究是放到區域研究裡面來做，您是從環太平洋的角度切入，來打破國族的界限，您可以談一下這個的意義嗎？現在不管是在做中國史、清史，似乎沒有人用一個很固定的國族來討論清朝，而是看他跟不同民族之間的互動，*Manual Castells*所寫的三部曲在談東亞的時候，是用網絡的概念來談的。現在來看很多歷史社會學的研究開始跳脫國家這個分析的單位，這跟您當初的設想似乎是不謀而合。現在有很多著作都是往這方面來談，比方說大中華經濟圈，不光只是講台灣、香港、中國，應該要把東南亞、華人資本都算進來。感覺這些現在都是研究熱的議題……

成：其實UCLA在兩、三年前，有

一個展覽，叫做Pioneers，就是UCLA的一些研究先驅，裡面也把我放進去。我做的一些事情和研究比較是屬於開拓性的，比較是人家沒有去談的問題。可是我這個人的缺點，是我常常會被我自己一些新的想法給岔掉，然後我又想別的東西去了。

我開始弄環太平洋的時候，一大堆人反對，從我自己的社會學本科，也不贊成我做這個。因為他們覺得，你又不是很squarely in社會學，又不是去研究中國、日本之類，又不是傳統的比較社會學，那這到底是什麼東西？感覺走這樣一條路好像不是很有前途，可是我提這個東西是跟華勒斯坦有關，我覺得我是受他的影響。

溫：您為什麼這麼說？

成：因為那時候，華勒斯坦的東西剛受到一些人的注意。他認為要從世界體系的角度來了解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比較符合我對這世界發展的看法。

溫：但是華勒斯坦不太去注意東亞這一塊？現在已經有不少人在做這方面的研究，您如何去評價？

成：我本來是有個計畫要做這個，可是後來都沒有去做。我還把社發所的幾個老師拉進來做華勒斯坦的研究，還請華勒斯坦到學校來。我本來要寫一篇文章，談華勒斯坦對台灣社會學的影響，可是後來沒寫成，因為我覺得好像談不出什麼影響。整個來講，從移民研究轉到transnationalism之類的，其實都是往這個方向走。

溫：當時美國的區域研究，不管是歷史還是社會學，很少跳脫國族的限制。這方面您能不能多談一些？

成：你第一次來找我談這個project的時候，我說我在美國不被認為是個做中國研究的人，因為我也沒有真正做過什麼中國研究。

溫：可是但是好比說研究僑鄉，就跟移民這一塊有聯聯；研究溫州的發展，也不可能不去談移民，即便是在解放之後。華人在東南亞的互動其實是超越國界的，又是一個錯綜複雜的國際政治問題。從今天來看，您當時的構想是比較正確的。

成：我也覺得，可是別人不那麼

認為啊！至少那時大家都認為這個路子是個死胡同。我對僑鄉還是有很大的興趣，現在別人寫這方面的東西，我還是會去看。

溫：美國的中國研究習慣用社會科學的方法來套，您對這有什麼評論？

成：老實說，我自己沒有走中國研究這條路是因為我不太看得起國外的中國研究。

我唸研究所之後，就決定絕對不做中國研究，寫的東西絕對不牽扯中國。所以除了我的碩士論文以外，我的博士論文、後來早期寫的東西都跟中國無關。因為我覺得在國外搞中國研究的人都在胡說八道。只看到一點點，就把它寫得很大。他可能抓到一點東西，就做一個假設，然後去找些材料來證明這個假設。可是那其實只是九牛一毛，完全是沒有意義的。

溫：有什麼讓您感觸最多的例子嗎？

成：現在要我講，一時也想不出來，但是我覺得這個情況最嚴重的是政治學。我覺得他們根本就沒搞懂，就在

討論中國的政治。

溫：您可以舉例嗎？像白魯恂這些人呢？他談中國沒有民主是不是來自文化的威權性格……

成：這裡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我最近也常跟我的一些朋友討論的問題——就是民主。一個很基本的西方假設就是，民主好像是一個普世價值，可是民主到底是什麼？你對民主的定義是要跟這個國家整個的經濟、文化、政治演變合起來談的，而不是有一個抽象、普世價值的民主。現在就是以西方的這種選舉民主作為民主指標，來檢驗其他的國家到底有沒有民主，我覺得這個很糟糕的事情。可是幾乎你現在不大能去質疑這個，你一質疑這個，人家就會覺得你是不是要專制了。所以現在除非是跟朋友談，否則不大想談了。

溫：這是一個研究方法的問題嗎？或者這是一個很難跳脫的本位文化？如果這是盲點的話，那麼這個盲點是來自於知識論、方法論還是文化的本質？

成：我沒有好好想過這個問題，但我會傾向於認為這跟西方整個文化的

根源有關。你剛講所謂的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其實是左派弄出來的，是阿多諾爲了解釋納粹。可是這個搬到中國來講，我就覺得有點不倫不類。

所以我從來不看這些人的書，我最早看過一兩本，之後我再也不看。我如果要了解美國人怎麼看中國，那當然會去看；但如果真要了解中國，我是不會去看這些書的。美國講中國崛起，把中國弄得好像要去解釋爲什麼有中國崛起這回事。

溫：我記得溫家寶去哈佛的時候，還講了這個問題。可見得他很重視美國的觀感，雖然不見得同意。

時間：二〇〇八年四月十八日

地點：世新大學舍我樓

成：我上次提到我們辦英語培訓中心，在中國得到肯定。後來，社科院就又找我去替他們辦一個，所以我們後來在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辦了一個。當時因爲社科院也沒錢，所以就說是不是

可以幫他們找點錢。當時的副院長是趙富三，他的英文講得非常流利，他說福特基金會好像有興趣，希望我去跟他們聯絡。後來我就去找福特基金會，那時我已經做了很多交流的計畫，所以跟福特的人也熟。我記得福特的人叫Peter Gartner，他說福特基金會有興趣幫中國發展社會科學，把我們這個計劃看成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所以後來福特基金會就出了滿多錢，辦社科院的培訓中心。

溫：這是延續之前的計劃，還是另外成立新的計劃？

成：這是新的，這就是英語培訓中心。魯斯基金會也是給錢。這些基金會支持社會科學在中國的發展，你當然也可以從社會科學的發展去看，可是你也可以問，這是什麼樣的社會科學。那其實跟毛澤東一路下來所想的那個社會科學是不一樣的。我有一篇文章寫的就是社會科學在中國的重建，登在*Annual Review of Social Sciences*。其實我批評這個東西的，在中國所謂重建社會學，那個路是不太對的。就是還是要問，幹嘛要重建這樣子的社會科學？很多人批評

我這篇文章。

溫：大陸那邊批評嗎？

成：不是，美國那邊。大陸方面其實沒有很正面的批評啦。不過你看他們後來寫的一些東西，其實可以看出來，我的想法跟他們很多人的想法是不一樣的，像我對費孝通有些批評，其實是大被原諒的。

溫：可以談一下您對費孝通不同的看法嗎？

成：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了。我其實滿佩服費孝通的，我的批評不是對他的研究或著作，而是對他在社會科學重建的一些做法，我不太同意。費孝通寫過一本書，叫做*A People Sociology*（溫按：本訪談結束後成教授尚未完成文字上的最後確認，故此處尙待查考），可是他後來做的那些東西，跟書裏所鼓吹的卻是背道而馳。在福特、魯斯支持中國研究的同時，美國的NDEA也給了很多錢，讓學校鼓勵人家學中文。這就是當時所謂的中國熱。

這訓練了很多，當中有些是主流的社會科學學者，也有少數人是從馬克

思主義的脈絡出來的，當然就在美國的中國研究裏形成兩大派別。像黃宗智，他最早是研究思想史的。

溫：研究梁啟超？

成：對，是完全沒有左派觀念的一個人，可是後來變成非常左。他去了中國一次之後，就有了很大的改變。後來他寫文章就轉向社會史，討論生產關係、生產方式的改變。可是他早期打不進主流的期刊，人家都不登他的東西。所以後來就自己辦 *Modern China*，訓練了一批學生。但是有些人並不認為他是左派的。

溫：這滿尷尬的，是因為他的觀念嗎？

成：對，當然這裡面也牽涉到左派本身的分歧。他並不是很 engaged 於比如說關於馬克思主義的爭論。可是他的確借用一些馬克思的分析方式，比如說階級鬥爭，來作他的研究。基本上，有點把馬克思的方法用到中國歷史的研究。馬克思的社會科學學者不是很認為他是裏面的人，可是在中國研究這個部分，他的確是被視為比較左派的人。

溫：您所提的就是什麼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的問題。黃宗智是從思想史轉到社會史，而 Warden 在馬克思的辯論裏寫了不少文章，可是後來也不太作這個部分，去做新權威主義，這是不是也算轉向？

成：其實這本身也有它的歷史脈絡。在美國剛跟中國建交的前後，有很多美國學者很嚮往中國。有些受馬克思主義訓練的美國學者會把中國、蘇聯、古巴這些國家看成馬克思主義實踐的場域，對這些國家充滿期待，很想到這些國家作研究。這是一個比較正面的看法。我個人是覺得，他們沒有把中國的實際情況納入他們的分析或理解當中，所以是有點抽象的去觀察中國。就是用一個抽象的架構去看一個實際的社會。去了以後，幾乎所有的人都很失望的樣子，所以後來很轉向了。

溫：Andrew Walder 也是這樣嗎？

成：是，我覺得是，後來漸漸偏向韋伯……

溫：就談制度這種東西。

成：對。我覺得這也證明毛澤東是

對的，知識份子不是很可靠。

溫：這個結論很有趣。

成：我不是寫這一方面的人，可是我認識很多這樣的人。他們有時會覺得好像我是比較意識形態、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對中國的實際情況，我都是用一種很原諒的心態去處理，而他們是比較理性的。

有些人對我的批評是這樣子的。

溫：您對這樣的批評有什麼回應嗎？

成：倒也沒有。Mark Selden 是一個例子。我跟同事寫了一本 *Labor Immigration and Capitalism*，由柏克萊出版。Mark Selden 是寫了一篇非常好的書評，這本書的封面引了他的話。他對這本書評價很高，說這是一本理論性很強的書，而移民研究這個領域通常沒有水準這麼高的書。他是研究中國的，後來我也認識了他，可是在中國這部分，他就會覺得我很相信共產黨那一套。好像我那些批判資本主義的力道，一碰到中國，好像就沒有了。

溫：中國的發展不能用西方那套標

準來看，您為什麼這麼寬容？

成：我覺得一個可能是，我不太認為民主在本質上是一個普世的價值。就我們現在具體知道的民主的形式，比如說投票，我不認為它有普世的價值。我們可以說在某一個情況下，產生某一種所謂「民主」。而在中國這個情況下所產生的民主，可能不是西方民主的形式，所以如果你用西方民主的形式去看中國有沒有民主，我覺得根本是錯的。可是我這樣的說法，西方的學者會覺得我這是在替中國解釋它沒有民主。

溫：您會覺得今天的國際局勢也碰到這個問題嗎？世界各國好像要爲了西藏的人權問題來抵制北京奧運，在比較深的層面好像跟您提到的似乎也有關聯？您之前提到，美國的學者往往假設了一個民主的終極目標。

成：對，我是不太能認同。不過，西藏這個問題我都不大願意談，因爲我覺得在臺灣，好像不太能談這個問題。

溫：爲什麼呢？

成：雖然我會提醒人家，這個問題可以從不同的方面來考慮，可是我當

然也不會說好像中國在處理這個事情做得很對，我是覺得他做得不對。可是，中國也沒有人講得那麼差，它有它的道理。我以前寫過文章，講中國少數民族的政治。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在很多政策上，其實是獨惠少數民族的。如果真如大家所說，中國都是在壓迫少數民族，那要怎麼去解釋一些顯然偏少數民族、讓很多漢人都不高興的政策？

所以，共產黨也有它一套想法。我開始進行研究時，也覺得共產黨怎麼去侵略西藏呢？於是我就看了一點東西，其中當然有一大部分是他們自己的宣傳，可是也透露出他們的想法。這也就聯繫到現在講的宗教等各種各樣的問題，或者說有沒有一個超越宗教的價值。

有些宗教的教義本身可能就有性別歧視的成分，那麼我們要如何看待這個宗教？現在有兩種做法，一種就是重新詮釋教義。像是關於可蘭經的研究發現，可蘭經裏面沒有歧視女性，反而有助於性別平等，是經過後來的詮釋才變成現在這個樣子。另外一種當然就是

說，這個教義裏面就是有性別歧視，但教義並不是死的，我們還是可以加以改變。

西藏有很深的 hierarchy，有很深的階級問題、對奴隸的剝削或是各種的懲罰是很嚴厲的。那共產黨就說要來解放，廢除奴隸制度，所以就是你要從什麼觀點去看這個問題，需要具體去分析，而不是用一個普世的價值觀去套。西方的政教分離也是經過滿長的鬥爭，但是西方從這幾百年來政教分離的傳統來看，就不太能理解中國的這種……

溫：馬克思也批評民主政治，您好像也從這個角度去看，民主也還是一個可能被過度的階段？

成：對，不過這種話我也不太敢說就是了，會被別人可能丟雞蛋的。

溫：您覺得美國人在這種方面滿根深蒂固的？

成：我是這麼覺得。

溫：您剛提到關於正統的問題。如果說黃宗智不被視為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那什麼叫正統？從所謂「正統」概念去看中國的話，是從什麼問題出發

的？

成：這我要想一下。不過我覺得，認同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從所謂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這個觀點去切入，視之爲一個歷史的 transition，進到社會主義裏面所產生的種種問題，所以在分析中國的時候，會從這個角度去看。這個 transition 還是回到所謂正統馬克思主義的階段性改變，這就是馬克思的階段說。如果要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去看中國如何從一個所謂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的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過程中所產生的種種問題。這裡頭也有很多爭論，這不是以一個想像的社會主義，然後去問中國有沒有變成社會主義，因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是土生土長的。有一陣子有滿多人——至少在社會科學，而不是歷史的領域——在討論的。會比較一些非洲的國家、中國、古巴，去討論不同的社會主義過渡的路徑。這種研究比較被認爲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做法。

溫：正統馬克思主義有討論社會階段轉變的主要動力從何而來嗎？他們如何看待中國的生產關係？又怎麼看待社

會階段的演變？

成：我覺得很多中國的討論都比較重視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跟西方的差異。多數都會回到毛澤東，展開辯論：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是一個什麼樣的馬克思主義。昨天我在整理資料的時候，還看到一篇蘇聯學者寫的文章，批評毛澤東，所以還是有人會說，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其實不是很正統。

溫：圍繞在毛澤東的爭論裏面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他到底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您如何評價這種觀點？

成：我覺得這沒什麼重要，哈哈。不過，我覺得對西方來講，這點好像很重要。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很重要的。所以圍繞著毛澤東的辯論就變成很重要。西方在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時候，都會提到毛澤東，所以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有什麼貢獻，引起了很多的辯論。

溫：現在中國大陸官方的意識形態還在談社會主義初階論、生產力跟生產關係，這有實際的意義嗎？大陸的官方講的是這套馬列的語言，但其實已經在

走資本主義路線了。您怎麼去看中國大陸官方的意識形態跟實際之間的明顯落差？

成：這我只能亂講。至少以目前來看，對中國城市的遊民來說，也許他們也不是很了解社會主義是什麼東西，只是說以前好像大家都有飯吃，可是現在卻不是如此。這種差距是很實際的東西，沒有什麼理論。當然你可以從政治學來看，就是如果放棄共產主義的話，就沒有什麼合法性，以後要怎麼支持一黨專政的局面？現在大家都是這麼解釋。可是另外一方面來看，放棄共產主義可能真的會有一些不好的實際結果，所以唱這個調子還是有其具體用意，但實際上是做得很差。當然我覺得這裏面可能還牽涉到鄧小平跟毛澤東的差距或是劉少奇跟毛澤東的差距：是不是要先富起來，也就是生產力跟生產關係的問題。也許有些人會說劉少奇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因爲他以發展生產力爲優先，毛澤東則是以生產關係爲主。問題是，你已經有了一個社會主義革命，那麼現在要怎麼退回去？那是個很具體

的問題。如果你不去注意生產關係的問題，等到生產力發達了以後，難道還要再來一次社會主義革命嗎？

溫：您對這個大陸「新左」的出現有什麼評論嗎？

成：其實我沒什麼評論。我的朋友現在都是反正兩邊都不講話。

溫：大陸的朋友也是這樣嗎？

成：就是大陸的。新左的跟不是新左的，兩邊就都覺得對方是錯的。

溫：您為什麼會從社會學跨到傳播研究？

成：我在芝加哥大學的時候，念的是大眾傳播。我當時是去芝加哥大學的 Graduate Library School，裏面的一個領域是大眾傳播，這也是滿奇怪的。可是那跟芝加哥大學的圖書館學是有關係的，它的圖書館學最重視的是閱聽人研究就是 audience studies。所以最早的對讀者的調查、讀者怎麼看書，這些都是芝加哥大學做的。我那時候去是在這個 field 裏面，所以我的論文是做《中央日報》跟《人民日報》的比較研究。一九六四年，我回到臺灣，在台大開大

眾傳播的課，我相信那是第一次臺灣有人開這個課。半年以後，我回去了，就沒怎麼做大眾傳播，不過我的博士論文裏面有一章是寫夏威夷的大眾傳播。後來在臺灣這邊，牟校長要我去做傳播學院院長的時候，我就覺得還是要把大眾傳播的東西弄回來看一看，所以那時就又寫了一些東西。

退下來以後，因為我一直在弄我父親的東西，漸漸對他的東西越來越好奇：成舍我這樣一個人在中國近代史的定位到底是什麼？我對這個問題還是很有興趣。兩、三年前吧，我去哈佛參加會議，McKinnon 有一篇文章就講成舍我。我是覺得他那個文章有點亂寫，也批評了他，葉文心也不喜歡這篇文章。我回來以後，就展開舍我紀念館，開始做新聞史的研究。

不過我的感覺是，大陸跟臺灣對於新聞史的研究其實是很像的，還是很傳統、很編年的。大陸做了很多這種工作，其實做的都蠻好。像方漢奇，大家都尊稱他是大陸新聞史之父，他的書真的都可以弄一架子，那可是每一本都是

片面的。比如他很有用的一本書就是談新聞之最：最早的報紙，最大的報紙，最小的報紙，最老的新聞人之類的。他編很多這種東西，但是沒有什麼問題意識。臺灣也是一樣，幾個新聞史的東西也都還是在傳統的史學裏打轉。

美國跟歐洲就不太一樣，他們比較是提一個問題，然後去做一些研究。

我覺得 McKinnon 在哈佛的會議上點出一個重要的東西，很多人研究報紙是把它當成資訊的來源，主要是爲了解別的東西，而不是理解那份報紙，比如從報紙副刊的內容來看現代性，把它看成 source，沒有把它當成 subject 去研究。

現在開始有一些書出來，所以我們才想到要做系列研討會。可是因爲做這種研究的人幾乎都沒有傳播的人，因爲傳播這個領域基本上不重視史。像世新根本找不到人去研究新聞史或傳播史。把報紙當成 subject 來研究的時候，常常都是紙上談兵，因爲他沒做過報紙，對報社的組織也沒有什麼理解，對報紙到底是怎麼生產出來的不太清楚，所以他們把報紙當成對象來研究的時候，最後還是

會變成內容文本的研究。所以我在哈佛的時候就說，這是研究新聞史最大的問題，所以才搬到世新來做第二次的研討會。但是很不幸的，世新也沒人研究這個，所以我自己都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不過，因為有世新的這個階段，明年會在柏克萊開會。葉文心就說我一定要寫一篇文章談成舍我，以所謂「傳統知識份子」的角色進入報業，從人文辦報到企業家辦報的轉型過程中，成舍我到底是佔有什麼地位。我們現在是用媒體知識份子的方式去思考這個問題。目前大陸針對媒介與知識份子有個很大的辯論，但我們是覺得他們其實只是討論媒介發展到現在，有很多知識份子透過媒介去說話，就是所謂知識份子的公共性。可是，知識份子是不是因此喪失了公共性。可是我們講的知識份子其實是進入媒體工作的知識份子，他們會受到媒體組織的侷限，那麼這個侷限是什麼？這跟新聞教育的關係是什麼？當知識份子進到媒體去工作的時候，他還算不算知識份子？為什麼成舍我在北平要辦學校？他看到了什麼？

像歐美的新聞史，就會從一些問題開始去發問，所以從大陸來這裡做博士後的唐海江，來了沒多久就一直跟我講，他都不知道怎麼做研究了。他以前做的那些研究、看的東西好像都沒意義了。他現在重新學著去找問題，一天到晚來找我們談，要做什麼問題。他回中國之後一直有來信，說他現在要在湖南成立一個媒體研究，要開始提問題，然後做研究，而不是從一個比較傳統的方式去做。

唐海江是學歷史出身的，這邊來講的話，唐志宏也是學歷史的。不過，兩個人的環境非常不一樣，一個在大陸，一個是完全是臺灣這邊訓練出來的。唐志宏是政大歷史研究所畢業的，他的博士論文本來是寫上海小報的，後來我把他找來做新聞史，他掌握了一些成舍我的材料，對這個非常有興趣，於是就跟著指導教授商量，他的指導教授反問他為什麼不寫成舍我？結果他的博士論文就改成寫成舍我，已經寫完了。他說張玉法告訴他，這是寫新聞史的一個突破，但是他的老師告訴他，你現在寫的東西

我們搞歷史的人根本看不懂。我覺得這兩個人就代表兩個很傳統的中國史學研究報紙的一個例子，跟我們學社會科學的人去研究新聞史是有很基本的不同。

溫：這樣聽起來，您企圖在新聞史建立一種新的典範？您也看到兩邊的問題，新聞這部分好像變得很邊陲，只是在印證某個主題而已。臺灣跟大陸的研究又太流於瑣碎，問不到問題，也都面臨典範的危機。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舍我中心將來在訓練學生或是課程安排方面有什麼樣的規劃？

成：如果真要說的話，其實我對世新滿失望的。在籌劃舍我紀念館的時候，我一開始是想把它做成一個新聞史研究中心。可是學校的意思是，我們做一個紀念館就好了。創辦人家都應該紀念，而他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所以這個研究好像是圍繞在成舍我上頭，但我現在把它弄得很大，有一些人當然有點聲音，說學校也沒有幾個人搞這個東西，就是我自己弄而已。所以像夏春祥老師參加我那個讀書會，也做這方面的研究，我就覺得很好，不是我

一個人在唱獨角戲。現在也有些博士生對新聞史有興趣，所以還算不錯。但這不是我們傳播學院要推動的東西，所以雖然有些老師會很支持，認為這是很重要的東西，可是基本上也沒有這種課，研究所也開不出。

其他像是公廣系、廣電系也不重視這種歷史研究，覺得沒什麼用，學生也覺得沒什麼用。我不知道如果我不做的話，是不是這個新聞史的研究就沒有了？其實我滿希望把它制度化，這也是我弄這個紀念館的一個重要原因。

如果沒有制度化的話，人離開了就不見了，什麼都沒有了，現在至少還有一個舍我紀念館，所以我一直都希望舍我紀念館跟新聞史研究中心是連起來的。一方面努力，如果說有很蓬勃的研究成果——當然辦研討會是一種可能，也可以出書——我覺得就會好很多。

當然，出書不可能是馬上就有的，如果是有計劃地翻譯一些新聞史的好書，那也是可以做的事情。

溫：您回顧學術歷程，有沒有什麼覺得比較值得驕傲的個人研究，或是有

什麼遺憾，本來想做沒有做的？

成：我有很多想做而沒做的事。

溫：那有沒有覺得很滿意的研究成果，或是說開拓性的領域？

成：其實我覺得我做的很多東西都有一種突破性，也許做的不是很好，可是我覺得我的一些想法的確是沒人這樣想過的。同時，我嘗試的一些東西，當然有的不是很成功，但也都是沒人嘗試過的。這裡有一個問題，這也是後來我在世新弄社會發展研究所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在美國從事社會學的研究教學，前面我也講過自己的一些經歷，就是對性別、種族、階級這種壓迫的一些理解。這會讓我對社會科學到底對這些東西的改變有什麼用？我在美國擔任Asian American study center的director的時候，做了一些不太見容於當時的事情。

溫：離經叛道啊。

成：嗯，離經叛道，現在想想是很不可思議的，不過因為在當時有一定的歷史條件讓我可以這麼做。比如說我做director的時候，用列寧的那一套，弄了一個「中央委員會」，想想有點可笑。

我因為那個時候擔心保守勢力把它看成一個太左派的組織方式。

溫：您是說用那個民主集中制那一套？

成：對，對，我們把它叫做CC。我們知道它是central committee，但寫的是coordinating comity，意義完全不一樣，名為協調委員會，實際上卻是中央委員會。我找來了學生、職員跟老師這三方面的代表。這種研究中心早期是非政治性的，都是抗爭得來的。黃宗智也做過director，後來被學生踢走了，說他是一個mandarin。

其實黃宗智跟我是有一段故事的，我去UCLA是黃宗智把我找去的，他很欣賞我的碩士論文。可是等我去的時候，他已經被學生趕走了。反正就是一個很奇怪的情況。可是後來我進社會學系之後，大概是過了一、兩年。當時黃宗智被趕走，後面來一個人又被趕走。學校有一個search committee，是在找director，就叫我去做。當時我就跟學生開會討論，我來做是有條件的，就是要成立這樣一個CC，組成是如何，然

後，如果我覺得這個理想跟你們差很遠的話，我會辭職不幹。如果你們任何一個人認為你們的理想跟其他的人有差距的話，請你們辭職。我說，因為學校是不會承認這樣的一個組織的，只承認它是請成露茜來做這個director，所以成露茜是要負責的。因為是有這樣的關係，所以我要有否決權。可是我如果經常動用否決權的話，就表示我跟你們差得很遠，所以我會走。大家都同意這樣的組織方式，所以我就進去做director，一做就是十六年，所以是全美國歷史上最久的一個director。

可是，這個委員會的運作是非常理想化的，所有的決定都要在委員會中討論。然後，大家的薪水都是按照需求來決定，學校當然不會理你這一套，反正教授就是教授的薪水，秘書是秘書的薪水，學生就是工讀金麼。

我們不能打破這個東西，可是我們能做的就是道德勸說，基本上這是我們大家信仰的東西，像我們的秘書是個單親媽媽，帶著兩個小孩，可是她薪水是最低的。我們就覺得她應該是拿最多

的，像我們沒有什麼負擔的人，應該把多餘的錢拿出來重新分配。

溫：這是按勞分配的做法嗎？

成：這是按需，完全是共產主義式的。一開始跟我在一起的這批學生，其實我們大家都是左派，而且他們是通過政治鬥爭來成立這樣子的一個東西，所以大家的理想性都很高。因為都很年輕，所以他們對這種做法非常認同，所以也就沒什麼問題。那個時候我們這個中心的進展是最快的，我們也是最早出雜誌的。*American Asian Journal*就是我們中心出的，到現在已經二十多年了。而且每一本書都暢銷，第一本書叫*Roots*，賣到十七、八版之類的，後面出一本叫*Counterpoint*，也是非常radical地討論種族問題，尤其是從亞裔的觀點去討論，所以是把越戰跟美國的對亞裔的壓迫剝削連在一起討論。這些在當時都很轟動。

美國在面試的規矩是很嚴格的，你不能問人家的信仰、政治思想，只能問他能不能做這個工作。可是我們都會去設法了解這個人到底是什麼樣的思想，

同時根據這個去決定要不要用這個人。做很多事情就是有點違法，可是我們這個中心是非常成功的，從學術上來講，也是非常成功的。我們透過很大的鬥爭——包括用論述跟實際上去坐在校長辦公室的門口——去取得的成就，打破了UCLA對少數民族老師的延聘，強迫他把一些名額弄出來，找少數民族的老師進來教書。那這些是很引以為傲的。

我們那時另外的一個做法就是結合研究跟實踐。在我們這個研究中心裏工作的人都要真正下去，我們的研究也是以社區的問題為主。所謂的問題就是：他們的問題是什麼？當時在china town的左派也分為兩派，在那邊做一些組織活動。因為china town的經濟不好，而且剝削的情況很嚴重。一派叫做「義和拳」，這是美國勢力很大的一個華裔革命組織，以左派自居。另外一個好像叫workers point，不只是華裔的組織。這兩個組織在china town爲了要推動左翼運動，一邊說要成立工會，一邊要成立合作社，雙方有很大的爭議。最後兩邊就說我們請成露茜來開會，我說反正我

們會去做一個研究，做完之後會請雙方來開會，大家再來討論要怎麼做。後來就有幾個研究生、大學生去做了一個研究，挨家挨戶去做訪問。結果發現china town是以車衣為主，而車衣的工人跟老闆通常都有親戚關係，所以不可能用階級去organize，所以最後就是成立合作社。可是在這個過程中，因為我們挨家挨戶做了訪問，所以我們知道家暴、物價之類的問題，所以又在這個地方成立一個Good callout，一個買菜的集團，然後成立一個family news letter，用西班牙文、中文、英文三種文字去油印。當時也動員了一批北一女校友會的人去做這些事情，最後就變成一個結合UCLA、社區跟很多一般人的力量，成立了這麼多組織。在經濟方面，成立了J call out之後就開始賺錢，但是問題就來了。因為賺錢了以後，盈餘要如何分配？我們當初進去的時候是因為覺得像是小孩子在母親車衣的時候在地上亂爬亂跑，很不安全。所以我們希望把盈餘拿來做托兒。可是實際上車衣工人不願意，他覺得這是沒什麼關係的，他希望把盈餘拿

回家，來改善生活，比如說買電視、洗衣機、冰箱等比較消費性的東西。這不是我們的想法，所以漸漸就有前面說的「靠不住的知識份子」就會覺得沒什麼意思，覺得大家做得很辛苦，就是爲了讓他們買這些消費品。黑白電視有什麼不好？爲什麼要彩色電視？也有人這麼想，所以漸漸就有人出來了，然後來整個UCLA的團隊就退出，把組織交給他們自己去運作，好像過了一年之後也就垮掉了。

這對我當然是一個很大的教訓，可是它也讓我看到你真的是可以結合研究跟實踐，只是我們沒做好這件事情。後來我有機會回到臺灣，當時世新從院改成大學，需要有些研究所。我姐姐就要我來弄一個研究所，我說如果你讓我弄一個我要做的研究所，我就來。她就說「好」，你去弄，結果就弄了社發所。所以社發所「有學有術，實現基層，回歸理論，再造社會」這十六字箴言，的確代表了理想。

溫：所以您把美國的經驗搬回社發所？

成：對，所以在社發所的時候，我要求所有的人，包括所長在內，都必須有一個實踐的領域。

溫：包括關懷弱勢這一塊嗎？

成：都是關懷弱勢，可是你要有一個實踐的領域，你要不然是在小學裏面做基層的教育工作，要不然就是像夏曉鵬，就是做外籍新娘，陳信行就是做工運，你要實際去參與，而不是只在那邊寫文章。

溫：這跟您去研究您父親作爲知識份子的角色有關嗎？就您的經驗來看，知識份子真能改變這個社會？

成：我不覺得知識份子能改變社會，不過我覺得知識份子要透過社會實踐才能對社會有貢獻。我是一個很重視實踐的人，但是在這樣一個氛圍下，我覺得很不容易。

溫：您剛提到您的理想有它很特定的環境，譬如當時美國左派的氣氛很濃，但是現在的環境已經有所改變？

成：你不用講現在，後來我們那個中心也操作不下，因爲我們一起開始弄的這些人也漸漸長大了嘛。有人結婚

了，開始有小孩，太太可能不太贊成，因為收入平白減少了，就不太同意這種做法。它又沒有強制性，基本上是你願意才這麼做的。願意的人少了，當然就沒有東西可以分配了。後來又有新的人進來，就很難去inforce這樣的做法，所以漸漸也就沒有了。

不過最後讓我比較失望的是，因為我們當時辦這個centre的時候，主要的亞裔的人基本上是華人、日裔。所以整個centre的幹部大概就是這兩種人，當時我們跟學校鬥爭的時候，學校就說因為你們根本就沒有這個level的人可以做這種事情，所以就不能有這個資源。比如說教課，學校就說你們那裏沒有人的學位是研究Asian American Studies。我們就說你根本就是莫名其妙，因為本來就沒有這個領域。我們說學校都沒有一個終身教職的人是亞裔的，整個社會科學都沒有。這是為什麼？不可能沒有這樣的人啊？學校就會說這樣的人都不合格。我們就到處去找這些人的名單，給了學校。學校的解釋都是說你們沒有夠格的人，但是Asian American Studies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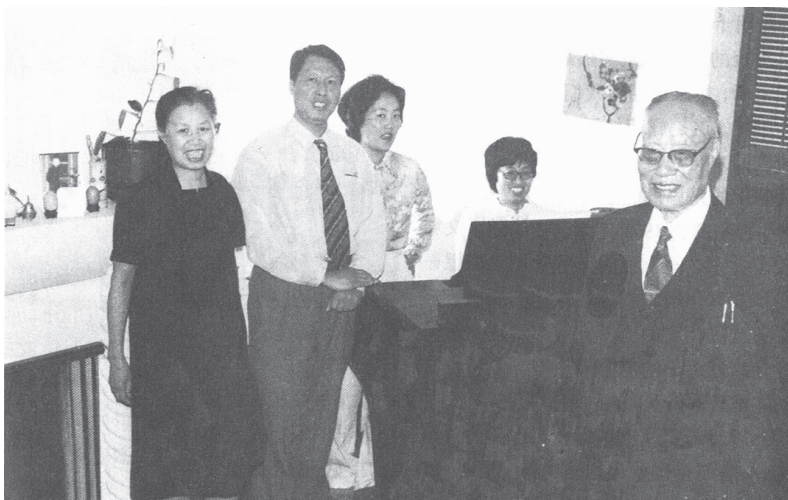
來就漸漸有新移民進來。校方對此有兩個反應。一個反應就說新移民不算Asian American，因為他們是第一代，是外國人。我對這個就很反感，我自己也是第一代移民，同時也不可能這樣去排除別人，而且一九六五年之後都是新移民，那有很多人，這些人都被排到外面去。我們現在研究華僑史、日僑史，那都是第一代的人，所以這個講不通。

第二點就是這些新移民沒有在美國待過，所以他們不了解美國人做事的方式，根本不懂什麼叫民主，英文也講得不好。所以不能請他到我們的中心來做比較好的職位。我就很火，他們把白人對我們的那一套，又拿來去對菲律賓來的人、韓國來的人，所以後來我就跟他們講，這個centre現在已經不合於我的理想了。最後我覺得我不要帶領這樣一批人。所以不用講到臺灣，我覺得後來美國整個的氛圍，左派的衰落跟整個的經濟情況與高等教育的發展，進來的學生也漸漸沒有那種理想性，也沒有那種反省的能力。

溫：這是最大的遺憾嗎？

成：我最大的遺憾就是我没有能夠更好的推動研究跟實踐的結合。

溫：所以成就也在這裡，最滿意的事情也在這裡，然後最大的遺憾也在這裡。



▲一九七九年九月，成舍我與他的四名子女於洛杉磯重逢。左起：成幼殊、成思危、成嘉玲、成露茜、成舍我。

再見Lucie（以下文章按追思會出場序）

紀念成露茜教授

葉文心

我與Lucie最後一次相會，是在去年的十二月。那時我父親逝世不久，Lucie跟我喝下午茶，一起談我們的父親們。她的父親過世，到明年就是二十周年。二十年前，她寫過一篇紀念父親的文章，一面發抒深摯的感情，一面痛切

反思父親巨大的身影在女兒生命中的意義。父親對她的影響極深。我在報章上讀到，至今印象仍然十分深刻。近年我們交往，主要的因緣，也就是舍我紀念館的工作。Lucie檢視舍我先生的畢生行誼，思索父親在中國近代史上到底是什麼樣的人物，想從他辦報的種種出發，從而開闢中國近代新聞史的研究領域。我們就這個大題目，分別在國內外開過三次相關的學術討論會。Lucie希望看到新聞傳播學與史學作新的結合，寫出新的以新聞活動本身當作主題的歷史。

她的眼光銳利，思維深刻，對研究者來說，充滿了啓發與開創的意義。

新聞史並不是Lucie的本行。中國新聞史的研究也不是一個已經開闢成熟的園地。Lucie在世新大學領導這方面的研究，必須有不少原創性的衝勁與見地。而我們回顧她這一生的種種，這種開天闢地的氣魄與執著正是她學術事功上的一貫精神。

Lucie原本所學的是音樂。她彈得一手好鋼琴。我與她初次結緣，也就因為鋼琴的緣故，小小的時候作了她的小學生。不久她臺大二年級，放棄外文系，拿了音樂獎學金，自己去了夏威夷，這個出國的決定，在臨走兩個星期之前才通知她的父親。出國的時候所帶的不足百元美金，全都是自己家教及母親張羅的結果。Lucie與父親之間，彼此以獨立

自主、自立自強相期許，從這個小故事上可以看出端倪。

Lucie到了夏威夷，一連打了五個工，對美國社會階級、種族、性別歧視，產生了深刻的認識。在夏威夷得到社會學博士學位以後，Lucie受聘擔任洛杉磯加州大學社會系教授。她的研究，著重美國華僑移民史中的女性。她看過了一百多卷美國人口普查資料，找到四千個中國女性。然後又在加州各地遍訪各地的墳場以及城市各種註冊檔案。她的研究，展示了十九世紀華南移民過程中，女性在西方的資本主義機制與中國社會男權體系兩重約制之下，淪為娼妓的故事。然而即使是娼妓，中國婦女也並不是個個附庸在男人之下。Lucie在研究中發現了不少女性得到人身自主的故事。她的作品立論大膽，在當時保守

的學院氣氛中不乏爭議，但是她的作品歷久彌新，成為亞裔研究及婦女史上的開山之作。

Lucie在洛杉磯加州大學任教前後超過二十年。她是亞美研究中心的創辦者，主持中心的研究工作長達十七年。這個中心的創立，在美國高等教育史上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一九七〇年代的美國，國內校園左右兩派爭辯激烈。Lucie作為社會學者，相信學術理論應當與社會改革的實踐相互結合。她領導中心，在中國城逐家挨戶進行社會調查，組織社會行動，把學校的力量投注在社區改造上。這樣作學問，從七〇年代美國大學保守派的角度來看，未免不務正業。Lucie不怕爭議，帶領一批志同道合的學生與同事，扎扎实實地證明，原創性的學術工作跟社區改造可以結合。這種把「街頭」帶進大學「殿堂」的氣魄與執著，使得Lucie成為亞美研究的開山祖師。

Lucie在美國期間，比尼克森總統還先進入大陸。她去大陸的原始動機是為

父母親找到留在大陸的哥哥姐姐。在這期間她見到周恩來夫婦，也對毛澤東思想產生相當的認識。在生產力的發展與生產關係的調整之間，她傾向後者，對弱勢群體的境遇高度關心。她的教學，不少精力便投注在如何讓弱勢者認識到自身的處境，能夠站起來自行發聲，進一步促進社會公權力的民主分配。

Lucie因為她父親過世，放下了在美國的一番事業，回到臺北，接下《立報》，開辦《破報》，主持傳播學院，開創社會發展研究所，成立舍我紀念館，推動中國近代新聞史的研究。此中種種，不但在學術領域上開創了新天地，而且在風格上在在表現了她的欽奇磊落，無懼無私，不惜把學術殿堂變成公是公非的戰場。

Lucie曾經說過，她從小到大，所最期望得到的，便是父親的讚許。我們最後一回相聚，她以半開玩笑的口氣表示，她已經累積了豐富的材料，準備以一貫離經叛道的精神，寫一本暢銷書，書名叫做《成舍我與他的女人們》，描

述父親與他的三個妻子、四個女兒的故事。以Lucie在女性主義上的見識與學養，如此的一本大作，想必難免包含些讓她的父親有些許震撼的驚人之筆。

這本書我們從此無緣讀到。我們今天送別成Lucie教授，我們送別的不但是——位在學術領域中有獨特開創的學者、在社會實踐上曾經披荆斬棘的行動者，我們送別的更是一位一生自立自強、奮鬥不懈，為大公大義而不畏艱難非議的公眾知識分子。Lucie所到之處，周遭的人們便不能繼續對他們素來習以為常的一些現象不聞不問，便不能不做新的反省與警惕。她對俗世的挑戰，由左而右，橫掃千軍，鋒芒所至，對象無分「美帝國主義」或「社會主義走資派」。而正本溯源，她的自立與自省、好學與深思，無懼與大愛，恐怕得歸結到她的家世與父教。在我們看來，她的此生，絕不負父親的期許與教誨。我們祝福Lucie身後有知，此生可以無憾。

（作者現為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來不及跟成露茜老師說的三個感謝

郭良文

認識成露茜老師是在一九八七年時，當時她是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系教授，我是剛進該系研究所就讀的學生。記得剛到達美國、還在調整時差的一個晚上，熱心的王振寰學長與蔡建仁老師驅車載我去一個超大型的漢堡店吃飯。第一次知道Lucie這位老師，就是在這個場合。王振寰學長告訴我：「如果有困難，可以去找Lucie，她人很好、會幫助台灣的留學生。」如此一席話，開啓了我跟成露茜老師的師生緣分，算一算，至今已超過二十五個年頭。

學生沒有做不到的事，敦促我四年完成碩博士學位

要成為Lucie的學生，得先經過嚴格的考驗，尤其是底子與訓練還不夠好的學生，若找Lucie指導會覺得很痛苦。我曾經就有過這樣的經驗。碩士班一年級

我請Lucie老師擔任論文指導老師，好幾次跟她的討論讓我備受挫折，她總是指責我沒把書讀懂，甚至質疑我到底有沒有花時間讀書。對於一位滿懷理想、剛從台灣遠赴重洋到美國來讀書的留學生而言，不啻是一個重大打擊。我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不適合念社會學、不適合從事學術研究工作。於是在碩一下半年時，我產生了轉校、轉系的念頭，並向二十餘所美國大學的法律學院索取Juns Doctor (J.D.) 學位的申請資料，幾乎想要放棄社會學，轉行去幹律師了。

不過，還好與社會學的緣分尚未結束。在與Lucie某一次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討論中，她終於肯定我的表現有進步，說我改進的方向是“on the right track”，並鼓勵我繼續努力。原本我已經決定要在這一次的討論中，向Lucie老師表示我打算換指導教授、或計畫轉系念別的學科，沒想到，Lucie老師的一番肯定，讓我跟社會學繼續結緣，到今天

仍慶幸當時沒有做成轉系的決定。

Lucie老師對學術的標準與嚴謹程度是很高的，她講究創新、討厭守舊思維，要求學生都能自成一家之言，跟不上她的人會覺得萬般痛苦，在UCCLA時就曾經有一位大陸留學生跟Lucie老師多年，最後還是必須換指導教授。但跟著她的學生都會發現，她的思考格局能與全球的最新發展接軌，不受拘束，且創新想法多，是一位具有國際視野的學術工作者。

在Lucie老師眼中，「學生沒有做不到的事」，也沒有不可能的事。當然她並不是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她所展現出來的是一種精神、一種意志，也就是要求學生不屈不撓、勇敢面對一切挑戰。在我就讀研究所時，Lucie老師看我的表現進步良好，積極鼓勵我在四年內完成碩、博士學位。我當時心裡想說：「怎麼可能！在社會系能夠五年或六年完成就很不錯了，怎麼可能能在四年內完

成？」然而，在Lucie老師的指導與支持之下，我竟然真的做到了！同時我也破了系上記錄，成為UCLA社會系第一個在四年內，直接從大學學位完成博士學位的學生。這表現與其說是我個人的努力，倒不如說這其實是Lucie老師的成就與她一手栽培的成果。在我心中一直感謝著Lucie老師敦促我四年完成學位的事，但從來沒有將我的感激告訴她，這是我第一個來不及跟老師說的謝謝。

尊重人的主體性，支持我離開世新大學

我跟世新大學的緣分，與Lucie老師密不可分。UCLA畢業後我就接受成嘉玲校長與Lucie老師的邀約，返台至世新傳播學院工作，前後總共服務了十二年。Lucie老師接下父親的擔子，負責台灣立報社的工作，創辦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後來又擔任世新大學傳播學院院長的職務，不眠不休地為父親遺志、世新大學的發展而努力。她推動弱勢發聲、弘揚另類媒體的發展，強調學

術與參與、理論與實踐合一的重要性，為台灣社會學與傳播學圈樹立典範。Lucie老師身上留著與父親成舍我先生相同的血脈，堅強的毅力、不屈不撓的精神，在我認識的人當中無人能比，這也是許多人相當佩服Lucie老師的地方。

二〇〇二年暑假，Lucie老師、世新大學余致力副校長、世新助理與我等一行人，前往巴塞隆納參加IAMCR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年會，目的是爭取二〇〇三年由世新大學主辦IAMCR年會。由於我們比Lucie老師早幾天到巴塞隆納，所以除了到機場接機之外，我們還說可以當Lucie老師的導遊。有一天，大家到了巴塞隆納的一個廣場，廣場上有一座雕像，Lucie老師問我們說：「這個雕像上面的人物是誰，為什麼作出這種姿勢，有什麼歷史典故？」這一下子就把我們所有人問倒了，她還說：「你們這是怎麼做導遊的，連這些都沒有去弄清楚。」從這裡可以知道，Lucie老師「求甚解」的嚴謹心態，和她做學問的態度並無二致。

二〇〇三年我受邀至交通大學任教，決定要離開任教了十二年、培養我茁壯的世新大學。Lucie老師雖然很不希望我離開，也三番兩次請當時世新大學校長將我留住。但我最後還是決定要換個環境、前往交通大學時，Lucie老師並沒有生氣，也不認為這樣會對不起世新大學對我的栽培。在我離開之後，Lucie老師仍然對我報以支持與肯定的態度，經常聽到別人說她誇獎我的許多優點。她也數次詢問我重回世新服務的意願，甚至屬意我擔任傳播學院院長一職。雖然我辜負了她的期望，但她從來不會用壓力、強迫或指責的方式來要求我，她仍然尊重我的選擇，這也印證了Lucie老師對人的主體性之尊重。在決定離開世新大學到交通大學服務的這件事情上，她相當尊重我的決定，這股支持的力量讓我感激在心，這也是我還來不及當面感謝Lucie老師的地方。

照顧學生，臥病為我寫下最後一封介紹信

第一次發現Lucie老師身體有恙的時候，是在二〇〇六年暑假，她跟我太太與我一起出遊到希臘群島。我們去了好幾個坡度陡、階梯多的小島，開始發現Lucie老師有行走上的困難，上下階梯時需要攙扶才行。那年十月「舍我紀念館」開幕之後，Lucie老師的病情急轉直下，因為骨癌而住院開刀治療，前後療程長達半年之久。Lucie老師終於熬過來了，爲了珍惜與她的相處時光，UCLA曾受教於她的台灣學生們，決定要定期與Lucie老師聚餐。二〇〇八年初Lucie老師七十歲生日的慶祝，讓大家都感到很高興，能與老師在大病後重逢。

二〇〇八年暑假，跟Lucie老師一起到拉斯維加斯、大峽谷旅遊，這是Lucie老師手術後第一次出國，由於她的身體有多處骨頭損壞或流失，所以身上裝了很多鋼片來固定骨頭。除了過X光檢查時可能要出示證明文件之外，Lucie老師在機場的出入都是以輪椅的方式進行。即使如此，Lucie老師還是要證明她「老當益壯」。

她一心想去Skywalk（空中玻璃走

道）一遊，但由於這個地點位於大峽谷的西邊，離大峽谷國家公園很遠，開車需要六個小時，而且其中一段路面很顛頗。但因為她的學生黃順星的一句話：「妳敢嗎？」Lucie老師決定再遠也要去Skywalk證明她行。到達目的地，站在Skywalk半圓形玻璃走道上看著透明玻璃地板，下面是深邃的峭壁峽谷與科羅拉多河。由於太高、令人感到恐懼，所以我太太不敢走，最後我陪著Lucie老師走完了一圈。走在上面，挺難克服高聳的恐懼感，但在深達一千多公尺的大峽谷峭壁旁的玻璃橋上，我永遠不會忘記Lucie老師挑戰內心恐懼的勇氣。我們在大峽谷拍照時，在開車的路上不斷地尋找峭壁斷崖，以便讓Lucie老師可以站在驚險的峭壁上，拍完照拿回去給學生看。

Lucie老師一般不接受任何頒獎典禮的邀請，但她特別答應去參加二〇〇九年十一月所舉辦的「卓越新聞獎」頒獎工作，她完全是爲了她所指導的博士畢業生林照真而去的。原因是，與學生一起參加「曾虛白新聞學術獎」頒獎，可

以分享學生成就的喜悅，另一方面也是因爲林照真老師前些日子曾經歷喪女之痛，藉以安慰。

但骨癌畢竟是相當具有破壞力的疾病，去年九月間，Lucie老師、我太太與我再次出遊，一起到北海道，這也是她人生中最後一次旅遊。在結束旅遊回台灣的當天，她突然在一個天橋的通道中昏倒在地，昏迷了數分鐘，引起許多人圍繞關切，當她甦醒、眼睛張開後，第一句話就對關心她的日本遊客說：「Don't worry, I have no problem.」她

事後告訴我們說：「她並不擔心自己的健康問題，不會刻意去想它。甚至之前在住院動手術時，我也從來沒有想過死的問題，反倒是其他人比我還擔心、害怕。」由此可見Lucie老師心態的開朗與對生命的樂觀。我們相信直到她離開人世的前一刻，她還是樂觀的面對生命的一切。

由於我打算在二〇一〇年暑假結束後申請教授休假，到深圳大學進行一年的研究，剛好有一個機會可以試試看去申請深圳大學所提供的「鵬城學者」計

畫，但需要三封介紹信，其中一封要由

國外學者來撰寫，由於申請截止的時間很趕，所以我請Lucie老師看看能不能幫忙以UCLA終身退休教授的身分寫介紹信。我去見Lucie老師時，她不久前剛從醫院檢查完身體回家，身體忽冷忽熱，正臥病在床中。隔天，她就住進台大病房，自此就再也沒有回來了。這是我最後一次看見Lucie老師，除了介紹信事情之外，她還跟我討論有關五月即將舉辦有關另類媒體與新聞趨勢研討會的內容，生病仍不忘公事，這正是Lucie老師的最佳寫照，但是萬萬沒想到，這一次

的見面竟成永別。

這一封介紹信是Lucie老師去世前在醫院寫的，深圳大學的吳院長告訴我說，成教授所寫的介紹信與一般人的寫法不同，她不像一般人會誇獎一個人多好多好。在幫我寫的這封介紹信中，她很平實的呈現她與我的關係，說我剛到美國時英文程度不好，但經過努力之後，有很大的進步，她寫的是一封扎扎实實的介紹信，吳院長說：「我就是用成教授與你的師生關係，以及這封介紹信的內容來說服學校的評議委員。」雖然這次我依然來不及當面感謝Lucie老

師，但您人生中所寫下的最後一封介紹信，我會銘記在心、致上深深的感謝。

Lucie老師雖然離我們而去，但她會經幫助、提攜過的台灣、大陸地區的學生們，都會記住她那奮鬥不懈的精神、過人的毅力與高度挑戰性的視野。我們會懷念她無時不刻所展現出來的生命力，更不會忘記她的樂觀與親切笑容，以及高標準的學術要求。Lucie老師永別了，我會永遠記住妳這位生命中的貴人。

（作者現為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教授）

永遠的開拓者Lucie

夏曉鵬

一月二十八日晚，一下了飛機就近乎失魂落魄地趕回景美，焦急地想打電話問清楚為何Lucie突然離開我們，想

知道她走的時候是否吃了什麼苦，但我卻不知該打給誰才好，好氣自己過去沒有記下這幾年一直陪伴Lucie的阿英和蘭琪的手機號碼，衝動的想撥個電話給

Lucie，問問她到底怎麼回事兒？！你不是跟大家開玩笑吧？！

一月二十七日傍晚，幾位《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台社》）的同仁和大陸學界朋友剛結束一趟「紅色之旅」，回到廈門，大家的心情和思想上都處於飽滿狀態，晚餐後相約要在離別前好好

酒聚一下。趁著集合前的空檔，有工作狂的我急著回房上網收信，世新大學的台灣社會研究國際中心的巴戈傳來以「聽說Lucie過世了」為主旨的信件從近百封電郵中跳躍出來，我發著抖急切地搜尋其他信件，希望證明這只是個天大的烏龍新聞，想像Lucie興高采烈地跟我

們說：「耶！這件事非常有意思，媒體搞個大烏龍，我只不過住院靜養一下，卻被八卦地說成我走了，哈哈！」然而，接著看到的卻是學校發出的訃文，同時聞我嚎啕大哭了起來。不斷自言自語地反問自己：「怎麼會這樣？！」排山倒海而來的情緒淹沒了所有的理性，悔恨自己怎麼沒有在出發前去看看Lucie，更氣自己未曾當面向她感謝知遇之恩！

去年底曾想到送一個有特別意義的年曆給她，這是香港團體爲了幫菲律賓團體募款而做的，心想Lucie一定會喜歡的。但是，因爲忙碌，再加上自己重感冒，怕把病菌帶給Lucie，這事就一直拖了下來。大概是年初吧，爲了一月二十九日台社中心與校長開會的事，我打了電話到舍我紀念館，蘭琪說她去教育部開會了，二十九日她應該有空，待與Lucie確認後會再與我聯絡。等了兩三天還沒回音，便撥了Lucie的手機，不料是蘭琪接的電話，說Lucie發燒住院了，但狀況還好，要再住幾天。幾天後再跟蘭琪聯絡，蘭琪告知Lucie已出院

回家，狀況還不錯，可以打手機給她。Lucie在手機的另一頭，雖帶著一點疲倦的聲音，但仍像過往，當成笑話般的講著她如何在阿英返鄉的第二天便住進醫院，又如何把蘭琪給嚇壞了。我請Lucie多休息，別管其他事，她說：「我不知道你怎麼想這個事兒，我也想聽聽你怎麼看這種事兒。很多人期待你做多事兒，但你覺得這些事兒不一定要你做，你也讓別人去做，結果到後來搞出很多問題，你又要回去收拾，反而弄得更累。」她沒說是什麼具體的問題，我也沒有追問。這一直是我們互動的模式，除非對方主動提起，想要說什麼事情，不然我們不會探詢對方的事情。我只跟她說：「二十九日的會，妳不要勉強來，有任何意見請跟我說，開完會後，我會跟妳報告大家討論的結果。我二十二日去福建，二十八日回來，回來後再找妳出來喝咖啡，或者去妳家也可以。」萬萬沒料到，這竟是我们最後的對話！

二十八日晚，在廈門市的閩僑賓館房裡，一個人反覆地想著與Lucie最

後的對話，隨著集合時間分秒的逼近，我焦慮地擔心如何才能抑制不聽話的眼淚、若無其事的跟大家聚會。身為台社社長，我告訴自己不能因爲個人的情緒崩潰而缺席與大陸朋友離別前的聚會，於是不斷地告訴自己，Lucie一定不希望我因私忘公的！反覆以清水洗面後，我故做鎮靜地走出房門，遇到台社的瞿老師和鴻生，心想Lucie也是台社的顧問，我有責任在第一時間跟大家報告此事，原以爲自己可以控制的很好，卻是連自己也驚訝的再次崩潰，哽咽的結果是我們根本聽不懂我在說什麼。向台社同仁報告這個不幸的消息後，我一直用理智壓抑自己的情緒，努力的想工作的事，在餐廳裡努力地聽大陸朋友說故事、欣賞他們的智慧和風采，還跟著大家飲酒高歌，度過了充滿溫馨與熱情的一晚。大概是學會了Lucie不輕易讓人看見自己脆弱面的本領吧，同桌的大陸朋友沒有察覺我的異樣。我告訴自己，如果換成Lucie，她也會這麼做的吧！要哭，等公事處理完，回去房裡再一個人好好的徹夜地哭吧！

自從得知Lucie離開我們的消息，歷經一種未曾經歷過的痛，一種連自己也很不解，甚至是驚訝的、波濤洶湧的情緒。腦海裡反覆回憶Lucie的種種，思索為何對於Lucie的離去有如此強烈的傷痛，這才發現Lucie不僅僅是個德高望重的教授、同事，更是個一路身體力行，用行动闡述她的理想，用實踐豐富她的生命的先行者。她的離去，帶給我們的不僅是無限的懷念，更是許多面對自己生命意義的課題。

第一次見到Lucie是一九九三年，在Lucie創辦的北美華人社會學會（North American Chinese Sociologist Association, NACSA）的First Scientific Conference on Gender Issues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ies。那時才剛拿到碩士學位的我，壓根不敢跟Lucie說話，沒想到，會議的閉幕式意外地從Lucie手中領到最佳學生論文獎。一九九六年，利用返台做田野的機會，蔡建仁老師引介我與Lucie見面，再次見到Lucie，她邀我次年拿到博士學位後一起參與社會發展所的創辦。就這樣，向來難以跨越敬畏

師長的心理障礙的我，非常幸運地成為Lucie創立社發所的同事，這也成了為我事／志業定調的最關鍵的幸運。

創辦以「有學術·實踐基層·回歸理論·再造社會」為宗旨的社發所，是Lucie常說的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因為這是一個在台灣，甚至可能是全世界，首創的研究所。在美國有數十年教學經驗的Lucie，不滿於只強調“critical thinking”，卻沒有實踐的教學取向，同時，她常聽到台灣的社運朋友抱怨缺乏有進步思想和實踐力的年輕人，於是，她構想一個培養兼具批判思考與實踐能力的教學機構。

這是一個偉大的夢想。但到底要怎麼做？沒有前例可循。於是，我們做了各種實驗。這個前瞻性的夢想，在創所階段，確實吸引了不少有共同理想的學生。當時Lucie仍是UCLA的教授，台北、洛杉磯兩地奔波的她，沒有太多心力和時間投注在她創辦的社發所。很多時候，只有我一個人與一群異質性極高的學生日夜攪和，我們常通宵達旦地討論大小事情和籌辦活動，像是舉辦「亞

太婦女的吶喊」、「原住民學苑」、「遊民工作坊」，還有編寫國際合作手冊等等。有學生說當時的社發所像是搞學生社團，不像是研究所。在那裡，我們每天有新的夢想，也有新的實驗。但是，實驗做多了，難免在實驗室裡產生爆炸！其中有一個令她重創的事件，當時一群關心她的朋友不斷勸她不要太堅持，建議採取較為圓融的妥協方式，但明知堅持會重傷的她，依然決定堅持下去，並且在事件後從不批評相關的人，反而讚賞和支持他們後續發展出的工作。這些衝突的處理方式，在當下的我們或許覺得Lucie太沒有智慧，如今回想，看到的盡是她的執著與氣度。

社發所開始的那幾年，或許是Lucie與學生的互動時間太少，或許是大家都和我一樣，對師長總有那麼一點敬畏，甚至忍不住的想反叛，使得總是掛滿笑容的Lucie，卻讓學生卻步。「看不懂她到底在笑什麼？！」是當時某些學生對她的評語。

為了拉近她和學生的距離，我常邀學生在子夜《立報》下班後，找Lucie吃

消夜。漸漸發現，原來Lucie很愛跟學生聊天。原來她的笑容不是佯裝親切，而是真的享受一切新鮮事務。某次主持社發所講座時，Lucie覺得座椅太高，但試了幾次，總找不到調整座椅的機關，一位學生上前按了一下，座椅立即「咻」的一聲下降到她喜歡的高度，Lucie像個小孩似的開心叫著：「呵呵，好好玩，再來一次！」另一次講座開場時，當時已過六十的Lucie說：「我到現在還在想，我長大以後要做什麼？」引來全場哄堂大笑。

原本以為Lucie是尋大家開心的，但隨著與她共事機會的增加，我才意識到她真的一直在思考「我長大以後要做什么」。社發所、《立報》、《破報》……永遠是她工作清單的一小部分。記得一次社發所所務會議前，Lucie一進辦公室就急著分享她的重大發現：「我終於發現，一個人不能同時做二十件事情！」惹得我和當時的所辦祕書正慧又好氣又好笑的回嗆她：「妳現在才發現啊……」被我們回嗆的Lucie，完全不以爲意，如她自己說的，“Deep

down, I am still a baby!” 勇於嚐新的她，全身上下的活力很容易地感染身邊的人，但同時也因爲她有太多計畫和想法，往往使得與她共事的人爲她無法全心投入而心生抱怨。

在社發所創辦期的實驗過程中，產生不少摩擦，甚至衝突，我也曾爲了所務發展數度向她嗆聲。德高望重的Lucie卻從沒有因爲我對她的工作方法不認同而不高興，反而總是很認真地聆聽我的想法，並放手讓我去做我認爲該做的事。這一切，我曾覺得那麼理所當然，直到某位記者爲了寫Lucie生前事蹟的文章訪問我時反問：「妳說Lucie放手讓妳去做，那她是否曾事後對妳做的事不滿又再干涉妳做的事？」我才很認真的回想，真的，Lucie真的給了我無限的空間；作爲一個主管，她展現了無比的擔當，就算學校或其他單位對我們在社發所做的事不爲然，她從未回頭對我指指點點，也從未說她爲我們擋下多少子彈。

Lucie走後，我和幾個社發所的早期畢業生聊起她的種種，這才意識到，

Lucie真的爲我們撐開了偌大的空間。因爲她，我們才有機會思考和磨練基層組織工作和培力的理論與方法。也透過了Lucie我才認識到成舍我校長在創辦世新時的理想，以及世新的歷史價值。舍我校長的「手腦並用」校訓，Lucie將之發揚光大，成爲社發所創所精神的十六字箴言：「有學有術·實踐基層·回歸理論·再造社會」，而舍我校長在戒嚴時期收留和包容了許多異議分子，Lucie更進一步積極地爲培育兼備批判思想和實踐能力的下一代而打造機制，接辦《立報》、創辦《破報》和社發所。

如果沒有Lucie，現在的我，大概和絕大多數的大學教授一樣，躲在象牙塔裡想像社會該如何改造，只敢私下抱怨升等考評的種種荒謬而不敢做些不一樣的事。在Lucie身上我們看到一種大無畏的氣魄，她對於只會喃喃抱怨而不敢做些什麼事的人常感不耐，她總會反問：「那你覺得我們可以做點什麼？」她的尖銳提問，常讓人膽怯，以爲她老愛找人麻煩。和她共事久了，才瞭解她的提問不僅在於激勵我們行動，也同時是她

對於自己的提問。Lucie始終以一種無形的方式傳達她的信念：拒絕宿命，勇於戰鬥！

Lucie走了，我才有機會在紀念她的網站上看到她的口述歷史，發現很多她以前未曾說過的傳奇事蹟。她不是個愛吹噓自己當年勇的人，偶爾提到某些口述歷史中提及的事，也是以一種探究某個有趣事件的口吻玩笑似的帶過。細讀Lucie的口述歷史，最讓我感動的不是她那些數不盡的「豐功偉業」或是傳奇事蹟，而是她始終如一的冒險犯難，鏗而不捨地摸索、創造一種「研究」與「實踐」結合的方式，雖然這些嚐試中充滿挫敗、失望、孤獨、不成熟，但她總是正面地迎戰，思考下一步的可能。

許多與Lucie同樣在一九六、七〇火紅的革命年代成長的知識分子常以「年輕時天真幼稚」而輕率地否定了自己曾擁抱的理想、便宜行事地合理化現今自我與世俗的同流。Lucie從未否定自己年輕時的理想和夢想，而是不斷在挫折和失敗中重新站起。也正是這種拒絕輕率地否定年輕時理想的意志與精神，使

Lucie的離去攪動了我們後輩難以形容的情緒，以一種超越僅是懷念德高望重的教授的心情和思想，回憶Lucie帶給我們的種種。

Lucie轉任傳播學院院長後，因為少了社發所事務的共事機會，和她見面的機會也少了許多。總覺得不該打擾日理萬機的她，因此不會主動與她聯繫。但是，每年總會有那麼一兩次，Lucie會捎個信，或是打個電話問我最近好不好，要我有空去找她聊聊。但我以為那只是問候的客氣話，還是不想打擾工作繁忙的她。Lucie對晚輩的提攜不是傳統的「照顧」，而是給予充分的拓展空間，並在不經意時，讓我們知道她的關心。有一回她從國外回來，說是要送個東西給我，因為她一眼見到那個東西就想到我。充滿好奇的我，回家後迫不及待地打開禮物，想知道Lucie心目中的我，究竟是什麼樣子。那是一個貼在冰箱上的磁鐵，上面的圖案是個看似北美原住民模樣的女孩，頭戴羽毛，手握弓箭，騎馬奔馳。看到這禮物的刹那，說不出是失落或是困惑，不懂Lucie為何看見這

個磁鐵就想到我，而這件事，也一直忘了向她求證。現在再細看這個磁鐵，卻更像是看到Lucie，一直是那麼充滿活力與赤子之心的奔騰著。去年，我人生最挫折與沮喪的一年，Lucie在百忙中主動找我談了十來回，溫柔但堅定地，硬是要我堅持下去。也是湖南騾子脾氣的我，也很堅持地跟她就這麼僵持了十來回，最後仍因為她兩句打到我心裡要害的話，給Lucie我的承諾。而Lucie在電郵中短短幾句對我實踐的評價和鼓勵，像是一劑強心針，讓我再度不顧一切的繼續向前。

幾年前，得知Lucie重病，我從不想去探病，因為我知道，Lucie希望我們看見的她永遠是神采奕奕的，就像是磁鐵上的那個永遠在奔馳的女孩，也相信意志力堅強的她，一定很快的就康復的。果然，經過一段時間，她又以滿臉的笑容和無限的活力出現在我們的眼前，一方面笑談她的醫病經歷，一方面談著許多新的想法和計畫。

對於aging，Lucie也有非常另類的想法。她會很得意的告訴我，早在大家

意識到人口老化問題的嚴重性前，她就「預言」這將是台灣要面對的重大課題之一，也早在一九九七年就出版《摩登的成熟系列叢書》。她反對把aging看成是一個漸漸衰老無力的過程，「摩登的成熟」貼切地反映了她的主張：始終保持active，直到身體無法支撐時突然drop—。

一月二十七日，得到Lucie突然離開我們的消息，腦海浮現多年前Lucie得意

地述說她對aging的看法，不禁佩服，她的一生，果真是言行合一，一路身體力行到底啊！

至今，一想起Lucie突然的離去，仍然難以控制情緒。其實，理性告訴我，Lucie一定不希望我們為她流淚的，而且她走的如此瀟灑，沒有遺憾。我猜想，許多人跟我一樣，過不去的是自己，悔恨自己未曾當面向Lucie說聲感謝，只能寫一封長長的電郵，希望在天上的Lucie

能夠收到，算是給自己的一個closure吧！

Dear Lucie in the sky，承諾您的事，我一定會盡力完成。您未盡的事業和夢想，我們這群曾受您提攜和啟蒙的後輩會擔當起來。再見，Lucie—

（作者現為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專任教授）

Lucie與《破報》

——我們的左派辦報的經驗

黃孫權

一九九四年，我還是毛頭小研究生，不畏虎卻沒幾兩重。適逢地下電台風起雲湧，反核運動以及學運的尾勁正四散開花時，我到《立報》當半職記者賺取生活費。那時《立報》專版中心的人正在開啓一個新的實驗計畫，打破記者原來的分線，在週日製作八版的綜合文化新聞，有學運刊物那種手繪貼版風格，惡搞，基進，實驗，幾乎無惡不

作，充滿了熱情與青年過剩的氣血，謂之破。有一期我們做了蘭嶼獨立的新聞，連國歌，國旗還有獨立建國的始末都設計了。隔天，大量讀者打電話詢問我們此事當真？這是美好的一九九四年，地下文化浮現：春天的吶喊，搖滾破爛生活節，國際後工業噪音藝術節，女性影展，台灣第一個戶外rave party都在此年誕生，學運從狹義的政治路線走

向更為寬廣文化行動。

她僅是很優雅看著，聽著，並容忍我們與《立報》那些值得敬佩的老同事之間的衝突，這些衝突從服裝穿著到上班時說話的音量，從標題到排版的風格都有。同年，這位優雅的女士在城鄉所開課，於是我又變成她的學生。她不像其他老師總給厚厚的讀本，厚到我們懷疑老師自己有沒有唸過。她也不說教，

花非常多時間聆聽，然後發問。我忘了期末有沒有交報告。（按照我的惡行，非常可能沒交。）

半年後，那時專版中心主任小蔡（蔡建仁）要年輕人自立自強，我變成專版中心主任。一九九五年，我們隨即向Lucie提出「要獨立出刊的計畫」（而我們腦中，只有 *Une Reader*, *Month* Jones, *Z Magazine* 少數範本，以及 Hunter S. Thompson 所創 *Gonzo* 的新聞寫作風格）。Lucie 最欣賞的熱情掩飾了我們這群年輕人的粗魯與沒有計畫，在九月三日浩蕩出刊，隨即贏得與實際銷量不成比例的聲譽。每一次的專題都是一場戰爭，與社內與社外的，如「墮胎的一百種態度」、「反反毒」、「愛滋紀念被單」、「亞洲人民戲劇工作坊」、「台灣的電音教父」等等。那時我們召集了一流的好手，採取一如 Lucie 在美國主持亞美研究中心一樣的共同決策制，我們共同在編輯台上決定事情，總編輯有否決權以確保出刊以及應擔負的政治風險，沒有人可以單獨決定題材，所以常常一個編輯會議可以從晚上四點開到隔

日的太陽升起，猶如一場提前開始的狂野派對，辦公室所有開口向上的容器都滿滿是煙蒂。當時《立報》的社經組是《破報》的戰友，雖然我們常常互相跨線，但基本上，他們處理社會運動以及其文化效果，我們則處理文化運動的社會性效果。

一九九七年，Lucie 創立社發所，而我投入了十四、十五號公園的反折遷運動。台灣立報社面臨嚴重虧損，學校的預算減至一半。Lucie 任台灣立報社長從未支薪，即便在《破報》曲高和寡的情形下，連連虧損，她也只溫柔的對我說，「資本主義沒有社會主義的島嶼」，要我多想想《破報》的經營模式。最終在七月，《立報》面臨了一次大裁員，將所有人全部辭退，願意留社的同仁重新聘回，年資歸零，納入正常的勞健保制度內。這次事件，讓報社與 Lucie 及所有同仁都受到重創。同仁開始被編入「走資派」與「勞工正義連線」，批評 Lucie 與我「言左行右」大有人在。在這過程中，我與小蔡、Lucie 非常清楚地知道，我們能做的就是與學校

爭取同仁應有的權利。Lucie 那陣子難得笑得那麼燦爛，每次工作完陪她走回住處，她總是笑著問：「孫權，你有沒有想法啊？」

之後，Lucie 思考台灣立報發展成教育專業報的可能，而我則暫代《立報》新成立的教育組組長，我們一起思考與研究如何可能。期間，我提出了《破報》復刊的計畫，以紐約《村聲》雜誌為範本，創辦台灣第一份免費資訊報。我當時認為，只要活動資訊有價值，被人認同與拿取，那前面批判的報導與專題就能影響讀者，另類媒體不僅在於內容，也在於形式。Lucie 深思之後同意，並在同一時期重整台灣立報，使之更朝向教育專業報的目標。一九九八年三月，《破報》發行復刊一號，一開始只有我和一位記者，一個編輯，一個發行，我一週內要用不同筆名寫出上萬的文字。在一年內，《破報》人員增至十位，從發行三千份直至八萬份，從十幾個取閱點到二百多個點並進入各大專院校與高中職校園。慢慢的，《破報》終於打破台灣傳統報業與台灣社會的

箱制，有了點知名度。學校的預算逐年減少，《破報》自負盈虧的壓力越來越大，而我始終，沒有達成Lucie的期望，Lucie總希望《破報》可以獨立，甚而可以養活《立報》。

在台灣，從來沒有什麼左派經驗，更別提左派的辦報經驗了，或者能被左派接受的「機構化經驗」。我們的公眾輿論或者公共型知識分子（如果有的話）都是在主流媒體上發聲，一邊批評主流媒體一邊在上頭看著自己的文字，自我感覺良好。考慮權力效益與捷徑使得知識分子自我去勢，想在大媒體發表影響人的看法成為主流，鮮少人願意走歧徑創立或支持一份有影響力的另類媒體。台灣最不舒服的環境就是沒有另類（There is no alternative），最不舒服的是解嚴後我們卻走上了柴契爾主義的詛咒。我們只有冷戰思維留下來可笑的左右之分，以及宣稱大於實質粗糙的勞資之分。

Lucie在美國二十幾年的組織經驗，在台灣卻也左右支絀。周恩來曾經對Lucie說：「我們錯怪妳父親了，

他不是敵人，是值得敬佩的『民族資產家』。」「你不會懷疑恩格斯是馬克思主義者，那有沒有資產會是個問題嗎？成舍我先生在其創辦的《世界日報》中，就有「勞工版」與「大眾公僕」版，這難道不是另類的新聞規範嗎？

我以為，作為一個「資產家」的女兒以及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Lucie關心的，不是培力（empower）也非干預，而是另類、弱勢如何能夠自我發聲，這涉及制度性的力量與培育，Lucie終其一生當是以此為志。她在美國主持亞美研究中心，接任《立報》，創辦《破報》、《四方報》，創立社發所，成立社會發展基金會，建立舍我紀念館，無一不是「青年培育中心」，這些機構不正是讓年輕人有實驗、實踐與實習的機會嗎？Lucie做的不是號召、組黨工作，而是制度化的去培育各種熱情與機會，使人們可以為自己發聲。

Lucie的總總影響著我。在招募新記者的時候，我總會問應徵者興趣為何？喜歡做的事與《破報》的工作一致嗎？能為《破報》做什麼？而不是希望新進

的同仁符合《破報》的要求。我總記得Lucie在主持亞美研究中心時，用「所需」來分配「所得」，有好幾年的時間，我從未替自己調過薪，甚至與Lucie協議將我的薪水分給新進同仁，以勉力維持同仁不至於與主流媒體記者有過大的薪資差距。從兩年半前我開始不支薪，每週照常台北高雄來回跑。我告訴自己，當是我繳給Lucie的學費吧，學習左派在地球生活的旅行經費。

在《破報》復刊號的編輯室手記裡，我寫到：「我們希望成為台北市另類資訊的通路，這是第一步，不必跨得太遠。如果孽世代之聲能夠壯闊動容的話，它既不是另類小眾的喧囂也非菁英的文字遊戲，而是從調查與探索開始。我們既不想成為學院裡的秀異分子的同仁誌，也不想成為媚俗的流行嗅犬，我們希望能有一個空間可以作為不同世代的、多元文化的探詢，可以記錄多於宣傳，探索多於品論。我們既不膽怯，也不敢大意。孽世代之聲必須，也非得先從聯絡、建築另翼族群與文化開始。」這種看法，始終沒變。

Lucie走的當日，沒有一家電視媒體報導此消息。電視新聞忙著報導網路美女的票選以及各種影藝消息，這是我們歷經多年後，開放報禁髮禁所有禁得到的成果：電視台以台灣媒體專業人士最愛批評的《蘋果日報》為藍圖報新聞，以最經濟而不花腦力的方式報導新聞。上週六，我勉強自己參加三鶯部落的抗

爭尾牙，在三鶯部落聚會所內，我看到牆壁整面貼滿《立報》的報導，我在前駐足許久，新聞報導與社會運動走在一塊了，這就是另類媒體的必要，我想這也是Lucie此生最好的證成。然後我抹了淚。

我希望《破報》可以持續下去，或者此種「培育熱情與機會」的制度可以

持續下去。這是Lucie與台灣立報社所有同仁共同創造的，也是台灣當今最需要的經驗與歷史。

〔本文亦刊於《破報》復刊五九八號（二〇一〇年二月五日），作者現為《破報》總編輯〕

永遠的女鬥士

我的露西小妹

成思危

一月二十七日，我正在瑞士的達沃

斯市出席第四十屆世界經濟論壇，忽然從萬里之外傳來噩耗，我親愛的露西小妹因久病不治，已經與世長辭了。儘管我對此已有一定思想準備，但仍然感到震驚和悲傷，心中的哀思難以排解，一幕幕的往事再現在腦海之中。

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北平淪陷之後，剛剛兩歲的我隨著即將臨盆的母親逃到天津與父親會合，嘉玲妹迅即出生。隨後全家經上海到香港定居，

露西妹於一年多以後降臨人世。在此後的抗戰期間，我們三兄妹與母親相依為命，香港淪陷後母子四人經澳門及廣州灣（即今湛江）逃到桂林，桂林淪陷前又逃到重慶。

由於露西是「么妹」（四川話中最小的妹妹），深得與我們聚少離多的父親的寵愛。記得在桂林時有一次我帶兩個妹妹到水塘邊玩耍，露西不慎落入水中，我奮不顧身地將她救出後，不僅沒有受到父親的讚許，反而挨了一頓責

罰。

一九四八年底，我們全家又一次回到香港，居住在九龍的鑽石山。母親支援我搞起了一個小小的化學實驗室，嘉玲和露西就常常成為我「研製」的飲料和化妝品的首批試用者。由於露西對產品品質從不抱怨，因此通常是我的首選。

一九五一年夏，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和抱負，我隻身一人回到內地，從此和家庭長期隔絕。一九七二年底，

我突然接到一個通知，說露西到了北京，希望與我見面。當時身處逆境的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帶著女兒成卓從天津到北京，敲開了露西在北京飯店的房門。儘管二十多年未通音訊，彼此還能依稀認出少時的面容。而她的一聲「哥仔」（廣東話中的小哥哥），立即喚醒了我已冷凍多年的思親之情。我們一起

在北京遊覽，她還特意到天津看望我夫人舒允宜和兒子成朋。在交談中我得知父親身體康健，事業興旺，但母親已不在人世。她還告訴我周恩來總理在會見她時，特意向父親問好，並說父親還是民族資產階級。這使我放下了多年「官僚資產階級」出身的包袱，進一步增強了我自強不息的信心。此後他曾多次回國，不僅給我家以「雪中送炭」般的幫助，還促成了我和父親及嘉玲一九七九年在美國的會面，以及我一九八一年到美國的進修。

這次會面還使我感到驚訝的一點是，當年溫良柔弱的小妹妹在美國經歷

各種不平遭遇後，竟然變成了一個剛毅激進的社會學家。而我則在多次政治運動的磨煉下，從一個意氣風發的少年變成了一個外柔內剛的科研人員。儘管此後幾十年中我們三兄妹之間很少談及政治話題，但我明顯地感到我是處於嘉玲和露西之間的「中間派」。

在個人行事作風上，露西幾乎完全繼承了父親的傳統。她辦事果斷，事必躬親，連一些細節問題都不容輕易放過；我在UCLA進修時，她擔任亞裔美國人研究中心的主任，常常為準備演講或撰寫文章而徹夜不眠。她感情深藏不露，但卻愛恨分明，使我在最困難的時候感受到親情的溫暖。她生活簡樸，處處節約，很少追求個人的享受，把工作當作最大的樂趣。

儘管我對露西的一些言論和觀點不盡苟同，但我十分讚賞她對理想的執著與奉獻。在改革開放初期，她致力於推動中美學術交流與合作，幫助了許多中國學者到美國進修。她深入三藩

市華人社區和廣東僑鄉調查研究華人婦女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到美國後的遭遇，並發表了第一篇這方面的專著，揭示了華裔勞動婦女在美國悲慘生活和奮鬥歷史。她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從階級、種族和性別三個方面為弱勢群體發出了爭取平等的呼聲。她於一九八五年在洛杉磯獲得「教育女鬥士獎」（Woman Warrior Award in Education, LA, 1985），真可謂是實至名歸。

人生如夢一般變幻無常，萬萬沒有想到我最小的妹妹竟先我而去。她一生為保護弱勢群體，爭取社會公平而奮鬥，活得絢麗多彩，走得瀟灑利索，恐怕她唯一的遺憾就是未能寫出父親的傳記。我願意盡我所能支持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組織編撰《成舍我傳》，以實現露西的遺願。

（作者為前中共人大副委員長，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管理學院院長）

Lucie 與我， 姐妹情深

成嘉玲

Lucie 突然走了，到現在我還不敢置信。

去年，Lucie 雖然得病已經三年多，看她恢復得很好，總覺得最困難的時候已經過去了，沒想到卻因感染而病情直轉而下。在她生前，有人問她死後作何安排，她很瀟灑的說：「這是活著人的事，就讓活著的人看著辦吧！」於是，我這活著的人更不敢怠慢，對於所有人的建議，我都只能照單全收，從做七、設靈堂到追思會，一應俱全。有時我不免覺得Lucie正在一邊促狹的笑：「妳到底在搞什麼鬼！」

她剛走時，晚上輾轉難眠，總覺得從小如此親密的人就此消失，不免暗夜哭泣。在她頭七的早上，忽然夢見她全身沐浴在金光之中，我雖不斷搖著她，詢問她是否升天了，她卻笑而不答，我想這是她看我這麼難過，特別來安慰我的吧！

Lucie從小就好為人師，唸小學時

就自組學堂，把附近親戚鄰居小孩都收為學生，除週六、週日上課外，還為節慶排演節目。她的學生都很服貼，只有我是搗蛋鬼，不聽指揮。

小時總覺得父親偏愛老么Lucie，母親則喜歡哥哥，我這老二只有用和兄妹吵架的方式來彰顯我的存在。我們三兄妹都很獨立，各搞各的，我和Lucie由於年齡接近，加以小時她比我先會說話，所以從不以姐妹相稱，且讀書一直同年級，永遠處於競爭狀態，就算看同一場電影，也是一個坐樓上一個坐樓下。每次考學校，爸爸都會說：「要不就兩個都考取，否則寧願都考不取，以免家無寧日。」幸好我們都還爭氣，一女中、台大，都同時上榜。可是每當考取後，換來爸爸的批評卻是：「現在學校程度真差，連妳們都考得取。」

由於爸爸永遠不當面誇獎，我們從小比較沒安全感，也從來不願訴苦。大學時，Lucie教人彈琴，我則教好幾

個家教，情願自己賺錢，也不願伸手要學雜費。Lucie因在香港出生，又在教堂司琴，大二時即獲教會獎學金去夏威夷大學深造。她等一切手續辦好，才公開宣佈，父母雖不捨，也無法攔阻。沒想到出國後，她發現教會以她是台灣孤兒的名義大肆募款，使她非常生氣，寧願放棄教會的資助，決定半工半讀。她同時間做五個兼差職務，工作辛苦，也沒有讓我們知道。正是那麼的勞累，使她身體受損，最後還因腎臟病，而割掉了一個腎。她後來成為一位幫助弱勢爭取權益的學者，尤其是為亞大裔爭取福利，我想和她在教會及打工的經歷有很大的關係。

Lucie是非常有革命熱情的人，也很能吃苦，她為了作研究，可以在尚未改革開放以前的大陸，騎著腳踏車，在沒有水電衛生設備的鄉村蒐集資料，一住半年，而甘之如飴。她思想左派，生活簡樸，有很多交心的朋友，但她不

喜應酬，極少參加婚喪喜慶。我現在回想，我們在一起，從來沒有談過理論、思想和感情。大概是因為我們太不一樣了，而覺得彼此有點對牛彈琴吧！？

Lucie是一個絕不媚俗的人，可是有時也不免矯枉過正。她對歷史一向很有興趣，當《傳記文學》創辦人劉紹唐先生過世後，他的遺孀王愛生女士託人轉達屬意我兩姐妹接辦該雜誌。Lucie躍躍欲試，我則和她約法三章：我只出錢入股，其他一切由她負責。因為我對歷史最沒興趣，我認為同樣一件事，由於當事者認知不同，可能產生不同說法，真相永遠難明，可是Lucie認為這正是歷史有趣而吸引她的地方。

她接辦《傳記文學》後，認真審稿，對逝去的人過分歌功頌德的稿子，她絕對拒絕刊登。好幾次接到人的請託，我也只能以社務非我負責來婉拒。也許是造化弄人吧，現在《傳記文學》的擔子落在我身上，我也只有秉持她的作風繼續努力下去。

Lucie對她的學生要求嚴格，常常把他們問得啞口無言。有時學生也不免向

我抱怨他們的老師「要我們發表了很多意見，最後還是她自己的意見最好。」我女兒成蔭前年回台客座半年，她覺得Lucie說的「程度不理想」的學生，其實表現頗佳。可見Lucie的要求，比哈佛大學還高。不過話說回來，她對她的學生愛護有加，關心他們的生活和就業，別的事情她從不拜託人，爲了學生，她卻是可以犧牲的。

Lucie因爲十九歲就到美國，個性上有點西化。她凡事一定努力爭取，達不到目的也不覺得丟面子。而且她非常天真，沒什麼防人之心。她平常省吃儉用，可是對於她認為值得做的事，尤其是文化事業，就毅然投資下去，常常一擲千金，血本無歸。

自從三年前診斷出癌症，經過三次手術，我每次在手術室外面等待，真是一大煎熬。可是她醒來第一句和護士說的話，總是：「我要我姐姐。」令我感動不已。她病後恢復得很好，我和她的好友殷允凡一直勸她放慢生活的腳步，她開始的時候確實還察納雅言，可是最近一年又故態復萌，一個人做二十個人

的事，每天在辦公室不回家，都要我打電話罵人了，她才肯放下工作。

我們這幾年感情越來越好，即使沒有每天見面，我也會每天早晚各和她通一次電話。我和她開玩笑說，父母在時我都沒有這樣，現在對她倒是晨昏定省。前年我們倆還特別飛到哥本哈根坐遊輪暢遊地中海，一直到聖彼得堡，這可能是我們唯一兩人獨處最長的時光。我常覺得她不是很注重親情的人，可是由她對我兒女的視如己出，時常肯花時間與他們長談，比起我這大而化之的母親，可以說付出更多感情，也更得到他們的尊重。她過世後，遺囑在美公開，除了一些學術捐款外，她還是把她的財產留給了我和子姪輩，出乎我們意料之外。

去年九月，她在日本旅行時昏倒，回國後即每週需要輸血，可是生活品質也維持得很好，尤其十一月一日，Lucie和我一起代表先父領取第一屆星雲真善美「新聞典範人物獎」，她還上台發表感言。十二月十九日，我們又一起參加了葉明勳伯伯的追思會，還一起去聽了

郎朗的演奏會。所以我就很放心的到波士頓看我的新生外孫女，不料到了美國沒幾天，就接到她的電話，說是細菌感染住院，還做了一個怪夢，夢見葉伯伯說：「Lucie，妳怎麼也來了？」我聽了，總覺得有點不祥之感。沒想過了幾天，病情急轉直下，我趕回來，總算見

到最後一面。好在她沒有什麼痛苦，她也早立下遺囑不要急救，我們雖萬般不捨，可是確實也不需要急救，她就走了。

在追思會上，很多朋友訴說著她的總總，我也才驚覺Lucie真的有很多面相，而我認識的只是她作為妹妹的一

面，但我已經非常滿足了。近年來，她常向人說她有位世界上最好的姐姐，我也要說：「我有個世界上最可愛的妹妹。」無論她現在在那裡，我希望她能夠快樂悠閒的過活，放下的擔子就讓我們活著的人來挑吧！

永遠的孩子：我的Lucie阿姨

周成蔭

二〇〇一年初秋，當全美正陷入一片「九·一一」愁雲，我卻完全爲了另一種原因感到不安與焦慮：我最親愛的Lucie阿姨，得了乳癌。

她開始療程後的第一個週末，我飛去洛杉磯看她。心想，是去陪陪阿姨，照護病人——反而，是病人把我玩垮了。就算只是五十趴的Lucie也等於是一般人的一百五十趴：一大早，我們開車去她最愛的鬆餅店；接著，逛街逛書店。下午回到家不但沒有休息反而是邀了朋友過來同奏布拉姆斯室內樂，一直到晚。深夜，小她三十歲也挺健康的我，已經被阿姨的「星期六節目表」玩

的腦子轟轟，眼皮沉沉；可是Lucie阿姨那天晚上還未盡興。於是我們倆接著又聊了一通宵。

那夜，我們談學術，談家人，談理想。阿姨說，得癌，五年是一個關卡。所以她常在想，「如果我只能再活五年的話，我要做些什麼？」她說了一長串想做的事：她想爲她的父親寫傳，成立紀念館；她終於想完成她的台山田野調查報告；她要做歷史連續劇的研究。但在這份「走前清單」裡，竟然沒有一項是「跟我的親朋好友多多相處」。這令我訝異。

我大膽地問她：「生病了的妳，不

後悔一個人嗎？不後悔妳兩次婚姻都結束了嗎？不後悔沒有生小孩嗎？」阿姨毫不猶豫地回答：「不後悔。」接著，她認真的思考我問她的問題，結論是，「我想我是一個很自私的人。」

一般人講這一類的話，似乎是等著妳接口：「不，不，妳一點都不自私，阿姨。」

但是我了解她完全沒有這種用意。Lucie是很清楚地她在思考和分析自己：「自私」到底是什麼意思，爲什麼我是這樣自私的一個人呢？她和我談了很久。「我自從生病，好多朋友、學生，每天給我送飯，替我開車，做這做那

的。我非常感激，但我也非常訝異，因為我一輩子也沒想過要給別人做這種事情。當我問我的朋友說：『你們為什麼對我那麼好？』她們說：『我們就是喜歡妳，就是對妳好。我們也不指望妳為我們做這些事。』」阿姨帶著幾乎覺得匪夷所思的語氣傳述於我。

這十年來，阿姨幾番重病，也受到很多人的照護，而我也常常回想我們倆那天晚上的這番話。到底什麼叫作自私的人，而什麼叫作無私的人呢？認識Lucie的人都知道，她總是告訴你：「要自己做自己喜歡做的事。」難道——「要自己做自己喜歡做的事」——的必須條件，是要有勇氣自私嗎？

小時候，每個暑假，都被我父母親充軍到洛杉磯Lucie阿姨家去。第一次一個人去的時候是七歲。我印象裡的阿姨是個很嚴肅的人。她一點都不為我的「小孩子身分」做任何妥協：沒有安排夏令營，沒有保姆，沒有玩伴，家裡也沒有準備玩具，沒有童書。她每天帶我去上班，把我放在她的UCLA的辦公室，叫我整理她的《人民日報》。我當

時字認得不多，簡體字更不用說，個性又迷迷糊糊的（我小時的綽號是「小傻瓜」），當然常常出錯。阿姨就皺著眉頭問我：「妳有用心做嗎？」七〇年代的美國很流行晨跑，阿姨和姨丈也把我抓去一同晨跑。每天跑一英哩，UCLA操場四大圈。我當時胖胖的，又很嬌，我就一邊哭一邊跑。她就說：「妳怎麼這麼小女孩子氣？」我心想：「我就是小女孩子嘛。」

但跟Lucie阿姨過了一個暑假回到台灣，我變了一個人。我很好學，很自信，很獨立，我頭髮剪短了也不嬌氣了，當然也瘦了很多。我思想也「進步」了：行李裡還藏了一頂「毛」帽，是繡了一個小紅星的帽子。記得那時阿姨的客廳裡掛了一幅毛澤東的書法。回到台灣，我竟然對父親劈頭一句：「東風壓倒西風。」他回我：「妳要讓我們全被關起來嗎？」

前些日子，我和弟弟成虎聊阿姨。弟弟說：「阿姨總是將我當成一個individual。我就是我。不是『我姐姐的兒子』或『我的外甥』。」說的真對。

我們小的時候，總是感到阿姨對我們沒太大興趣。她不會因為我們是小孩子所以覺得我們很可愛，或是因為是她的親人就對我們有特別的興趣。現在回想，是她要求我們腦袋裡想點好東西，要和她真的對話。她將我們當成individuals，我們需要能和她平起平坐，跟她交談。阿姨對我們要求高，我們對自己的要求也變高了。

想到「無私」和「自私」時，就會把媽媽和孩子做為典範。媽媽是無私的，孩子是自私的。一個是奉獻，一個是索取。我們也很自然的給與一種價值判斷。可是我開始懂得，Lucie所說的「自私」，也是對自己的一種最高的期許。理直氣壯的索取——「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或許比因世俗要求的自我奉獻更重要：這是Lucie以她一生做為榜樣，教導我們的。她越「做好」她自己，也讓我們這些她身旁的朋友、學生、晚輩，做好我們自己。真正認識Lucie的人都知道：她絕對不會當你的媽媽。她不會袒護你，不會無條件愛你，不會為你犧牲她自己的理想。可是，她

會是最支持你的夥伴，鞭策你達到你自己的理想，做一個最好、最有用的人。

這樣子說吧：Lucie是自私的孩子。

但也因此擁有孩子最好的面相。她執著，她有理想，她有熱情，她愛玩，她好吃，她有精神，她愛笑，她不虛偽，她沒有架子，她永遠忠於自己。

從小到大，我一向和阿姨是最親的。但五年前當我第一次為人母，我忽然跟阿姨有點疏遠。自己是孩子時，阿姨不特別寵愛我們，或許心裡還有些驕傲：「她把我當成大人！」但當她對我的孩子持同樣的態度，我開始心裡有些不平，覺得阿姨不特別疼我的小孩，就好像有點否認我做母親的角色。二〇〇七—二〇〇八學年，我先生 Carlos 和我藉著休研究假，回到世新服務一年。當然也是因為這幾年阿姨病重，我們也想和她多相處。我多年住國外，頭一回以「媽媽身分」回到台灣，發現一樣趣事：我已不是 Eileen，或成蔭，或周教授——我就是「Teo 媽媽」。也因此悟到，阿姨不是不認同我做媽媽的角色，只是提醒我（她對我弟妹靜文也有同

樣期許），妳們不只是媽媽，不要躲在無私奉獻的媽媽角色後面，要記得做自己，不要只記得做媽媽。

這樣說，好像是阿姨把父母的角色貶了，孩子的角色提昇了。絕不。做為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Lucie總是反覆思索自己的觀點。早在一九八五年，當她在美獲得「教育女鬥士獎」領講發言，她就已經對自己看待「母親」這個角色做重新思考和自我批判。演講中，Lucie提到小時候非常崇拜父親，長大後想和父親一模一樣。至於母親，Lucie坦誠：“I thought she was weak.” 但帶著她們兄妹一路逃難，每天陪著他們三兄妹的卻是母親……

而我怎麼會笨到從來沒想到過？我怎麼從未把「偉大」二字和母親聯想到一起，也從未想到過長大以後要像母親一樣？

是因為她有父親的堅毅卻沒有父親那樣輝煌的事業；她有父親的智慧卻沒有父親的成就嗎？……

向威權者認同是多麼容易，同樣容易的是輕視維護我們生命的「弱者」。一向自詡為女性主義倡導者的我，怎麼也

竟沒跳出這傳統的框架？

（這裡引用的是Lucie數年後為刊登《立報》用中文重寫的文章）

坐在台下仰望著我最敬佩的阿姨，這是對當年中學生的我最有震撼力的一番話，因為也是我第一次聽到阿姨談到她對自己母親複雜的情懷。Lucie為什麼會覺得母親是弱者呢？

Lucie是啓蒙於六、七〇年代所謂 second wave 的女性主義運動。她們要求的是平等，家庭和事業上的平等。可是對阿姨來說，看到印證在自己母親身上這是一種很複雜的平等。像外婆這麼有智慧，有才氣，受過高等教育的一位新女性，為先生孩子放棄了事業……這是無私，還是自私？帶孩子是無私，還是另一種自私——不脫離自己的階級框架，去做更大的貢獻呢？到底無私是顧到自己，顧到家人，還是顧到社會？

二十多年後，我以為阿姨早已淡忘這番談母親的話；卻意外的聽到她去世前一個月與老同事吃飯時，說到這是她自己認為她所有演講裡最貼心的一段話。可見而知，她和父親、和母親的關

係都是她一直在思索的問題。Lucie諸多學術領域都牽扯到讓弱勢群體發聲，而她卻發覺自己竟然那麼容易的忽視了第一個在她身邊照顧她的人。更貼切的是，這十年來她得了三次癌症，她受到很多人照顧，她也那麼需要照顧：這，對她的影響很大。Lucie終於接受做無私的媽媽也重要，做自私的孩子也重要：

“both were necessary and okay.”

這幾年阿姨非常感激也樂於接受大家對她的關懷與照護。她也越發依賴好朋友殷阿姨，祕書蘭琪，陪伴她的阿英，也尤其依賴我的媽媽——她的姊姊。Lucie越來越像個孩子，喜歡人疼，喜歡撒嬌；她最希望疼她的人，也總是她姊姊。生病期間，大家都幫她買她愛吃的東西：燒餅、甜甜圈、滷牛肉。她突然覺得禮物是很好的事情；找她出去玩，她也樂意接受——以前她會覺得這是很布爾喬亞的事。阿姨跟我說：她覺得很幸福，這麼多人愛她。

這麼多年以後，這次是阿英問她：「為什麼沒生孩子？」她沒回答因為事業，因為能盡興的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因為崇拜父親不願做母親……都不是。她俏皮的說：「因為我想做一輩子的小孩子。」

二月二十六日，阿姨入土。當天清晨，弟弟和我去迎取她的骨灰。骨灰罈很重，弟弟須要捧在胸前，將繞著罈子的緞帶套在脖子上。那兒的人說，要一路告訴阿姨我們在做什麼。弟弟溫柔地



一九七二年十月，成露茜會見鄧穎超。

將骨灰罈抱在胸前，說：「阿姨，上車了。」「阿姨，過橋了。」「阿姨，回家了。」讓我想到：阿姨就像媽媽懷裡的孩子。

最後想說：阿姨，愛妳，疼妳，想妳。

（作者現為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明學系副教授）



一九七二年十月，周恩來接見美國保釣團體。成露茜為二排左二。

師友雜憶

懷念露茜

成露茜女士在臺過世，我最早是從報紙和網上獲得這一消息，後來接到《傳記文學》社的通知，感到十分悲痛。她的身體一直不很康健，但自力更生，堅持讀書工作，從事教學和研究，她的毅力，令人欽佩。退休後返臺，繼承父業，從事新聞工作，更是難能可貴。我和她有一段關係很久的歷史，但所見到關於她的報導中，很少提到她在芝加哥的經歷和活動。我是她在芝加哥大學進修時的導師和論文指導，我的信札中存有不少為她所寫的介紹信以及和她往來的函件；她的碩士論文還很完好的保存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中。現在根據這些資料和我的回憶，略述我們往來的經過，留存紀念。

露茜於一九五九年赴美入夏威夷大學肄業，一九六二年畢業取得學士學位後，入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學研

究院進修，一九六四年獲得碩士學位，她的論文題目是〈中央日報和人民日報的比較〉(Lucie Cheng Hirat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ress in Nationalist and Communist China: Illustrated with the Central Daily News and the Peoples Daily." M. A. theses, 1964.)，從新聞自由的觀點分析當時臺灣國民政府和大陸人民政府對新聞控制的的不同，並對兩報內容加以詳細分析，附有插圖和表格，對比兩報內容的差別，態度客觀，參考中英文書刊將近一百多種，詳細注釋。可知她當年研究的課題雖然不同，但對新聞事業的關心和興趣卻一直繼續。

我從一九四九年起在芝大東方語文系任教兼遠東圖書館主任，一九六二年開始又兼任圖書館學研究院的教授職務，同時擔任東方系與圖書館學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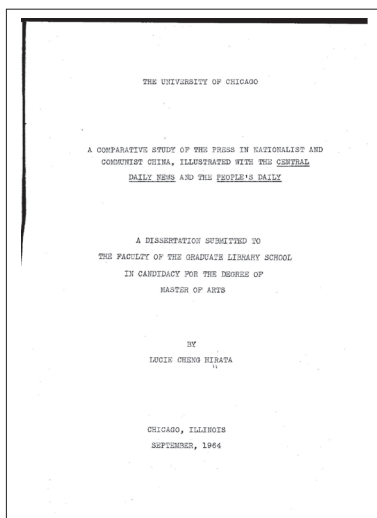
究院合辦的「遠東圖書館學研究中心」主任。當時我所講授的「中國目錄學」和「中國史學方法」，露茜都曾選讀，因此她是我早期所指導的研究生之一。她同時在遠東圖書館工作，每週二十小時，協助期刊的採訪，賺取生活費用，我也是她的主管人。

當時她是用 Lucie Cheng Hirata 的名字在學校註冊，我沒有問起過她的個人私事，她也從來沒有提起過她的婚姻問題。現在猜想她在夏威夷期間，曾和一位名 Hirata 的夏威夷日本人結婚，來到芝加哥時大概已經離婚，可是她的入學證件仍沿用 Hirata 的姓名。她當時患有腎結核病，到校後不久忽然發作，曾在一處購物中心的百貨公司中暈倒，她在芝大醫院治療時，割去了其中一隻腎，當時的同學都知道她只有一隻腰子。因為我的內人文錦很關心她的病體，因此

錢存訓

不僅逢年過節，平時和週末也時常請她在我們的家中一同進餐。

她取得碩士學位後曾計劃在芝加哥大學繼續攻讀博士學位，但沒有取得獎學金而作罷。我曾介紹她在夏威夷大學圖書館任西文編目，但是她對此沒有興趣。後來回臺灣在中央圖書館工作了一年。一九六四年她再回夏威夷大學攻讀社會學，取得博士學位。一九七一年起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社會學系任教，後兼任「亞裔美研究中心」主任。那時她曾和法學院一位美國教授結婚。我在一九八八年訪問洛杉磯加州大學時會由她當時的同事鄭炯文先生陪同和她見面；她曾和她的美國丈夫請我



成露茜碩士論文封面。

們在她們的家中晚餐，殷勤接待。可是在她的自述中，談到的都是她的家庭和父母，從來沒有提到過她的婚姻。似乎兩次婚姻都不美滿而離婚。

她從洛杉磯加州大學退休後回臺灣，我們繼續通信聯繫。二〇〇五年我的九五生日，朋友們為我編印一冊《南山論學集》（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二〇〇六年出版）作為紀念。多承露茜參加，寫了一篇〈地方新聞的國際化；國際新聞的地方化初探〉的長篇論文，並附圖表多幅。這是他的專業研究，難得一見。二〇〇七年，南京大學高研院的「錢存訓圖書館」開幕並舉行國際問題研討會，她曾被邀請參加，但因病未能成行。那時她的身體已很衰弱，不時出入醫院，如今長眠，十分哀痛。

我和她通信較多是她回臺灣接掌《傳記文學》以後，因為每個月初收到航空版一冊，我必先讀第一頁她寫的〈手記〉，介紹每期的重要內容，提綱挈領，對讀者很有幫助。她在〈手記〉中，曾多次提起她在芝加哥時代的活動，並說起當時的同學中有李歐梵、許

倬雲、連戰、胡德偉、林毓生等人。現將我們最近往來的通信附入各一件，作為對露茜的最後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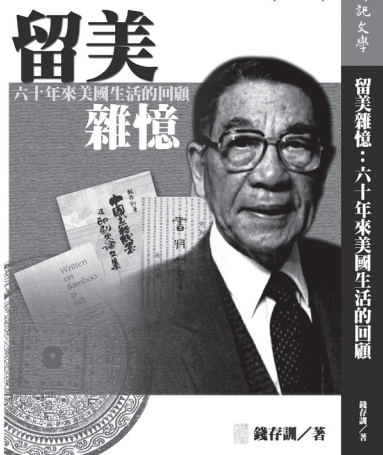
臺北傳記文學社成露茜社長：

久未通候，時在念中。多年來蒙劉前社長贈送《傳記文學》，按時收讀。改版後的內容和版面都有很大的改進，承貴社繼續寄贈，十分感謝！

在今年第一期卷首（按：總號四六四期）中讀到你的「手記」，提到你在芝大就讀時的一段佳話，使我和文錦想起四十年前你在此相聚的美好時光，令人難忘。也記起你的論文〈《中央日報》與《人民日報》內容的比較研究〉，可知你早對新聞出版事業的興趣所在，如今你接長《傳記文學》，長才得展，繼承家業，謹致親切的祝賀。

最近收到《傳記文學》第四六八期，其中陳學文〈胡適情書手跡新發現〉一文中說：「不知充和、漢思是誰？」其實兩人在海內外的知名度都很高，漢思是 Hans Frankel 的中文名傳漢思，耶魯大學的中國文學教授，專攻詩詞，著譯甚多；充和是他的太太張充和，名書法家，也是崑曲名角，曾數次在大陸及臺灣登臺。她是我的太太許文錦的中學同學，她的兄弟姊妹很多，三姐張兆和是沈從文夫人，最近來訪；二姊允和曾寫作一本有關蘇州張家的舊事。充

和在一九三二年前後進入北大學習，那時漢思在北大教英文，因此相識結婚。當時胡適是北大校長，我想這一件手跡應該是胡適在一九三〇年代初為充和及漢思所寫的一首舊作，贈送二人作為紀念品。他們不可能如文中所說為胡適傳遞情詩。胡先生喜歡寫舊作送人，我們



▶ 《留美雜憶》書影。

真正的女鬥士

——記成露茜博士對美國華裔歷史研究的貢獻

驚聞成露茜教授病逝消息，無限感傷，忙著通知僑社老友，沒人相信我們這位精神超強的老友，走得這麼快。在追思感恩之際，重拾二十六年由露茜

的紀念冊上就有他所寫的一則「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范仲淹名句。他們二人大概在結婚後不久離京返美，漢思就任柏克萊加州大學的教職，後來轉到耶魯任中國文學教授直至不久前退休。這一件胡適手跡大概是他們離京時沒有帶走的部分文件，可能在北京混亂時成為垃圾。謹就所知奉告。……

專此道賀，順問 近好！

錢存訓 二〇〇一年五月十日 美國芝加哥

後來我的《留美雜憶》出版，多承當時的社長露茜相助。附錄她的一封信，作為結續：

錢教授：

接到您的信真是喜出望外，只是您那麼客氣的稱呼我，感到十分不安。您不會忘記了我這個學生吧？

您的回憶錄願意交給傳記文學出版是我們的榮幸，如有電子檔最好，可以將磁片寄給我，也許我們的工程師可以讀，如沒有也沒關係，重打不是問題。先連載，後出書，我也覺得很好。不知什麼時間可以拿到稿子？會有各個時期的照片嗎？最好每期都能有四、五張。謝謝了！祝閨家好！

露茜敬上 二〇〇五—九—二十二

錢存訓二〇一〇年二月四日 芝加

哥海德園

鄭舒蘭 (Suellen Cheng)

領導與洛杉磯南加州歷史學會合作出版的 *Linking Our Lives: Chinese American Women of Los Angeles* (《聯繫我們的生命動力》) 一書，露茜在首頁親筆題的

「真正的女鬥士」幾個字躍然眼前。雖然這是她對我的鼓勵，但此刻，我深深覺得「真正的女鬥士」才是我們敬愛的女強人露茜的最真實寫照。

露茜曾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亞美研究中心主任，也是中心的創辦人之一。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中，少數族裔在美國的貢獻及掙扎經歷，鮮少受到肯定與注意，美國學術界對此也缺乏研究的興趣。中心的成立主要是為提升美國大眾認識亞裔人士在各種領域的貢獻，以及對不公平現實的挑戰。露茜聯合其他亞美研究先驅開始投身蒐集原始資料。一九七六年，我正在UCLA攻讀美國婦女歷史，時常與班上女同學聚會交換研究心得，深感研究美國婦女的資料短缺，更別說對華裔婦女處境的瞭解。有幸發現露茜在學術期刊中發表對華裔婦女的研究心得及精闢分析，尤其是針對十九世紀嚴苛不堪的移民法造成美國西部不正常的多男性社會現象，以及華裔婦女被迫為性奴隸的黑暗史，露茜都有非常深入的解析及嚴厲的評論，讓我非常感動，遂有拜訪露茜向她當面請益的念頭。

當時，我聽說露茜除了教書、指導研究生，還要忙著從事研究並發表學術文章、參與校務會議等等，而我只是

一個外系學生，實在不敢抱太大的希望能獲得拜見的機會。想不到她卻毫不遲疑，不但耐心聽我用生硬的英文向她解說我對美國婦女史的興趣，而且更以和藹可親、不失專業的態度給我指點，雖然知道我從台灣來，會覺得用中文討論較自然省力，她仍以一種難以形容的親切態度，堅持用英文與我討論，我雖然覺得吃力，卻能感受她的鼓勵，與對學生的用心。很快的，露茜給我一份研究工讀的機會。我花了一年多的時間閱讀長達四十年的《中西日報》微膠片，從中摘錄有關洛杉磯華裔婦女的種種報導，每次與露茜討論時間雖然短暫，她都可以直接了當的清楚分析資料，明確指導下一步目標。我能深深感受她立意要將學術研究與社區真實材料相結合的強烈意念，無形中也讓我體會到她常說的「一個人想有成就，只要努力，什麼事都有可能」這句話的意義。

一九七八年，露茜由她的好鄰居 Barbara Ching 推薦向南加州華人歷史學會（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提出南加州華人口述歷史計

劃（Southern California Chinese American Oral History Project）。當時歷史學會成立不過三年，能有在學術界上相當知名的露茜提議合作，願意把洛杉磯華人貢獻加入美國史頁，會員及僑社皆感興奮。

極具遠見的露茜主張，研究社會現象及美國歷史的學者必須走出學術象牙塔，深入社區追蹤無名英雄對社會的貢獻。當時居住洛杉磯華埠者多半是廣東籍的老僑，露茜特地約請精通粵語、剛從佛大畢業至 UCLA 任教的梅居那博士（Dr. June Mei）共同計畫口述歷史研究，我也有幸獲邀參與工作。開始時邀請歷史學會會員介紹老僑講述一九二〇至一九五〇年代的經驗，僑社認為她們只是普通老百姓，奮鬥歷程不值一提，經露茜和梅博士強調，只有許多個人經驗的累積才能代表真實的歷史，每位移民及其創業謀生的故事都很重要，大家也才開始有了新的歷史認識。露茜珍視社會基層對歷史的貢獻，加上歷史學會十多位義工的協力合作，分別用中英文在兩年多的期間一共採訪一百六十五位

從事不同行業的男女華僑。從四百多小時的錄音帶中可以聽出華人慘澹經營、遭受歧視、最終奮鬥成功的總體經驗。一九八二年，露茜又成功地以她卓越的能力繼續爭取到非常難得的美國國家人文基金會為數不匪的豐厚獎助，將蒐集來的資料完成詳細總結及索引。

爲了完成該項口述歷史工作，露茜和社區聯結，並與梅博士走訪僑鄉說服廣東中山大學，提供研究生參與將口述資料轉錄中文。如今所有錄音帶及八冊口述歷史精華，已成為UCLA研究圖書館的典藏珍貴文獻，提供學術研究及社會各界參考。

兩年後（一九八四年），露茜爲了與大眾分享研究成果，並推崇南加州華裔婦女的奮鬥精神與成果，繼續領導六

位亞裔研究學者，再度與南加州華人歷史學會合作撰述並出版《聯繫我們的生命活力》（*Linking Our Lives*）。該書描述在美華裔婦女雖飽受傳統約束及主流社會對婦女的歧視，但是仍然能夠堅強面對、努力適應，對整個社會的安定貢獻良多。這本書已是美國婦女史重要文獻之一。這六位學者受露茜的指導、提攜及影響，如今熱心服務社會，各有所成。李素珠留校擔任圖書館主任，Sucheta Mazumdar、林修涵及李菲莉任職大學教授，鄭舒蘭擔當博物館館長，趙美心則於去年榮任美國首位華裔女國會議員。

南加州華人口述歷史計劃的成果，帶動了洛杉磯僑社對華裔在美奮鬥歷史的保存熱衷，爲華美博物館的成立奠定

了一個強固的基礎。博物館如今已開館六年，其宗旨在宣揚華裔美人的重要成就及貢獻。露茜在籌館時雖然身兼數職，仍然義不容辭擔當該館學術顧問。露茜每逢見到我時，都會特別關懷華美博物館的進展，並慷慨捐款，成爲該館創館善人之一。

露茜美麗的笑容、堅毅寬厚的精神、對青年後輩的支持關懷與誠摯的友情，將永遠存在我們的心中。因爲她的遠見與執著，露茜終身維護歷史，申張民權，恩澤廣被洛杉磯僑社。由她留下的無限精神財富將永遠傳承後代。她是我們永遠敬佩的真正女鬥士！

（作者現爲洛杉磯市歷史園區博物館主任、華美博物館榮譽館長）

對Lucie的回憶：名字有何意義？

豐田翠緹

我們坐在西洛杉磯當地，Lucie最喜歡的一間煎餅屋中用早餐。

當她結束訪台的旅程，返回UCLA

時，總會打電話給我。她那總是神采奕奕的聲音會說：「我們何時要去吃煎餅呀？」我們熱愛分享美食，但和Lucie在

一起時，美食總是其次，比不上我們針對各種領域所進行的智性對談來得具有挑戰性且迷人。煎餅就象徵著我們生氣

勃勃的討論。我會逼問 Lucie 她是如何看待她自己的，也就是，她如何看待她的身分。她是一個中國人？華裔美國人？台灣人？而上述稱謂後方是否有「女人」的名稱跟著？她好似差點就要被我激怒，但還是有禮貌的聲音回答我，她反擊了。「為何我要被貼上這些標籤？」好問題，也同樣是個好答案。

Lucie 並不相信她是那種只有單一身分的人，她有許多身分。她那由多樣且複雜的人生經驗和各方影響所組合而成的人生，並不能輕易被分類。我們之間的友誼開始自她還是 UCLA 的年輕社會學教授、而我在讀研究所時；超過三十年來，我們分享了許多煎餅和人生經歷，而我最終了解，她是對的。

由於個人志趣追求不同，我們的人生道路有了很大的分歧。一度我們好幾年都沒聯絡，不過這似乎無損於我們的友誼。我們就從停下來的地方接下去。過去十年來，我感到相當幸運，我們再次變得親近，同時發現吸引我們成為朋友的因素仍然不變。

對 Lucie 而言，在洛杉磯的生活相當

嚴酷，也總是行程滿滿：與美國同事不間斷的會議、學術對談、即將出版的共同研究、會見她在南加州的衆多熟人、還要分時間到洛杉磯音樂中心和迪士尼音樂中心觀賞她熱愛的歌劇表演。儘管承受著健康上的折磨，Lucie 的精力和她對諸多興趣和計畫的投入，著實令人吃驚。相當感人的是，自從 Lucie 過世的消息在她美國的同事和友人間傳開後，有許多人寫下 Lucie 如何影響了他們的生涯，懷念她如何在他人的事業奠基、求職聘用、學術作品，甚至終身職申請上提供幫助。對我來說，她對我進行的華裔美國人研究進度的持續關心，成了我主要的驅策力。當我知道她要進城來時，文思就會突然泉湧；而當我找到出版社出版學術著作時，她幾乎跟我一樣興奮。

毫無疑問地，她在美國學術界最互久的遺產之一，就是她一九七二到一九八七年間擔任 UCLA 亞美研究中心主任時的作品。今年是 UCLA 開始進行民族研究的四十週年，也因此二〇一〇年被命名為民族研究年。UCLA 至今仍

是全美唯一擁有專門的亞裔美籍、非裔美籍、墨裔美籍和北美原住民專屬研究中心的大學。然而，在正值美國民權運動高峰的一九七〇年代，要在 UCLA 成立民族研究中心一事，不論在校內校外都不被接受，遑論支持。回想起爭取這門學科學術正統性地位的過程，Lucie 表示，要說服同事和行政單位，亞美研究是 UCLA 值得發展的學術領域，相當困難。她曾向我訴說，爲了說服大家，在美國的亞裔民族與美國歷史也有歷史關聯，她開了無窮無盡的會議。直到七〇年代，亞裔民族相關議題都還常被主流美國社會掩蓋，甚而被全然忽略。沒有太多人知道，有時 Lucie 會憤而離開這些會議，回家痛哭。也曾有人告訴她，如果她堅持要成為亞美研究中心的一分子，那她努力申請的社會學教授終身職永遠不會通過。Lucie 的獨特處在於絕不妥協。她與其他同事結盟，停止在其他與會成員都是男性的會議中做筆記和倒咖啡，不屈從這些被視為女性員工應扮演的角色。

這一切只因在意識形態上，她清楚

地認知，這些工作的政治本質。爲了要建立亞裔美籍在美國社會中更廣泛的關聯和認可，她的主要目標之一是要爲它們建立一個強大的學術研究中心。Lucie打下的基礎幫助了UCLA亞美研究中心成爲全美同類型研究出版單位中，最傑出的一個。

在七〇年代，美國學術界處於一觸即發的緊張氣氛中，Lucie對亞美研究的走向並不是一直被支持，不過從一開始，她的寫作和研究就反映了她對二十一世紀亞美族裔的洞察力。Lucie自身身爲亞美的敏感度不是輕易得來的。如同許多在海外出生的亞裔人士，她在來到美國之前從未感受過種族歧視。在芝加哥大學時，她不能理解，明明房子外掛上空屋的標示，卻沒人願意將房子租給她，直到一名非裔美國人朋友向她解釋了後，她才了解。而在她完成博士學業的夏威夷，她打工擔任保母和餐館侍者。她的一名白人雇主告訴她，無論她有多聰明，她都還是一名僕人。這些與移民到美國的亞裔移民所面臨的種族、階級、勞工和性別議題息息相關的

生命經驗，形成了她學術作品的骨幹。這也是她在台灣教導學生時的一個重要觀點。在她的幫助之下，我於二〇〇六年被邀請到世新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教導美國種族人類學與媒體的課程。對我而言，這是一個難以忘懷的機會，讓我能講授亞洲人的美國歷史，同時也與該校師生建立了長久的友誼。

從最早期的作品開始，Lucie的學術作品中一直深嵌著對於全球化和跨國議題的關切。何爲亞洲來的移民，而何爲族群凝聚的根源？的確，Lucie說她把自己當作是一座橋樑，一個跨國居民，無論在美國、台灣、中國或其他地方生活都能怡然自得。她所搭起的這座橋不只聯結了主流美國社會和亞洲，更聯結了外籍亞洲移民以及那些不是那麼支持新移民的美國出生亞裔人士。對Lucie而言，社群的概念跨越了疆界，決定了更寬廣的全球經濟規畫和定義亞裔美國人的方式。由於一九六五年後人口統計出現的改變，還有亞裔美籍人士再一次變成佔壓倒性數量的外籍社群，以現在的觀點來看，許多過去Lucie提出的洞見一

點也不新奇，至多是一般的常識。

Lucie總是有著一堆新研究的計畫。新聞學成了她的優先興趣，我們兩人還計畫要合作進行台灣和美國電視新聞的比較研究。當我還在台灣客座時，儘管她健康已經欠佳，我們還是初步開始了這項研究的起頭。我在參加她一手創辦的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開幕典禮時，聽到Lucie說到她父親如何想要成爲一名自由獨立的媒體人時，深深地被打動。Lucie在UCLA時期和那之後所創造的成就將會同樣歷久彌新。儘管過去大多數人對亞美研究的重要性充耳不聞，Lucie仍舊直言爲其發聲。當大多數人只想專注在社區工作時，她堅持要使用一個精確的學術研究態度切入。她帶著創意，在全球化脈絡中的種族、性別和階級等議題的重要性不證自明前，就成爲該領域的先行者。

So what's in a name? 所以，名字有何意義？她是一個與其智性討論總能帶來啓發的朋友；一個會永遠珍惜她那仁慈和關懷的朋友；一個我會永遠懷念她的美麗、微笑和勇氣的親愛朋友。在我

被悲傷包圍之際，仍很感激Lucie的學術遺產會繼續被傳遞下去，除了她之外，還有世界各地的朋友會永遠分享她所建立起來的聯結。

還要一些煎餅嗎？

（本文原題 “MEMORIES OF

LUCIE: What's in a Name?”，作者

Tritia Toyota, Ph. D. 現為洛杉磯加州大

學人類學系與亞美研究中心教授。本文
中譯為《立報》國際新聞編譯謝雯好）

洛杉磯加大太平洋地區研究中心主任 成露茜女士

Leslie Evans

我在一九八六年六月時第一次遇見成露茜女士，她是我的博士論文口委主席，我請她幫我找一份能夠餬口的工作。她剛在一年多前成立了一個小型的研究計畫，名為「太平洋地區研究中心」。她幫我從太平洋地區研究中心和她當時的丈夫 Arthur Rosett所任職的法學院中找出一份額外的半職工作。雖然我一開始只是兼職人員，但我很快就被網羅進入太平洋地區研究中心的團隊中。當時整個團隊中僅有其他兩名工作人員，進行著一項大多是獨立進行的韓國研究計畫和其他兩項研究。當時的管理者是一名年輕的台灣人，名叫吳甦，

她從圖書館學的研究生轉攻太平洋地區研究。成露茜女士則為實際的團隊主任。她剛剛成立了一個國際團隊，研究所謂的腦力流動（brain flow），亦即從五個亞洲國家移民到美國的專業技術人士，探討對這些人士母國所造成的影響和他們在加州所從事的工作。我被聘為研究助理，負責從圖書館中搜集資料。我還被列名為成露茜女士和都市計畫教授鄧道明所發表的幾篇期刊論文共同作者。

在完成了「腦力流動」研究計畫後，我們繼續進行紡織業跨國運作的研究，追隨著如跳蛙般一個國家跳到一個

國家的投資，追蹤在追求高技術和低薪資的最佳組合趨力下，最成功的服裝製造商如何由台灣移至香港再到南韓再到巴西。要在這個多變的環境下存活，各國必須了解何時是致力發展這項產業的時機，同時明確知道何時該抽身，或將投資轉化成更有市場獲利利基的更高品質貨物生產。另一項我所參與的研究，是關於美國在台灣和南韓的經濟發展上扮演何種角色。這兩個國家被視為亞洲發展最成功的國家之一。成女士在這些研究中，延攬了來自台灣、南韓、菲律賓、新加坡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作夥伴，每一名學者負責追蹤自己母國在這

些議題上的各式效應。我所負責的其中一項工作，就是整理太平洋地區研究中心和各學術出版社的相關出版物。

成露茜女士比我年長幾歲，臉上總是有著大大的微笑，頂著一頭捲髮，以一個華裔人士來說，有點不尋常。她自一九七二年起便擔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亞美研究中心的主任，之後開始對移民議題產生興趣。她的背景相當特殊。她的父親為成舍我先生（一八九八—一九九一）。如同我的友人彭述之，成舍我一度與陳獨秀過從甚密。陳獨秀為崇尚民主和科學的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曾任第一屆中共總書記。在陳獨秀任教北京大學之際，成舍我曾受教於他。在一九二〇年代，彭述之曾於中國共產黨中擔任陳獨秀首席副手，後繼承陳獨秀的思想，成為中國主要的托洛斯基主義者。

成舍我先生年輕的時候，活躍於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在反帝國主義情緒高漲的五四運動，主要目的之一，即為推廣以白話文書寫刊物。成舍我一直放在心上，在一九二四年時創立了普

及發行的《世界晚報》。該報歷經數年的成長，茁壯後，與北京、南京與上海等地的報紙結合，成為一商業帝國。他時甚至被比擬為美國的報業鉅子威廉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他走的是界於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中間路線。我所聽到這個故事版本，一部分是來自於露茜的轉述，一部分是來自於吳甦。當毛澤東軍隊在一九四九年包圍了北京時，露茜當時人也在這個地方。蔣介石出動私人專機將露茜帶離中國，以此彰顯他對非共產黨異議人士的容忍氣度。（編按：此專機的主要目的是接運北平知識界及其眷屬）露茜她們家族在上海重聚，之後因共黨的勢力擴張而往南撤退，最後停留在香港。而在最後一分鐘時，成舍我其中一名大女兒（成幼殊）暴露了她其實是一名地下共產黨員的身分，並懇求她父親留下協助建設「新中國」。最後成舍我先生拒絕，決定與露茜和他的其他孩子一同流亡海外。在台灣時，蔣介石從未允許成舍我在台灣辦報；不過，同意讓他於一九五六年設立新聞職業學校，即目前眾人知曉的

世新大學。

此後長達三十年的時間，露茜再也沒有獲知共產黨員姐姐的任何消息。早在文革於一九六六年開始前，毛派召回中國的外交使節團。而他們為了彰顯對毛派的忠誠，許多外交官在打道回府前與當地人發生肢體衝突。露茜在一張攝於印度的衝突照片中看見了她的姐姐，很明顯地，她姐姐曾經在中國大使館工作。當中國於一九八〇年代正式對西方開啓大門後，露茜終能夠首度前往中國拜訪。當她詢問中國官方姐姐下落時，得到的回應是查無此人。但當露茜抵達北京時，她被告知站在一座無人火車月台上。接著一個人影從遠處朝她前進，這是她自一九四九年後就未曾謀面的姐姐。（編按：成露茜與成幼殊、成思危的首次見面是一九七二年）

據我所觀察的露茜，她所信奉的是左派政治。她似乎能夠毫不費力地移動於台灣與中國間，並在兩個社會中搭起出色的溝通橋樑。露茜的父親年歲漸長，當時其實成舍我先生已逾九十歲高齡。此時正逢台灣開放報禁，成舍我創

辦了《台灣立報》，同時要求露茜到台灣準備世新大學碩士班的籌備工作。露茜自一九九〇年的夏天，永久定居台灣。舍我先生於一九九一年逝世後，露茜成為《立報》的總編輯。而她的胞姐（非仍在中國的胞姐）嘉玲女士負責掌舵世新大學。太平洋地區研究中心步履

蹣跚地邁向另一個十一年，隨著露茜的離去，這情況看來永遠都無法再康復。
（本文原題 “Lucie Cheng as Director of the UCLA Center for Pacific Rim Studies?”，摘錄自*Outsider's Reverie* (L. A.: Boryanbooks, January 12, 2010 1st)。作者 Leslie Evans, Ph. D. 於

一九八六至一九九〇年間擔任加大太平洋地區研究中心的研究員，當時的中心主任為成露茜女士。Evans教授二〇〇五年已自UCLA退休。本文中譯為《立報》國際新聞編譯謝雯好）

回憶Lucie—

Lucie的突然離開，認識的人都相當不捨！

我與Lucie相識不算久，記得是當系主任的時候，Lucie從美國回來接任立報社長的職位，當時她曾提出與各系合作，協助《立報》編輯的事，那時因為與她不熟，沒有給她回應，現在想一想有點罪惡感。

我對Lucie開始有鮮明的印象，是在當圖書館館長的時候。當時Lucie偶會到圖書館來，她在採訪組找書的狀態，我現在記憶猶新。但與Lucie比較熟的起點，是我們帶著一批交換生到安徽師範

大學訪問。那一次參訪，她與羅曉南院長在往黃山的車上大打油詩的情景，我至今仍然歷歷在目。爬黃山時，她走不到一千公尺就折返的事件，其實已埋下身體不適的癥兆。

與Lucie相識多年之後，現在回想起來，她其實有相當多讓人懷念及佩服的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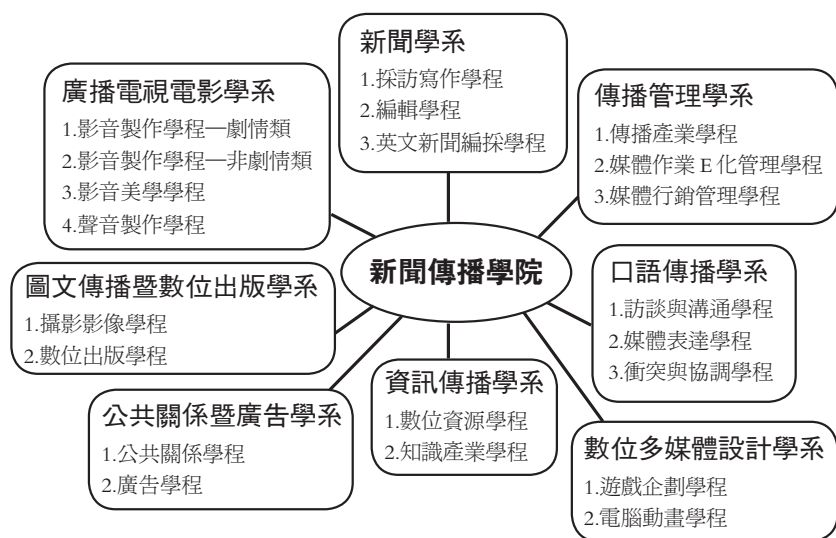
第一，她的開創精神，令人不得不敬佩萬分。例如創辦台灣獨一無二的社會發展研究所，網羅一批社會實踐及批判能力很強的學者，變成世新最具特色的研究所之一。該所教師及學生的社會

運動能量，博得台灣學術界及社運界的一致肯定，對台灣弱勢族群的福利，發揮很大的貢獻。

第二，就是她的無窮精力。她晚年身兼數職，包括台灣立報社長、舍我紀念館館長、四方報社長、破報社長、傳記文學發行人，這其間還當過傳播學院院長。雖然這麼忙碌，但她看起來永遠是那麼從容不迫；更令人驚奇的則是，每一個工作她都做得很好。

第三，她具有強烈的改革精神。她任職傳播學院院長的時候，我正好是教務長。她在院長任內做了一項開天闢地

賴鼎銘



的工作，那就是推動學程改革。經過不斷的規劃與討論，最後定調院內每個系推出至少二個學程，提供學生多元的技能選擇。

新聞傳播學院學程分配圖

第四，她不斷推出整合性的創新課程。她設計傳播學院「傳播技能」的課，讓傳播學院所有大一的學生，以跑班上課的方式，熟悉院內八個系的核心技能。該課程結束時的成果報告，已變成世新大學傳播學院的盛事；每一個大一新生都快樂地投入競賽，爭取最佳的成果展現。另一重要的創新，就是推出「媒體識讀」課程，培養學生解讀新聞的能力。為了課程的品質考慮，更合多位教師之力，編撰《媒體識讀》專書。她在世新大學推出的多元文化學程，更讓大學生受益不少。為傳研所博士班推出的「文化行動派學程」，已變成博士班的特色學程。

第五，她非常關懷弱勢，這可從《四方報》的創刊看出來，更可以從《立報》的內容中，為弱勢發聲之「性別」、「族群」的專欄報導中看出。社會發展研究所，在她的型構下，為外籍新娘及外勞等團體爭取福利的理念，都是這種精神的展現。

第六，她非常具備前瞻預測的能力。最近，我在閱讀高等教育理念的書

籍時，發覺文化研究對高等教育的影響已經深及大學的未來發展。有些學者因為看到這種發展，批評經典教育的崇高理想已經一去不復返，建議未來應該是將大學經營成一個平台，讓各種聲音在此交流。現在想一想，Lucie在推動文化研究學程，早已看到這個趨勢。

我覺得Lucie走得太早了，早到有些理想還沒有完成，就撒手人寰；早到有些我可以再請教她的事，現在已經無法如願了。二年前，她曾經問我關於太極拳的事，如果早知道，我應該強迫她好好再練太極拳，要不然，至少可以讓她再多活幾年。

我至今仍感激她邀請我為《台灣立報》撰寫專欄，並且言明沒有任何限制，我想寫什麼都可以。這也是「教授爸爸週記」會出現的原因，我從民國九十二年開始寫作起，直到九十七年七月為止，共寫了五年的專欄。這裡面包括教育、生活雜記、太極拳心得及種種日常生活的體會。沒有Lucie的鼓勵，我無法累積這麼多的寫作成果。

想一想，與Lucie認識這幾年，她不

只是我們的老大姐，她更扮演亦友亦師的角色。我們不只可以開她玩笑，還可以向她討教各種事情。我一直都很感激她，不斷暗地裡幫助我掌握世界高等教

育的種種：我現在仍懷念，她有時透過電子郵件主動寄給我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報導的往事；跟她在一起，我們永遠都有相互成長的機會！

別人怎麼認為我不知道！但在我心目中，Lucie永遠是一個令人無法忘懷的一號人物！

（作者現為世新大學校長）

加油！露茜！

「敢巴得枯打賽！」轉身離開病房時，背後傳來Lucie一貫音調上揚激勵的聲音。強忍著淚水，我沒回頭。

「敢巴得枯打賽！」（がんばってください），日語的「加油！」竟成了Lucie對我說的最後一句告別語。當夜她進了加護病房，一天半後，離我們而去。

生病後，Lucie仍做著各種工作和旅遊計劃，嚮往著一起再去日本旅行，有空常教照護她的阿英簡單的日本問候語。直到最後，她都不放棄對生命的熱愛和希望。

加油！鼓勵他人，也鼓勵自己，其實也是成露茜（按照她的堅持，要唸成露西）一生的寫照。

第一次見面，是朋友戴天的介紹：

「你們兩個都是做媒體的，怎麼不認識！」

那時，大約是一九九二年秋天，Lucie剛回來接掌《立報》，與第二任先生Arthur離婚不久。在福華二樓喝完咖啡，我去開車時，順口問：「要不要送你回家？」沒想到她直接清脆的回答：「要！」就此展開了十八年的交往友誼。

天生的好奇

Lucie有一種本領，或魅力，能立即和人拉近距離，即使只是見過幾次面，也讓人覺得已成朋友。追思會上站滿了走道的各路來賓和紀念網站上四面八方的留言，都見證了Lucie的交友廣闊。

有一次去竹子湖郊遊，已近黃昏，農家的燈火已亮，看見窗戶內隱約的身影。「我很想知道他們的故事，」Lucie說。「不爲了什麼，就是想知道。」

是社會學家田野調查的習慣，還是天生的好奇心，Lucie笑嘻嘻的注視聆聽，對人的真正興趣與關懷，讓人立刻就能感受到，影響甚至出乎意料的深遠。

但是Lucie也是一個很需要有自我空間的人，而且這個自我空間劃得很大，有時讓人感到拒人千里之外。

「在這裡面我可以自己思考，或者regroup，或者relax，」她接受翁秀琪教授的訪談時說。所以她最喜歡的還是一個人的休閒，彈鋼琴，和老師跳國際標準舞，散步，看書和看武俠劇。

殷允芃

剛接《立報》前幾年，她壓力很大，希望能將《立報》改造成一份另類的、不一樣的報紙。常忙到深夜二、三點才回家，清晨四、五點才睡覺，有時抱怨說早上八、九點就被已離婚的先生 Arthur 的美國電話吵醒」。

朋友有很多種

有次開往陽明山的路上，忍不住問：「妳還愛他嗎？」

她認真想了很久後回答：“Love never dies, it only transforms.”（「愛不會消逝，只會轉型。」）然後她有點得意的笑：「這個說法不錯吧！」離婚後她和 Arthur 一直都是合作研究的夥伴和朋友。

Lucie 認為做朋友有很多原因，「朋友只是某些方面的，不一定很多地方都要跟你一樣。所以我對朋友要求也不是很多。」

為什麼露茜和我能成為好友？有些人好奇。

我們有的地方南轅北轍，但也有許

多類似的背景和共同的興趣。

一次開車經過最喜歡的敦化北路，綿密的樟樹才剛換葉、青嫩的春葉在陽光下搖曳跳舞。她問：「你信什麼？」

「我信三民主義。」她聽後哈哈大笑。

「三民主義不就是改良的資本主義，或修正的社會主義，或第三條路嗎？和妳的社會主義，只是程度的不同吧，」我回答。

我們總是有的沒的交換著理念，誰也沒去說服誰。我們同樣都對美式放任資本主義、台式缺殘的民主和台灣媒體的墮落，十分不滿。也都寄希望於教育。

「我們來一起做些什麼吧！」露茜老是習慣拉朋友一起合作。在《立報》改為教育專業報，天下成立教育基金會後，我們合作的機會就變多了。

同樣我們在六〇年代赴美留學、任職，深受當時風起雲湧的民權與平權的感召與影響，總覺人生要有些理想與意義，為公平的社會而努力。只是露茜認為要由草根做起，要讓人民自己站起來；而天下則認為知識分子菁英，應以

天下為己任多為社會盡些力。

露茜的興趣多元廣泛，朋友也有許多面向，不同階段，不同世代、不同領域。

但實際上，她深情而念舊，朋友於她都像放在不同小抽屜裡的珠寶，從記憶的珠寶箱裡，不時拿出來拭擦、或戴上。去年夏天，她特地到紐約和夏威夷，和幾十年不見的朋友敘舊、吃飯聊天，也和多年失聯的台大同學聚會。

雖然有著陽光般的燦爛笑容和爽朗的笑聲，Lucie 其實很低調。

Lucie 其實很低調

她很少談自己或家人的當年勇，或過去的豐功偉績。在台灣的學生、同事或朋友，很少人知道她任教美國加州洛杉磯大學三十年期間，對亞美研究及喚醒亞美自覺開山闢地的尊崇地位與深遠影響；對推動中國大陸和美國文教交流的開創性關鍵貢獻。

美國第一位華裔女國會議員趙美心（Judy Chu）曾跟她工作過，深受她

啓發：「每一位當今從政的美國亞裔人士，都應該感謝、感恩成教授。」

她在台灣爲越南、泰國新移民所辦的越泰語《四方報》，其實三十多年前她在洛杉磯唐人街搞運動，也辦過類似讓新移民發聲的報紙。讓弱勢發聲，是她自始至終一貫的堅持。

等到Lucie走後，許多人才豁然發現，原來露茜做了這麼多，影響這麼遠，而大家認識的卻這麼少。

露茜喜歡同時做二十件事，展開二十個介面，這已經很快成爲傳說。但這二十隊人馬，卻很少有交集。

許多看似不相干、甚至矛盾的人與事，露茜都覺得可以並存，可以包容，都成爲她的關照。《立報》、《破報》、《四方報》、《傳記文學》、社發所、舍我紀念館、媒體識讀、移民工研究、兩岸三地電視劇裡的認同，以及數不清的各類研究，和教書，指導學生……她所散發的種子，早已在各地開花結果。

雖然「階級、族群、性別」是她念茲在茲爭取平權的主軸，但除了在學

術或工作場合，一般時間她甚少宣揚理念，或搬出任何理論。只有爲了啓發學生，她才舉幾個自己成長的故事，說明她親身體驗的「階級、族群、性別」的歧視，和那時的民權運動，如何形塑了她日後的認知、理念與努力方向。

譬如，她大二離家去夏威夷學鋼琴的時候，聖公會的牧師說要給她獎金，但她事後發現，是散佈她的照片到處向教會募款；寄居的美國家庭因她不會處理冷凍蔬菜而斥罵她：「不管你多聰明，在這裡，你就是我的女傭。」

在芝加哥唸書的時候，明明有空屋招租的招牌，但在白人區，她連碰門羹，租不到房子；在洛杉磯剛教書時，雖然薪露頭角很快進入學校高階決策的委員會，但由於她是唯一的女性，常被明示暗示要去倒咖啡、做記錄。

自己利益自己爭

這些她都鼓起勇氣，靠自己辛勤努力奮鬥，逐漸克服。這些體驗也加深了她「自己權益要靠自己爭取」的信念。

她以嚴謹的學術研究、前衛的實踐精神，培養並帶領了一群年輕的學者與學生，開創並奠定UCLA在亞美研究上領先地位。影響正在逐漸擴散。

露茜回台灣，放棄了國際學術的尖端研究，是一種犧牲嗎？她並不全然這麼認爲，雖然她常懷念在美國時的intellectual stimulation，也不習慣台灣視野的封閉。

「suffocating，令人窒息，」她常說，因此每逢寒暑假都忙著飛離台北。但在外時，她又想念著台灣的生活方便，人情溫暖，和那些未完成的工作與任務。

她常說她不屬於任何國家、任何地方，她也很不喜歡國族主義。因此她在美國、台灣或中國大陸，都能自在的生活，但也都保留了一段距離和空間。有一種抽離。

靜靜的勇氣

她拒絕，也無法被貼標籤或歸類，而自由的遊走其間。或許從小受到父

親要求孩子「獨立自主、自強不息」的嚴格庭訓，露茜永遠都有更高的目標要挑戰，不斷追求新的嘗試，企劃新的旅行，不停的上網、看書、接軌新的世界趨勢。

露茜受父親的影響很深，自認是父親的粉絲，崇拜父親，似乎終生都在尋求父親的認可。但或許並不自知，露茜也深受母親的影響，她有母親蕭宗讓的善良、包容、樂於助人、優雅、文學才氣，以及必要時的溫柔，和靜靜的勇氣。

露茜總給人一種奇妙的安全感，一種遠高於她身影的厚重堅實。似乎什麼問題都沒什麼大不了，什麼事或人，也都沒什麼了不起。

但對於有夢想要追尋，有理想欲嘗試的年輕人，她都十分激賞，熱情鼓勵。有時期待他們的成長或成功，似乎比自己的還要殷切，還要高興。令人不禁在想，她是不是在每一位活力充沛、充滿好奇、企圖打破現狀而衝撞的年輕

人身上，都看到了部分年輕時的自己？

雖然她常笑著輕鬆帶過，她年輕時海外求學的日子其實是十分辛苦的。為自籌學費，在夏威夷同時打五份工；生病昏倒在芝加哥百貨公司，送醫後被割掉一個腎；窮的時候只能向自助餐店買一坨白飯，配醬油吃。

責任自己擔起

這些辛酸，她都沒有告訴家人，因為出國是自己的選擇，責任她要自己一肩擔起。在求學、求職的路上，她有幸碰到好些老師的賞識和提攜。她對年輕學生的嚴格要求、耐心協助及鼓勵，是否也是一種傳承回報呢？當年的辛酸，在她看來，是否也是一種學習、鍛鍊和成長的過程？

露茜很少說自己，也很不喜歡麻煩別人或要人幫忙。病時即使再痛或難受，她從不呻吟。「我很能忍，」這是她的自豪。

浪漫的理想主義

從小她就喜歡搬個小凳子，瞪大眼睛聽大人講話。在內心深處，她似乎一直都能保有五歲小孩對世界的好奇，一份純真，和孩子氣的自由、任性與不服輸，以及對未來的樂觀與熱情嚮往。

「做你有興趣的、想做的事就好了，」這是她一貫對朋友和年輕人的勸告。過程永遠比結果還重要，一切都顯得那麼單純、而理所當然。

浪漫的擁抱理想，熱情的享受生活，瀟灑的走過一生。

友直、友諒、友多聞。慧黠、多藝，令人敬佩。

當我在為痛失相互激勵的好友而悲傷不捨時，可以想像，上天若有知，露茜一定會半帶促狹地笑說：「那就只有靠自己努力囉。加油！」

敢巴得枯打賽！露茜！

（作者現為《天下雜誌》群董事長兼總編集長）

一世豪情凝甘露，一腔熱血化碧濤

賴幸媛

首先，Lucie的家族就是一則傳奇，既跨越兩岸三地，也跨越國際。她的父親成舍我，一代報人辦學，創立世新，在動員戡亂戒嚴時期，就已經庇護了很多早年的異議、進步人士。我在世新就讀期間，成舍我當年庇護的異議分子，就有我的老師。當時，也因為他辦學的Style，讓我在學生時代就可以透過實際行動，走入基層，參與社會改革。

由於積極介入社會運動，我一度被當局視為問題學生，幸好有世新的自由學風以及成老的庇護，像我這樣的學生才得以順利畢業。那時，《自由中國》創辦人雷震出獄後還遭受軟禁，就住在世新附近的溝子口，我們還常去找他，談辯世局國是。

成舍我作風開明，他的子女也都很不平凡。最小的Lucie是進步的社會鬥士，也是前衛的學術工作者。她的哥哥

成思危是工程師也是知名經濟學家，曾擔任中國大陸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姊姊成嘉玲是教育家，非常成功地將世新大學發揚光大。另外有兩位姊姊，成幼殊自少女時代就以詩聞名，成之凡是知名音樂家，曾經以華裔身分提出獨特的文化政綱，並三度參選法蘭西總統。

Lucie是堅定的女性主義者，當年在美國那個男性宰制的學術圈中她就可以透過個人的努力，嶄露頭角。回到台灣之後，在二十年之間，透過社發所、《立報》和《破報》，開闢園地，提供資源，來庇護、孕育進步的思想，擴大台灣的進步基地。在台灣這個左翼思想那麼貧瘠的島嶼，因為Lucie，至少還有星星之火。

我最難忘的是Lucie那燦爛的笑容。她的笑容，不管在什麼時候，總給人一種溫暖而穩定的力量。二〇〇九年，成

思危來台灣，我還和他們兄妹會面，大家談的非常愉快。那時，Lucie還是笑得那麼燦爛，談話依然鏗鏘有力，根本看不出來是罹癌多年的病人。誰想到，這樣一位常常讓人覺得樂觀、給人力量的女性，居然就這樣走了！

在Lucie的告別式上，我特別寫下「一世豪情凝甘露，一腔熱血化碧濤」的悼辭。這當然是源自鑑湖女俠秋瑾的詩句：「不惜千金買寶刀，貂裘換酒也堪豪。一腔熱血勤珍重，灑去猶能化碧濤。」Lucie革命性的一生，既是女中豪傑，也是時代先鋒。當她如陽光一般的笑容依然縈繞在我腦海之際，我也僅能以這樣的悼辭來表達我對她的敬重與懷念。

（作者現為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委）

悼念奇女子成露茜

李歐梵

《亞洲週刊》於二月中報導：《台灣立報》發行人兼世新大學講座教授成露茜，突於一月二十七日病逝台大醫院。我在她逝世後一兩日就收到她的外甥女周成蔭教授傳來的消息，震驚之餘，不覺沮喪哀痛。成露茜是我在台大外文系的老同學，又是在美留學及任教期間，在芝加哥大學的同學，和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同事，說起來也有將近半個世紀的交情。對於這位奇女子，值得大書特書。

《亞洲週刊》特約記者童清峰的報導，是著重成露茜作為一個報人——她是名報人成舍我先生的次女——為台灣弱勢者爭取發言空間的功勞，卻沒有提到她在學術方面的貢獻。其實，她也是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首創「亞美研究」（Asian American Studies）的學者，美國的亞裔也是弱勢群體，她以學術的方式為這些少數族群——特別是生在美國的華人——取得發言空間，成績卓

著。她又是社會學博士（夏威夷大學）和圖書館學碩士（芝加哥大學），尤其在社會學方面，可謂桃李滿天下，包括台灣幾位名教授，都是她的得意門生。

為什麼成露茜生於望族，卻如此同情弱勢者？我認為和她多年來作為思想上的馬克思主義者有關，這一個事實已是公開的秘密：她和我一樣，受到六○年代美國左翼思潮的影響，但比我更激進，更趨向於行動派，甚至穿上「毛裝」以示旗幟鮮明。然而她並不固執於意識形態，也從不批鬥，對她的老師和同學更特別照顧。也許很少人知道：芝大的著名漢學家和圖書館長，也是圖書館界的老前輩，現已一百零一歲高齡的錢存訓教授，一直視成露茜為他的高足之一。她所受的圖書館學科班訓練，多年後終於在亞美研究方面開花結果。據我所知：成露茜當年在UCLA主持的亞美研究中心，也是最早挖掘並保存美國華裔歷史資料的學術機構。所謂「真才

實學」，用在她身上，一點都不為過，她既是實踐行動派，又是十足的學者。

記得我於一九六二年初到美國求學的時候，第一站就是芝加哥大學，我當年還是「土包子」一個，成露茜已在芝大就讀，特來城中心的灰狗巴士站接我，兩人坐的士到芝大校園下車，露茜一臉笑容對我說：「付錢吧，記得給小費！」我匆匆從褲袋拿出一枚五分錢的硬幣作小費，交給黑人司機，不料他一氣之下把五分錢丟在地上，開車揚長而去。露茜不動聲色地說：「你運氣好，他沒有打你一拳！」原來我把五分錢當作二十五分錢（俗稱quarter）——

這一段笑話，我曾在拙作《我的哈佛歲月》中提過，此處不覺又重述一遍，為的是紀念這位老朋友。在我的心目中，她永遠不動聲色，從容不迫，也永遠面帶笑容；我從來沒有看過她生氣或傷心過。甚至去年在台灣世新大學她的辦公室，她向我追述幾年前在歐洲旅

行時腿部突然劇痛（事後才知道是癌症來襲）的事，也是輕描淡寫似的。見她精神飽滿，我也以為她早已痊癒，不以為意，還答應她一年後到她的學校來講學，不料一年後她已經先走了。

成露茜一向精力過人，而且充滿理想。她辦報，有她自己的遠見（vision），和她的父親不盡相同（但精神一致）。她堅持《立報》不受任何黨派和財團的牽制，正因為如此，她才能為弱勢者開了一個言論空間。除此之外，她大膽買下已有數十年歷史的《傳記文學》雜誌，明知不會賺錢，但仍堅持下去，為的是為過去和歷史留下另一個言論空間。《傳記文學》多年來似乎偏重黨國軍政大事的回憶，露茜接手之後，開拓言路，特重知識分子，數度向

我約稿，指明要我寫我們共同的老朋友胡金銓，等了一年多，我終於交了稿。

武俠小說中有所謂肝膽相照的情義，我能夠和這位俠客式的奇女子，結為肝膽相照的朋友，也是我一生中的幸事。成露茜雖有俠義心腸，但她允文允武，多年來在學術界為女性研究及性別研究（gender）開拓天地，無論為學或辦事，她的「點子」特別多，我簡直跟不上。她在台灣，每日繁忙，但不忘老同學，大約兩三年前，經她親自個別聯絡，找到了當年外文系同班同學七八位——包括《現代文學》的王文興和名作家陳若曦——在福華飯店的咖啡廳聚集一堂，見面時大家喜氣洋洋，但也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世事滄桑，看來只有成露茜和我最無憂無慮。

在我的心目中，成露茜永遠是一個「樂天派」，我們見面時她只談理想，很少談自己的過去成就，到底她為台灣作了多少建樹，連我也不太清楚。只記得有一次她對我輕描淡寫地說：「我一生投資都失敗，都賺不了錢，只有一次投資一家古典音樂電台，倒賺了……」，我聽後大樂，向她鼓掌道賀。因為我知道她也是一個古典音樂的愛好者，而且彈得一手好鋼琴。

這樣一位多才多藝、膽識過人、而且又能橫跨多種學科和經驗的「女強人」，竟然先離我們而去，我真是不能接受。春節期間，在一片拜年的喜慶氣氛下，我時感鬱鬱不樂，老婆知道我是在思念我的老同學和老朋友成露茜。

（作者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教授）

不平凡的勇者

成露茜一生的志業與事功，大家談了很多，我在《台灣立報》追隨她近二十年，有些感觸，也有些觀察。

我和成社長結緣於《立報》，一九九一年，她自父親手中接辦這份報紙後，邀我幫忙，我當時在《中央日

報》任副總編輯，無法出任全職，於是就擔任顧問。成社長給我的第一印象是用人不疑，她那時仍在加州大學任教，

魏 瀚

每逢寒暑假都會赴洛杉磯停留一兩個月，她不在台時，社務就由我代理，她把圖章交給我，也不多作指示，一般社務就由我作主了。

當時我們認識不久，她對我的了解也不深，後來我問她何以對我如此信任？她笑笑說：「我相信我父親的眼光。」原來我早年曾追隨舍我先生一段時間，幫他老人家編《小世界》周刊第一版，成老校長對我的做事與為人，給予肯定與好評。

很多人都說，寧可做成露茜的朋友，卻不要做她的部屬。的確，替成社長做事，是比較辛苦的，因為她要求的標準較高，她是以要求自己的標準來要求同仁。

我在《立報》和成社長始終相處融洽，我必須要感謝她長期以來對我的尊重與包容，我有時較衝動，有時會直言，她都輕鬆以對，她從未對我說過重話，也從未否定過我作的決定，雖然有些決定她不一定贊同。

這些年，我從成社長那裡學到很多東西，她的思維和想法，與眾不同，早

人一步，她的宏觀視野與前瞻論點，啓發了我以及《立報》的同仁。

對成社長辦報理念和訴求，我從最初的疑慮、觀察、理解到趨於一致，確有一段心路歷程。有些事我和她觀點不一定相同，像《立報》的幾次轉型，《破周報》、《四方報》的創辦，我有的贊成，有的反對，但最終都會被她說服。成社長有聽不同意見的雅量，那怕是位基層同仁的意見，她都會專注的聆聽，接不接受是另一回事。

她勤於學習新的事物，接受新的觀念，電腦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她學得很快，電腦方面的新名詞，都能朗朗上口，可見她在百忙中，仍不忘學習。

堅持與執著，是她的本色，她從不向困難低頭，永遠樂觀奮鬥。近十年來，她一直在為維持健康而奮戰，她多次克服病魔的糾纏，一次又一次重新站起來，她用極大的勇氣與毅力，面對身體上的不適，從不多愁善感，從不灰心喪志。

從去年秋天開始，她每週固定去醫院報到，靠輸血來維持體力，補充精

力。在這種情形下，她還是每天把工作排得滿滿的，我實在為她的健康擔心。每次見到她，我忍不住勸她多保重，多休息，她總是滿面笑容地說：「我還好，沒問題」，其實我了解她的健康情況，我內心在說，妳不好，有問題，妳需要休息，但這些話說不出口。

對於成社長在病情起伏不定的狀況下，仍孜孜不息的工作，很多朋友都說，這豈不是和自己的健康開玩笑；我的觀察是，她這樣做，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第一，她要以忙碌的工作來忘掉身體上的病痛，她喜歡熱鬧，喜歡和眾人相處，她常常沉浸在忙碌的工作中，來忘掉她是個病人。

第二，她以工作的需求與表現來激勵自己，堅強自己的意志力，讓精神上、體能上得到鼓舞，來克服病痛。

的確，一直到去世前，她思路清晰、反應敏銳，洞察事物，並未受到身體病痛的影響。在不同的場合中，很多人每天都期待她的出現，等待她的指導，她也總是不讓人失望，一身合適優

雅的搭配、精神煥發、滿面笑容地出現在眾人之前。

第三，她知道時間寶貴，好多工作尚待完成，念茲在茲，放心不下，於是焚膏繼晷，廢寢忘食，她在和時間賽跑，也和頑惡的疾病搏鬥。

對台灣立報社的同仁來說，成社長

的去世，除了震驚與哀痛外，還有一種深深的捨。

不捨的是，她太辛苦了，她應該休息卻沒有休息，強撐著病體，用生命的餘暉，照亮周圍的人。

成社長是一位不平凡的勇者，她勇於挑戰傳統，勇於挑戰威權，勇於揭穿

虛偽，勇於面對橫逆，她為年輕一輩樹立了標竿和典範。

放下重擔，成社長走完多采多姿的一生，她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作者為台灣立報社副社長）

懷念成露茜

我們的成露茜教授走了。成露茜是美國洛杉磯加大（UCLA）的榮譽退休教授。她對美國亞裔、華裔的研究，尤其是全球化下的婦女、移民婦女、亞裔移民史的研究，改變了美國社會對亞裔少數民族的成見。一九七九年，她在女性主義與婦女研究的重要期刊 *Signs* 上發表的論文，“Free, Indentured, and Enslaved: Chinese Prostitutes in 19th Century America”，早已被認為是性別與移民研究的社會學經典了。由一九七〇年任職洛杉磯加大開始，對社會科學的學術領域而言，成露茜是亞美研究方

面的重要先驅。由於家庭原因，與周恩來有互動關係，在一九七〇年代初即積極著手推動中美學院關係的改善與互動。成露茜是波瀾壯觀的一九六〇年代社會運動所造就的一代。她對我說過的話，至今言猶在耳：「是亞裔少數民族運動、婦女運動等社會運動，造就了我的改變。」她還說：「做為亞裔、女性及左派，我明明知道我被學院當作象徵的『籌碼』（token），但是不能僅被當作籌碼，我能夠創造實踐的空間。」即使以學院的狹義學術標準來看，她的學術成就也是華裔學者中少數有能見度

者。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下，當台灣的國家對學術的管理在推動 *SSCI* 標準的時候，我請她參加《台灣社會研究季刊》辦的座談會，她就說：「我在美國評審過百來篇學術論文，就沒聽過什麼 *SSCI*。」說這些話的人已經遠去，現在只有使我們更加懷念她。

對台灣的社會科學學術界言，回到台灣的成露茜教授更是一個不一樣的學者，有極特殊的意義。她是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的創辦人。世新大學發所不是一般台灣學院中習見的社會學學院，世新社發所的英文是：“Social

夏鑄九

Transformation Studies”，也就是社會改變、社會轉化的研究。成露茜是不一樣的社會學者，關心社會動力，社會變革，弱勢群體。「有學有術·實現基層·回歸理論·再造社會」十六字箴言，就是此意。也因此，她是台灣社會科學界中少數與台大建築與城鄉所一直維持極為親近與積極關係的資深學者。她拔刀相助兼任教職，開設性別與發展的課程，長期以來，與研究生們維持超過一般學院師生的緊密關係。以及，在與一些重量級國際左翼學者，如David Harvey、John Friedmann、Leonie Sandcock……交流、研討、學術會議、來台演講的過程中，我們有不少機會合作，共同研究，撰寫與發表論文，真是獲益良多。她的開放、平等、體貼、敏銳，更是使我們的工作過程變成充滿愉快的學習過程。這幾篇論文，我們約定以英文發表者，Lucie Cheng在前，以中文發表者，我在前。我們共同關心的焦點是全球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的互動。

期刊論文是：

●夏鑄九、成露茜、陳幸均、戴伯芬，二〇〇二：〇六，〈朝向市民城市：台北大理街社區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四十六期，頁一四一—一七一。

●Cheng, Lucie, and Chu-joe Hsia, 2000, “Asian Economic Crisis, State Policy, and Urban Movements: A Taiwan Version”, *Asian Geographer*, Vol. 19, No. 1-2, pp. 63-73.

●夏鑄九、成露茜、楊友仁，一九九九：〇九，〈亞洲經濟危機、國家政策與都市社會運動——台灣的版本〉《城市與設計學報》，第九、十期。

●夏鑄九、成露茜，一九九九：〇三，〈歷史之債——台灣的領域治理與跨領域之社會〉，《城市與設計學報》，第七、八期，頁五七—九一。

會議論文則是：

●Cheng, Lucie and Chu-joe Hsia, 2001, 07,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and Local Governance: Three Models of Practices in Taipei”, World Planning Schools Congress, Shanghai, China, July 11-15.

●Cheng, Lucie, and Chu-joe Hsia, Hsin-chun Chen, Po-fen Tai, 2000, 11, “Toward a Citizens’ City: The Dali Community Movement of Taipe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Re-inventing Global Cities, The Centre of Urban Planning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Hong Kong, Nov. 11.

●Hsia, Chu-joe and Lucie Cheng, 1999, 12, “Asian Economic Crisis, State Policy and Urban Movements: A Taiwan Version and A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Asia-Pacific Economy in 1997 and Into the 21st Century: The Analysis of Crisis and the Prospect from Economic Geography,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Tokyo, Japan, December 18-20, 1999.

●Cheng, Lucie, and Chu-joe Hsia, 1999, 09, “Asian Economic Crisis, State Policy, and Urban Movements: A Taiwan Version”, paper for the Third Workshop on Intercity Network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Osaka, Osaka City University, September 1-4, 1999.

●Chen, Lucie and Chu-joe Hsia, 1998, “Exploring Territorial Governance and Transterritorial Society: Alternative Visions of 21st Century Taiwan”, paper for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aipei.

我們合寫的最後一篇會議論文發表之後，一直沒有進一步完成為期刊論文，也就不列在上面了。只記得那篇論文，以當時高雄市長與將接掌民進黨主席的謝長廷，打算利用任期空檔時間，在台商安排下訪問廈門，此事被陳水扁經由當時陸委會蔡英文之手而

阻止，等等經驗資料，分析台灣的國家，由一個以國民黨為代表的發展性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如何轉化為一個以民進黨執政為代表的民粹國家（populist state），在全球經濟、國家以及社會之間，尤其是在認同政治上，所造成的衝突過程。當然，那時怎麼都不會想到，民進黨執政，最後會以貪腐弊

案成為其自身的終結者。

由於成露茜肩負父親成舍我的期望，出任傳播學院院長，經營、創辦、接手好幾份媒體，像《台灣立報》、《破週報》、《四方報》、《傳記文學》。面對台灣政治社會的快速變動與不舒服的環境壓力，這樣一個人當三個人在做事，長期身體消耗，終告不支。

以自己對成露茜長期的友誼與瞭解，相信她是很平靜地離去，而不會希望我們以淚送別。露茜歡喜好走，南無阿彌陀佛。

（作者現為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成露茜與社發所

黃德北

一九九〇年代中期露茜決定返台後，她開始籌劃設立一所她稱之為「台灣獨一無二，甚至也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左翼研究所，這就是後來與她的名字緊密相連的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事實上，露茜在UCLA擔任亞裔美國人研究中心主任時就曾經將她的某些進步理念付諸實現，例如她率領中心的教師與學生共同參與洛杉磯華埠移民工籌設合作社的組織工作；這個中心最初甚至採取教師、學生與職員組成的委員會共同決定中心政策的運作模式；她還

在中心內部實施某種再分配的制度，即由中心同仁依志願每年捐出部分所得，然後大家再討論這些捐款應該如何分配給中心比較需要的成員，她稱之為「按需分配」；在進用新進的教職員時，她也一直有意識的挑選有進步理念的人選成為工作夥伴，以確保中心不致「變色」。

不過，隨著一九六〇年代美國進步運動影響的逐漸退潮，處在一個主流學術機構內的研究中心，終究要受到校內外各種大環境因素變化的影響，露茜的理念不得不再受挫。今天，亞裔美國人研究中心雖然是美國一個研究移民

的重要學術研究機構，但它的運動性已經消退。

於是她回台灣要在她父親創立的學校中設立她理想的一個教育機構，在她洛杉磯時代的好友蔡建仁（社運界的朋友都稱他為「小蔡」，因為一九七〇年代中期他在美國參加反對運動時是年紀最輕的小夥子）協助規劃下，一個以「有學有術·實踐基層·回歸理論·再造社會」為教育理念、強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研究所開始逐步誕生。

不過，露茜向教育部申請成立社會發展研究所，第一年卻遭到評審委員

會拒絕的命運，這是她首次與保守的台灣社會科學界打交道。但靈巧與充滿鬥爭經驗的露茜，立即採取各項策略因應（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露茜在發展研究年會的研討會上曾經詳述她籌設社發所的甘苦談），終於獲得教育部同意在一九九七年成立社會發展研究所。

社發所成立後，露茜將她在美國的許多經驗都重新複製過來，她審慎的為社發所挑選有進步理念的教師如夏曉鵬、陳信行與林益仁，她與蔡建仁還到各種場合與進步的社運青年與學運青年接觸，鼓勵那些蟄伏在各地的年輕人來念社發所。透過這些進步師生的參與，社發所重視社會實踐與關懷弱勢者的學術性格就在誕生之初即告形塑確立。

另外，社發所成立之初學生與教師共同積極參與所務討論，也是與台灣其他系所最大的差異之處。我聽早期的同學提到，當時所務會議每週開會一次，常常開到深夜還無法散會，會上甚至會出現師生爭得面紅耳赤的場面。同時，社發所的學生還成立學生會，統一管理工讀金與獎學金，並採取「按需分配」

的方式分配給需要的同學。這些作法顯然都與露茜在UCLA的運作模式有一定的相似性。

台灣的學運與社運青年人數有限，社發所成立二、三年後，來念社發所的學生逐漸變成一般的在學學生，露茜創立社發所初期的許多作法可能已經無法維持下去，但社發所強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及關懷社會弱勢者的教育理念卻一直被社發所師生努力地奉行，因為大家都知道露茜創立這個研究所的艱難，以及社發所今天在台灣存在的意義與價值。

露茜在擔任社發所所長期間，社發所的師生常常會走上街頭為弱勢者發聲，一旦搞運動，難免會引起某些權勢者反彈，並企圖透過學校進行施壓，但露茜總是一身擔起所有來自校內外的各種批評與責難，不讓師生感受到任何壓力。

露茜所謂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絕非只重社會實踐、不顧學術研究，她深信社會實踐如果沒有堅實的學術研究做支持，將無法發揮它的影響力。因此

社發所的教師可能是台灣最辛苦的一群學術工作者，我們不但隨時要上街為弱勢者發聲，揮舞左手抗議的拳頭；右手還要捧書撰稿，生產符合學術體制的進步論文。近年來，社發所在移民、勞工與文化研究等領域一直在台灣學術界維持領先的優勢（隨著王志弘轉往台大城鄉所服務，社發所勢難再維持在文化研究上的優勢，但在蔡培慧加入教師行列及陳信行與陳政亮近年投入對適當科技的研究，社發所未來可能會在農村發展與適當科技研究上開創新的學術發展空間），這是露茜與所有社發所教師多年努力累積的成果。

二〇〇三年露茜轉任世新大學傳播學院院長，勢必無法再兼顧社發所的發展，在徵得社發所同仁意見後，她決定邀我來社發所負責行政工作。我記得她約我談此事時，她只是談她創立社發所的理念及目前面臨的問題，然後便直接提出希望我來接替她的工作。她說得如此自然，沒有任何客套話，因為露茜一直把社發所當成一個台灣社會的公共財，她認為台灣所有進步的學者與社運

組織者都應該與它結成緊密的關係，協助它的發展。她的這種態度，使得很多人都無法拒絕她的請求。

露茜去世後，許多人用各種方式表達他們對露茜的回憶與懷念，有些《立報》、《破報》、《四方報》與《傳記文學》的工作同仁談到做為一個媒體者的她，如何辛苦的支撐這些另類媒體；

精采 Lucie

成露茜：學者、報人、改革者、事業家，也是我的好朋友

「我是成露茜，立報社長。」一九九二年我剛到世新任教，意外接到Lucie的電話：「聽說你過去在神通電腦服務時負責DTP（電腦桌上排版），我有些電子出版的問題想請教你。」從此我認識了熱誠、主動，對新事務勇於探索的Lucie。

《立報》每年社慶都會禮貌性邀請世新各主管參加，我時任資管系主任，在任內一定攜小禮物參加她們的簡約同樂會。因為我也曾在媒體業服務十

她的學生回憶她的批判性教學與研究，以及她與學生的親密互動；舍我紀念館的同仁提到近年來她對民國新聞史研究的積極投入，裡面一方面有她對她父親成舍我的思慕與景仰，還有她嘗試將新的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應用到新聞史研究上的學術企圖。但我想露茜一定會希望有更多人能了解她的教育理念與實

踐，那是一九六〇年代一個進步時代對她產生的影響，她一直努力將那個時代的信念落實，至死不渝。

蔡建仁（趙萬來）形容她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六八年世代之女」，真是對她最好的描述。

（作者現為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吳統雄

數年，深知辦商業報易、辦理想報難，見過許多剛進媒體、充滿追求公理正義的年輕人，一旦升任主管、扛起經營重擔，就不得不轉向低級趣味。「獨立與社會責任」常是新聞教育中的口號，像Lucie這樣堅持到底者，真是不多。我的出席，就是想表達對她理念的支持，以及對《立報》員工的敬意！

主。在聚會中，我們又發現共同的行為模式。因為在這類場合中，訪客難免拘謹，Lucie或我總是從講一個具有比較文化意義的笑話開始，我們這一群主客，總會在笑聲中拉近了距離。

世新剛剛改制為大學之初，對國際化事務有興趣的老師相對不多，但成前校長（嘉玲女士，現任董事長）有積極開拓國際化的魄力，經常邀請國際友人來訪，Lucie和我也成為隨同招待的地

在這些成因偶然、但頻率不低的會面中，我們愈來愈發現彼此的共同點：Lucie是多才多藝的實踐者，而我是多元學習的追求者，我們都不滿意分流、分科的教育制度，認為應該有「全人」的學習與體驗，不論是學術的、或是生活的。

我們研究的大方向都是人類的行

為，但我們的研究方法在形式上似乎完全相反，Lucie是質（qualitative）的、田野的、批判主義的，對當前流行的計量方法是不完全信任的。我也認為當前把物理計量方法、生理計量方法直接套用到行為研究上可能是不恰當的，但應該持續探索不同的計量方法。不過，我們形式上的不同，卻是實質的一致，就是不能把研究方法作為一種儀式，不能因為流行而遺忘了真正的知識，如果流行的方法並不能尋找到可預測的科學知識，就應該勇於其他途徑的嘗試。

Lucie的著作中有許多CIs，但她是極少數擁有多CIs，卻願高聲說出真相：「CIs不過是商業的索引而已」、真正的學問家之一。在當前學術發展的CIs現象之中，有著名大學選出的傑出研究教師，工作是集中優秀研究生專門篩選會登CIs的題目與題材，老師們集會談的是刊登CIs的策略，而不是對知識本身的反省。我們擔心這種愈來愈盛的潮流，有可能復現清末的八股亡國（文化與創新意義的淡逝）。失去了這位有資格的諍言者，實在是臺灣的損失！

Lucie心情好時，會炒兩個小菜，邀好友到她的小院中小吃、小飲。她的客廳中放了一部家庭少見的平臺鋼琴，因為她原來是職業級的演奏家，她在美國進修時，別的留學生打工只能在餐廳端盤子，她卻是在餐廳演奏。我呢，偶爾在世新的教師餐廳彈幾曲，以自「愚」來娛人，雖然等級不同，也算異曲同工。我鋼琴彈的不怎麼樣，但卻是學習MIDI（數位音樂）的一項必要工具。Lucie後來擔任傳播學院院長，就邀請我開了幾年「數位音樂創作」研究課程。這類課程在綜合大學中非常稀少，Lucie不僅在世新催生了這項教學服務，世新的探索成績，也間接影響了臺灣大學後來邀請我到臺大開辦數位音樂實驗室。

Lucie雖然在UCLA退休，但早年的貢獻，使她仍然保留在UCLA的堡壘。我曾三度赴美擔任客座，寒暑假也常有機會赴美發表論文，若是從洛杉磯進出，而她剛好也在的話，總是要熱誠的招待我一番。有一次，她提議要請我看一場電影，而且她已經看過了，希望陪我再看一遍。原來是日本片 *Shall We*

Dance?（《大家來跳舞》），這部電影多年後，被好萊塢拿去重拍了一次，由李察·吉爾主演，既算是個異數，也反映了這部戲裡人類跨文化的共同感情。

劇情是說一位朝九晚五的中年男子，以為自己的人生已盡，沒有什麼樂趣與熱情。他偶然瞥見一位國標舞蹈老師，為之驚艷，所以就去舞蹈社報名參加。他的原始動機是非舞蹈的，但在老師的開導和其他舞者的交流之下，逐漸了解國標舞「不是社交」，而是運動、才藝、肢體的和諧、心靈的釋放：標準舞的儒雅浪漫、拉丁舞的狂狷奔放……，而雙人舞更是「非關男女」而是「All about trust」（合作、共享的信任哲學）。在嚴肅的學習過程中，他和其他的舞者都發生過挫折和被誤會。最後他發現，他本來想追求的小火花並沒有發生，但他反而得到了「真正的舞蹈」，體驗了身體與性靈投入的自足樂趣，激發了以軀體的躍動重燃體內將熄的熱情！

舞蹈，是一種身體與時間的雕塑藝術。我從小就為之感動憧憬，雖然技能

不精，卻希望學習與享受其中的動靜之美。但這部電影也剖析了舞蹈的兩大困境：第一、社會有相當比例的人士，對身體之美的解放與詮釋，相當忌諱；第二、對不跳舞的人，眼中常看到男女、而看不到舞蹈。當我們發現對方也是一位真舞蹈的嚮往者，不免喜出望外，後來我們也因切磋技藝，結為多年訓練夥伴。

Lucie常保赤子之心，有一次她對一項青少年活動的調查報導不太滿意，乾脆呼朋引伴，同去青少年的夜店看看實況。幾個熟透的女士男爸，夾在一群小朋友之間，她依然十分自在。又有一次，彗星要來了，她又招呼我們半夜跑到郊區的山上去等彗星……。

Lucie是個工作狂、更勇於任事。我替她算過，最多的時候，她負責了十二項職務。她對每一項工作都全力以赴，但就我的觀察，她對三項職務有潛意識的特殊感情：《立報》（含《破報》）、《傳記文學》和舍我紀念館。她曾向我透露，她放棄婚姻，完全是因為放不下父親（舍我先生，世新創辦

人）的理念基業，而夫婿又不願隨她來臺。她的這項困難抉擇，足以說明她對臺灣這塊土地之愛。

坊間一些媒體在報導Lucie和姐姐（世新董事長）的軼事時，常喜歡強調她們的差異面。但Lucie不斷和我提到她們的姊妹情深，我發現她們極為相似的承傳著父親的特質：超越一般的獨立個性、擁抱著前瞻的夢，更重要的，還能腳踏實地、鉅細靡遺、苦幹實幹。

二〇〇六年底，Lucie給了我一封短信，說明因病取消我們的常態會面，事實上，就變成永久的取消。後來見面，我想慰問她的病情，她卻顧左右而言其他，我也不再追問了。

日前在靈堂上，她身邊親近的工作夥伴告訴我，Lucie本來有各式各樣的好朋友、分別從事各種多彩多姿的活動，但在發病後就幾乎停止了所有交誼活動，更全心全力投入工作，反而收了更多的研究生。

我猜，也許這是Lucie的善意吧？她希望她所有的朋友，對她的記憶都是充滿活力、洋溢著歡笑。她可能不忍心在

無意中，把她對病痛的不適感覺傳染給朋友。

一般研究生的指導都是孔子「黃鐘式模式」（亦即不敲不響），但Lucie非常不同，她對研究生的關照有如親子，主動與嚴謹有如自己的論文，到達譚詞行文都字斟句酌的地步，這等於加速燃燒她生命的蠟燭。突然有一句老話閃入我心中：「生命的意義在於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也許Lucie就是要加熱她的生命之光，讓更多年輕人得以享受她的薪火吧！

我曾在聯合報系受教、服務十餘年，對《聯合報》創辦人與長者賜予的啓迪，深具感激，對照新聞文化的嬗變更有感懷。Lucie曾經要我把心路歷程寫給《傳記文學》，我答應至今近十年竟然還未動筆，這筆債我一定要還。Lucie讓我警覺，人生苦短，答應朋友的事，一定要馬上去做！

Lucie，現在讓我也回撥一個電話給你：謝謝你精采的光環，也曾照亮我人生一隅。

（作者現為世新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

獻給「勇者無懼、犧牲奉獻、堅持原則、堅守本分」的露茜

張宏源

時光倒流，記得第一次一九八四年您與先生Arthur教授返台探親，在成嘉玲院長指派下，我陪同你們在台北市區景點如龍山寺等參訪後，一直到一九九〇年爲了老創辦人所成立的「台灣立報社」，我們再度相遇。您爲了繼承創辦人遺志，擔任報社副社長，勇敢面對美台兩地奔波之苦，最後選擇放棄婚姻返台定居，讓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在報社工作期間，面對經營壓力、發行困難、人才流失等問題，您都坦然面對，爲了堅持創辦人遺志「我要說話」，讓《立報》不中斷發行，堅持原則，不改版面，讓我與業務部同仁感到折服。尤其在創辦人過世後，您編著《舍我先生志節文粹》一書，我們曾提到舍我先生精神的意涵是什麼？我回答舍我先生是主張：「新聞工作者最高境界，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並且要做到德智兼修、手腦並用」，您對此

答案似乎不甚滿意，我反問您卻不回答，臉上表情隱約透露、探索想追求更完美形容詞來詮釋舍我精神，您追求完美近乎苛求的態度令我更加敬佩！

您在傳播學院擔任院長期間，我擔任院評會委員，有機會進一步了解您，對傳院學術發展，首先您推動「媒體識讀」、「傳播技能」、「跨學門」等課程，希望提升傳播學生基本素養；更舉辦JAMCR國際研討會，提升世新大學國際知名度。在學術研究領域，您不怕得罪人、不徇私、不袒護、堅持學術嚴謹態度，令多數同仁畏懼，每當我遇到學術研究挫折時，抱怨學術審查制度公平性，您都給予積極鼓勵說：「文章是給三個人看就夠了」，只要再接再厲，終究會有得到肯定的時候，您的教誨是我這些年繼續從事研究的動力。這十幾年來您一直自律甚嚴，幾乎不曾休息，而您偶然會邀請我去欣賞豫劇，或是我邀

請您去欣賞三重奏或音樂會表演，或打小麻將減輕一點工作壓力，或相約到小館子打牙祭，您對物質需求節約態度，讓我內心深受感動，也提醒自己該用則用，絕不浪費。有人批評您非常嚴格，但我個人認爲您堅守本分、堅持原則、不畏權勢，讓人感覺到似乎不通人情，但事實不然。相反地，您照顧協助弱勢者，幫助許多晚輩，包括我。最重要的是在待人、處世、接物您都以身教言教方式毫無保留教誨我們晚輩。

二〇〇八年您生病住院後，我跟致力兄、良文兄及素甘經常邀請您小聚，也利用聚會時間，我都嘖嘖喳喳陳述一些個人意見及看法，過去幾十年大部分您會抱怨聽不懂我在說什麼，令我相當沮喪。直到二〇〇九年十二月我們在彭園用餐時，我將過去幾年在傳播產業研究成果向您報告、分享，您似乎給予適度的肯定與認同，這是我這數十年

來一直在努力期待，讓我興奮不已，連致力、良文都非常驚訝，這是多麼不容易，我深知您是在給予我鼓勵打氣！所以我主動提出我們在二〇一〇年一月份再次聚會，我要把握機會再跟您分享、再度得到您的認同及您的開示。只可惜您再度住院，無法參予此次聚會。在返回紐約之前，我特別叮嚀蘭琪及阿英好

感念LUCIE

最後一次見到Lucie時，她還殷殷探詢我父親的病況，沒想到父親離去未及兩週，Lucie也走了。

認識Lucie好多年，但這幾天再怎麼思索，就是記不起始於何時何地，我有幸遇上如此一位亦師亦友的長輩。記得，初識時，有回到傳播大廈地下樓層的《立報》辦公室找她，才踏進辦公室，Lucie即從座位上起來，熱切地招呼我，不擺架子、沒有距離，動作簡單卻令人印象深刻。往後一直沒告訴Lucie的是，受她當時身影態度的影響，從此凡

好照顧您，等我返台再相聚。

但天不從人願，您終於被病魔打敗，也讓我永遠失去一位最值得學習效法的師長，讓我無法再找到一位長輩來傾訴與分享我的一些研究成果及教學心得。每當午夜夢迴，想起您敘述小時生氣離家到澳門事件，以及在美求學期間打五份工，獨立自主，都讓我們回味無

有學生來找，我也必然起身相迎。

大家說Lucie是個搞革命的左派，可我沒見過那般溫和的左派——動作溫和，話語亦然。看過她最嚴格的样子，是在IAMCRI二〇〇五年會，當時有位學生輩的老師交出一篇難以卒讀的摘要，並且在提報時臨陣缺席，Lucie雖不滿，卻也只淡淡表示，已經寫了電郵加以指正。另外，曾有羨嫉者針對Lucie主持的教育部二〇〇八—二〇一〇年媒體素養推廣計畫案造謠生事，但她非僅不急於澄清，反倒自言詞間多給對方留餘

窮，您的爽朗笑聲已不在，讓我們悲慟不已。最後願您在天之靈，一切安好，保佑想您的我們。

張宏源敬上 二〇一〇年二月十一日

（作者現為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

余陽洲

地。Lucie的從容寬大，我恐怕永遠學不會。

Lucie也是一位充滿熱情的行動派。在兩千多萬的教育部計畫裡，她公開宣布世新團隊不支領研究薪酬。如此作法，讓許多人訝異和感動，但熟悉Lucie的，知道她在《立報》、《破報》、《四方報》等非主流報刊經營上，莫不秉持相同信念。Lucie帶領研究團隊絕非掛名不做事，她是全心投入開會討論的領導者，所以和她共事，首在理念一致，而非追名逐利。工作上，Lucie展

現無限精力，她的教學研究和媒體觀，都致力於落實社會公義和階級平等的理想。

還有，無論從什麼標準衡量，Lucie絕對稱得上傑出人物，只是認識以來，我難得聽她自道當年唸音樂系的初衷、芝大求學經歷、在台大開課教大眾傳播、如何成為UCLA社會系榮譽教授，

或者是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而無法返台、面會周恩來等種種傳奇事蹟。Lucie的謙虛內斂，也表現在與人交往互動上；尤其對門生晚輩們的放言高論，她經常是止於專注聆聽。如今回想，我不知有多少次在Lucie面前班門弄斧卻未曾被點破，真是教人慚愧又心存感激！

許多年前，我來到世新教書，得以

遇見Lucie，從而增添我平凡生命中的幾分得意。雖未能真正跟從Lucie學習，但絲毫不遺憾，因為她所示範的，足夠我在未來人生細細體會和效法。

Lucie，謝謝您！

（作者現為世新大學新聞學系專任講師）

頑強且優雅的左派女頭目

——追憶恩師成露茜

孫瑞穗

一個永遠的反對派

印象中的成露茜老師，永遠都是一身清亮、態度從容、自信而優雅的社會正義使者。她總給人一種奇妙的安全感，一份難以言喻的自在，一種堅定的信仰。這種常人難得一見的明亮和自信，如同黑夜裡一盞永不止息的街燈，不知道曾經溫暖過多少莘莘學子的心房。

她的生命履歷極豐富，走過千山

萬水，打過無數正義之戰。桃李滿天下，卻異常地謙虛。出身極不平凡，卻毫無架子。跟我們年紀差了一大截，卻感覺像同輩同僚一般親切。她常開玩笑：「不蠻你說，我也是怪咖一個！」所以，我們私底下常直呼其名，叫她Lucie。

是的，Lucie的存在於她的同輩絕對是一種「異數」，也是堅持立場的「進步少數」。她在思想上總是堅持站在弱勢者那一邊，質疑主流社會的多數霸

權，批判著主流價值所隱含的偏差和歧視，也挑戰身分類範疇上常被忽視的暴力。如果要一句話來說明這位複雜的女性，我想，莫過於她在課堂上掛在嘴上的口頭禪：「我是一個永遠的『反對派』！」

在激情的革命年代中相遇

我們，是在一個充滿革命況味的激情年代裡相遇的。

九〇年初，解嚴後的台灣社會歷經了劇烈的社會變遷與民主改革，天天在街頭上都有人抗議。學生在校園中積極地自我組織，以爭取年輕人的自由發言權，寒暑假則組隊下鄉向社會學習，做社區服務。我們正是在街頭上受社會改造，從人民和土地裡吸取養分成長的那一代知青。可能也基於同樣的改革熱情，許多留美留歐的菁英寧願放棄綠卡和優渥的生活條件而回台任教。那時我在台大城鄉所唸書，有一天老夏與高采烈地跑過來跟我們一群女學生大聲嚷嚷：「好消息啊，有位加州左派大教授要來所裡開性別研究的課，嘿嘿，這下妳們賺到了。」

出現在眼前的這位「加州大教授」，竟是如此落落大方、優雅又俐落、唇紅齒白的女老師，跟我們刻板印象中叛逆又邋遢的左派男教授形象真的「差很大」。在那樣充滿權威的時代氛圍中，Lucie帶來「獨特又必要的美式自由空氣，彷彿久旱甘霖，呼吸起來特別有氧提神。當時的校園裡，研究所層級還沒什麼系統性的「性別課程」，

我卻記得成老師當年開了一個很特別的，名為「性別與發展」(gender and development)的討論課。內容很廣，包含了東亞、中南美洲及非洲等跟台灣一樣被叫做「第三世界」的閱讀教材，並嚴格要求我們這些台大菁英必須擺脫身段，苦讀關於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鄉村發展」經驗，期待我們能從思想上徹底自我改造。

有別於當年時下流行喃喃自語式的強調「自我風格」的女性主義語言，Lucie帶來了一種相當冷靜、強調分析的女性主義理論取徑，叫做「性別政治經濟學」，也有稱之為「馬克思主義式女性主義」或「分析式馬克思主義」。她希望我們能夠藉由理論工具，讓自己從群眾激情中稍稍抬起頭來看看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類似經驗。她說：「只有在與他國經驗的比較過程中，你才能真正瞭解何謂『台灣經驗』。」即便在那剛從白色恐怖歷史走出來的年代裡，她大膽地在課堂上公開要求我們重新認識日殖統治下的台灣現代化歷程，要求我們深入分析（而不只是稱頌）戰後以來的「台灣經濟奇蹟」，在這個過程中瞭解

女性勞動者在「經濟奇蹟」中的貢獻，重新評估她們的歷史地位。

在那還帶有「反共」禁忌的年代中，她便帶領我們閱讀中國文革的歷史，期待我們跨越意識型態壁壘，重新認識「當代中國」，認識中國工農革命對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曾有的深遠影響。回想起來，這樣的教育態度在當年是相當進步的，且遠遠領先那個年代，對於當年下半身還沉浸在認同運動激情中的我來說，無寧是開了關鍵性的知識啟蒙之眼。直到出了國門到美國求學後，我才真正瞭解她說的這番話，瞭解「比較視野」有多重要。只有在面對文化差異時，還能自信而完整地描述自我歷史的特殊性，我想，這個「台灣主體性」才算真正完成吧。

奇妙的是，她很少直接公開以「女性主義者」自稱，也鮮少直接參與時下的婦女運動。有一回我忍不住問她為什麼，她語重心長地說：「婦女議題(women's issues)不能直接等同於女性主義問題(feminist question)，而當代婦女運動，對『階級』的關懷太少了，卻可能因為過度忽視階級因素而產生了

嚴重的『階級限制』。』當年的我不見得對這樣的立場宣示服氣，但我們之間充滿張力的對話著實讓我學習甚多。她指導過相當多性別研究的博碩士論文，多是性別與階級並重的女性勞動處境和城鄉差距等議題，也是我當年碩士論文的指導老師之一。

身分認同的流離、跨國與跨界

認識Lucie的人都知道，她的「國家認同」很複雜，複雜到沒有人記得她的「籍貫」是什麼，打哪兒來。事實上是她在香港出生，童年歷經戰亂流離，青少年時期在香港、北平成，爾後隨著父親一家人移居台北。《立報》便是她的父親成舍我先生在台灣所創辦的自由主義立場報。有趣的是，她的哥哥卻較認同社會主義的共產黨，半夜跳窗回歸中國，日後擔任中國人大委員多年。而一位姊姊長年住在巴黎，曾出馬競選過法國總統。天下大概無人能用單一「家族」或「國族」舊範疇來說清這家人的政治立場，它不但在一個家庭中具體而

微地展現了台海地區的大時代故事，也濃縮了自由主義報人成舍我先生在紛亂時代中堅持自由精神帶領出來的多元家庭風貌。

Lucie自己後來留學夏威夷，曾隨第一任日裔夫婿住過芝加哥，離婚後到加州教學，又與社會學界也是重要左翼理論家有了第二次婚姻。由於歷經兩次異國婚姻，加上成長過程屢屢跨越國族界線，複雜的成長遷移經歷讓她在解嚴後的「台灣」那相當仰賴「認同」與「血統」象徵符號卻又未完成的（舊）國族政治擠壓中，一直處於邊緣和非主流派的位置。

至於受歐美馬克思主義思想影響的「國際左翼知青」與本土草根運動孕育出來的「本土左翼知青」，在這塊土地上為何從未深刻地發生過「理論上該有而必要的政治聯盟」，著實是一件值得後人深究的歷史問題。

左派女頭目：孕育左翼文人和基層社會運動者的保姆

Lucie的性格和立場最頑強的部分，就在這裡。即便一直都不是「主流派」，不能享有大量的制度性資源，她卻相當執著地在邊緣地帶默默進行她的社會實踐，用她的方式，為各種弱勢者發聲。她繼承父親遺志接了《立報》，運用廣遠的人脈網絡讓報紙編得豐富有趣。在那個言論審查的年代裡，只有她敢大膽舉用許多因言論或思想而受難的知識分子，有統派，也有獨派。日後更重用許多有社會運動經驗的知青，創辦以支持新世代言論及創作自由的《破報》，取其大破大立的顛覆思維，引領時代風騷。她也接手有意思的《傳記文學》等雜誌，關心有歷史深度的思想積累。

有趣的是，她做的媒體文化事業都有一種特質，那就是：永遠與執政當局唱反調。永遠都在支持一切形式的思想與言論自由，彷彿「運動教徒」般地實踐者。可能正因為自己生命經歷中曾深刻地體驗過國族分界對個人的暴力，她特別支持那些不被主流社會接受又執意為正義而戰的社會文化運動者，尤其是

那些在台灣長期以意識型態控制來扭曲歷史的情境中被各派擠壓的左翼文人。在學界相當具有特色和行動能量的「世新社發所」，就是一個很典型的Lucie's School。她孕育培養過無數社會基層運動者，像極了一種在野的「左派女頭目」。

高教改革典範的締造者：加州大學少數族裔改革運動領袖及其里程碑

我到了美國之後才深刻知道，Lucie在台灣의 實踐其實是某種美國實踐戰場的延伸。七〇末、八〇年代初她移居到加州教書，當時由反戰和反種族歧視精神所點燃的社會運動正火紅，有部分改革則延伸進入高教領域，Lucie那正義使者的性格理所當然地使她在風雲際會中被推舉為亞裔少數族群的政治代表。在她手下完成的改革方案和新制度，後來多成為學院裡少數族裔高教機會及性別平等權運動的重要里程碑。

Lucie是極叛逆的。很少人知道，

她在學界的第一本學術論述，就是研究北美地區中國籍移民妓女（性工作者）在北美的性別處境。在當年「政治正確」前提下，大部分自稱進步的少數族裔學者都在捍衛少數族群的「純潔」和「健康」形象，只有這位亞裔女性主義學者，「膽敢」寫出這樣驚世駭俗的主題，高分貝指出當年到北美大陸淘金的中國移工和人蛇集團，如何從中國南方非法運送台山地區的年輕女性到中國大陸從事性交易，以及如何被剝削的事實。Lucie作為女性主義學者，不但批判白人主流社會的父權，也批判少數族群自己內部的性別剝削現象。

不知道為什麼，好像知道世界上有這樣的女性長輩存在是很重要的，因為她的勇氣和批判能力本身，對我們就是極其關鍵的精神鼓舞。

大開眼界：國際左翼進步知識圈的重要串聯者

到加州大學讀博士班的時候，我才經由她的引介，認識了北美在地許多進

步左翼知識分子，也才知道原來這世界上曾有過一個跨洲際的進步知識社群，而Lucie正是這個知識地景中重要的「節點」。

這群進步知青網絡，其實正是戰後的一個歷史共震產物。他們多是二戰之後出生的所謂「嬰兒潮世代」，歷經戰後北美的國族復甦過程中所出現的各種改革和正義之戰。我們在台灣的社運年代中，所吸取的知識，多半就是二戰後西歐和北美思想界的歷史成就，是這一整代知青創造出來的「知識經典」。受過西方教育的東方人很多，但極少人能在東西方的文化和政治之間作正確翻譯，我想，Lucie不厭其煩地居間穿梭交流，確實扮演了相當關鍵的介面。

擁有藝術心靈的社會學家：北京田野驚豔

算是一種幸運，博士修業期間我常與Lucie一同做研究。有一回她申請了關於「電視歷史劇」研究案，邀請我一起參加橫跨台北、香港、上海和北京的

文化產業研究。由於田野太吸引了，我二話不說就點頭。有趣的是，在北京做田野時，我終於看到這位女強人溫柔、幽默又才華洋溢的另一面。原來常掛在她嘴上說的「變成社會學家是不小心的，當年出國留學其實是爲了學好音樂」，這件事情原來是真的。

在左翼文人圈中，好像很少人知道Lucie熱愛藝術，是國標舞高手，也彈一手好鋼琴。真的好，而且是專業等級的好，蕭邦、李斯特、貝多芬等的曲目彈得特好。那回恰好碰到了她那位好萊塢電影公司任職的老友、也拉一手漂亮小提琴的Woody到北京開會。只見Lucie現場隨口一聲吆喝，兩人竟就真的現場即興演奏起來了。嗯，是我都熟悉的舒伯特〈鱒魚〉二重奏，靈活靈現地。唉呀，揭去了科學面具，在眼前閃動的不就是一位活生生的藝術家嘛！

我猜，正就是這種發自靈魂底層的屬於藝術的激情，讓這位天天日理萬機又懷抱嚴肅政治理想的社會科學家，得以跳脫她原生家庭的階級限制，跳脫學科專業的框架，跳脫東西方之間國族、

時代與年齡的落差，永遠跟年輕人站在一起。

戀父、繼承，及超越父親

我忘了是誰說過，一個藝術家如果跟母親關係不好，她的創作過程必然充滿創傷與災難。而一個女人呢？如果她跟母親關係不好，自我追尋的過程勢必是一條崎嶇坎坷之路。那麼，一位社會科學家呢？我猜也是坎坷。只是這坎坷路上，勢必也能發現更多足以花一輩子時間去深究的生命課題。誰能料到，這位被稱爲「左派母親」的女人，一位有著豐功偉業的女性主義學者，其實一輩子也多在處理自我與母親的關係、苦樂參半地細細咀嚼著母親所帶來的一切影響。

Lucie顯然是戀父的，她的自我和事業有著太多父親的影子。然而，某種程度來說，她性格上的多元和豐富，理想的多角化經營，顯然又是遠遠超越父親的。或者這麼說，因爲遠遠超出了父親的有意無意規定的單一路徑，披荊斬棘，

踽踽獨行的途中不忘呼朋引伴，最終還是走出了屬於自己的，一條看似蜿蜒卻蓊鬱盎然的道路。

頑強而優雅的愛

Lucie有好多個家，算算至少有三個。一個在台北，一個在洛杉磯，一個在北京。

「妳覺得哪一個是真正的『家』呢？」

她翻了一下白眼說：「都是阿，我很少想這種問題。我早已習慣了遷移和流動，已經可以相當享受生命中同時擁有多重身分的感覺。」

我想，她是認真說的。由於生在一個充滿戰爭和流離的歲月裡，生了一個被民族主義意識型態多重切割的台海地區，這一整代人在面對自己的「認同」時，總有說不完的滄桑，也有滄桑後的豁達。

在這樣的時代和區域中成長，漸漸地，我們也學會了按照身分認同的界線來進行愛恨情仇。我們被社會和意識

型態動員，被教育，在「愛」自己那未能完成的共同體時，要先去「恨」那個共同體外面的敵人，那個異鄉人。但是Lucie不玩這套。她的愛很大，心胸很大，眼界很遼闊。因為瞭解被戰爭和極權壓迫而遠離故鄉的流離之苦，因而決定不重複這樣現成的劃界暴力。

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我常想，是怎樣的反思能力，怎樣的精神昇華，怎樣的知識解放，可以讓我們超越這些既成的界線，勇敢地像Lucie那樣張開雙手去擁抱「弱勢」與「他者」呢？是怎樣的大愛，讓我們有能力超越物質限制，避免一切現成的暴力呢？也許答案值得用一生的時間去發

問與追尋。然而，我何其有幸曾經親眼目睹過這道光，充滿實踐能量的光，在Lucie那謙卑又明亮、頑強且優雅的身影之中。

（作者是成露茜教授在台大城鄉所及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任教時所指導學生，現為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程教師）

成院長與我

——雨露均霑桃李樹，清流長傳舍我樓

黃勻祺

記憶中的成露茜教授，衆所皆知她身兼數職（《傳記文學》、《破報》、《立報》、《四方報》發行人及成舍我紀念館主任），然而對我而言她就是成院長，和她最多接觸的時候，是她接任學校新聞傳播院長的那段時光。當時（二〇〇一—二〇〇六年）對她的敬畏大過尊敬，畢竟她是我長官的長官，而

且她一走馬上任就表明要大改革，傳院的教職員工大多是戰戰兢兢。她所做第一件大事就是推動本系和跨系學程，儘管後來她卸任後學程瘦身了許多。第二件重要的事則是力推媒體識讀課程為校定必修課程，並定傳播技能、傳播理論與方法、傳播與文化等約莫十二學分的院定必修課程，在這些課下成立

teaching group，現在仍持續運作。再來就是舉辦IAMCR世界傳播年會。種種過去許多人不敢做的，特別是在傳院有八系，一百多位老師，若沒有魄力、能力和毅力，這些事應是很難完成。

過去院長對我很好奇，她總問我：為什麼許多秘書看到我都笑得很開心？她很想知道答案。

在傳院我算是與她接觸較頻繁的系秘書之一，良好關係也就逐漸建立。我的老闆齊隆壬主任當時為傳播技能課程召集人，關於此課程的行政運作我著力甚深，成院長對我印象很好。我雖有點怕她，但天生骨子裡直言不諱的毛病，偶爾會拿出來，這正好對了院長的胃口。院長特別喜歡人發表自己的想法，不要媚俗，不畏強權，若她認為你的作法可行，她會大方的稱讚與接受，當然她也會提出不同意見和你辯論，她的智慧、遠見與口才往往讓人折服。

二〇〇二年在一次偶然，郭良文老師去西班牙巴塞隆納參加LAMCR年會，帶著宛倫（前傳研所和新聞傳播學院秘書）去爭取申辦權，明珠（廣電系助理教授，我的室友）投稿也上了，我因為貪玩就和他們一起去，也雞婆幫忙參與活動，於是有機會和院長同遊三日。說真的那三天玩得有點壓力，但也看到院長可愛的一面，我們一同在著名的蘭布郎大街逛街，連著兩天在巷弄裡

中找日本料理店，院長一點也不覺得累，根本就不像一個六十幾歲的人，充滿著用不完的精力與赤子之心，美麗笑容仍歷歷在目，多國語言能力也讓我為之咋舌。

和院長近距離接觸，則是我在二〇〇五年一月決定離職，我發現院長在堅毅外表下有著十分溫柔的心，收到我的公文後，院長找我面談了許久，聆聽我分享在世新這些年工作的情形，她很捨不得我，但尊重我的決定，在我離職公文上簽署著希望我有機會可以再回母校工作，並給我一個溫暖的大擁抱。當年五月我匆促決定報考台南藝術大學，院長儘管口裡一直要我回來考學校傳研所博士班，但仍幫我寫了南藝的推薦函，可惜我名落孫山，一直覺得愧對院長的期望。在隔年我便考回世新，院長業已經卸任，而且身體微恙，錯過機會修院長的課，成為她的學生。

雖然這幾年常在校園看到她，多是匆匆一瞥寒暄問候，心靈深處總藏著

對她的虧欠，愧對她的厚愛，不料她的驟逝，這虧欠竟成為終身的遺憾，我這般的怯懦，相信院長知道定會給我當頭棒喝，鼓勵我與她互動。得知臨終前她還念茲在茲諸多研究工作，而我己身的小小虧欠更因之汗顏，院長用生命為我上了一堂終身實踐的課，直到末了仍戮力從公，立下無畏無私的榜樣。她的離世，代表著世新一個典範的消逝，她的精神配得翠谷人永遠傳頌。

一月二十八日夜裡，不才的我為她寫下一對輓聯，了表我心中無限的敬意：「雨露均霑桃李樹，清流長傳舍我樓。」隔日送到言論廣場的靈堂，心裡默默的跟院長說：院長！我會加油！重拾勇氣和信心，像那個曾經好為各系秘書發聲的人。謝謝您曾經溫暖的擁抱。

願您在天家得安息，也願上帝安慰所有為您哀慟的人。

（作者現為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兼任講師）

這兩幅畫，我怎麼能收錢？

王三慶

旋老師大概常在露茜面前提起我這壞蛋，露茜卻願意見我，旋老師很高興地告訴了我。可是我老毛病不改，每次見了露茜，仍是胡言亂語，玩笑真格糗作一團，她也欣然接受。久了，有人忠告她要當心，提防我這出了名的壞人，她好像也不以為意。

當時：她並不知道我與他父親的一段因緣，卻要向我「買」一張山水畫。前景往事，隨即湧上心頭，以此心情，我卻一畫就是兩張。她定要給錢：我就要將畫收回不給了！逼她收下！

民國五十年前我是個不折不扣的頑劣學生，曠課、打架、追女生，連英文二十六個字母都寫不全，在距聯考三個月時，校長叫我上台，當著全校師生寫大草的字母，一下子卡住了，差點沒將女同學們笑叉了氣。那年的數學：全省考生幾乎都吃鴨蛋，我卻拿了二十五

分，寫不全字母的我：英文卻拿了高分！全校畢業了十幾個班，其中的總第一名，與我這倒數第一名，都考上了世新編探科。第一次期中考，胡秋原的世界近代史，居然准許看書，題目是：「我上了世界近代史的感受」。我好像突然開了竅！考完又上課。胡老師將總第一，與我叫上台，將批好的考卷發給我倆。一看九十八分，再看名字，真是我的！老師叫總第一先唸，每唸一段便是一頓好罵，輪到我：贊得我七葷八素，一時間實在受不了。自此：歷史改寫，我也成了第一名！

不但如此，我們有了「思想自由史」：程滄波。「理則學」：黃海磯。「文藝概論」：王藍。「現代詩」：紀絃等等課程。如此美味當前，我不愛吃也難……。我這憤世仇深、自卑苦大的壞人，居然變成了幸福快樂的好人！

當然，還是改不了愛玩：爲了我請僑生樂團來校表演與我校男生打架，教官不處罰打架者，居然要開除我……

我陷入了比之前更黑暗的深淵！

校長居然召集會議（「陪審團」），除了教官，還有訓導長、教務長，以及老師們，校長說：「你不要怕，無論有關係何人，你都可以說！但要說實話！」

我還沒說幾句，那教官便瘋了似的罵我！校長勸阻多次之後，居然請教官離席休息一下！

校長於是將幾個關鍵、尖銳處問我，也請其他老師發言！居然幾乎是口徑一致的「聯保」我這「可造之才」！

最後校長請教官進來，只留下我與教官兩人，校長語重心長的說了番話：當他幾乎以請求的口氣爲我求情時，我平生第一次哭倒在地，向他跪了下來。

去……

結果：奇蹟一般，在那戒嚴時期、軍事管理之下，我居然逃過一劫！

想想：這兩幅畫，我怎麼能收錢？……

自此我與露茜，幾乎「無話不可對人言」！聽她與周恩來徹夜長談的故事、聽她學生的故事、聽她與黨外之士的對話、聽她對本省籍同胞的理解與同

情……

當然我也對她的始終「涉世難深」天真善良，有所擔心。但：像我這樣的壞坯子，一旦遇上了她們「成家父女」也會變成好人了！想想也不必太過擔心了！

我在台灣的「藝途」，幾乎被封殺了。她倒是為我老是擔心，也四處為我說情，都說到北京去了呢！……

每次見面幾乎都是她與旋老師請

我這窮酸小子吃飯，沒想到今年在台大餐廳，她為我引見她姐姐與朋友們牟了「最後的晚餐」！

現想來，我從來沒聽她說過憂愁、悲苦之事，我真後悔沒能與她分擔，至少，抱抱她、輕拍拍她也好啊！……

王三慶於東山深夜。

（作者為書畫家）

對Lucie作為女報人的記憶和感動

陳慧敏

聽到成露茜社長（Lucie）過世的消息，第一個反應就是：有人惡作劇嗎？直到上網讀《立報》社論和新聞，才確認這是真實的新聞事件。因為在腦海裡面的Lucie，總是精神奕奕地，骨癌早就康復痊癒，沒有一點病容。這樣生猛活力十足的人，怎麼就那麼突然地過世了？

讀了讀紀念Lucie的文章，總平板

地描述——她永遠挑戰自我，辦《破報》、《立報》和《四方報》，接手《傳記文學》，辦社會發展研究所。堆疊起來的資歷洋洋灑灑，總覺得少了一點氣味，少了Lucie的樣貌，好生遺憾。

要我寫Lucie的模樣，我跟她的接觸不多，恐怕不深入。我「知道」Lucie超過十年，淵源是Lucie剛創辦社會發展所不久，我正在政大新聞所唸研究所，

時常到社發所旁聽上課，反倒像半個社發所學生，甚至上過Lucie的社會發展理論。奇妙的是，我當時擔任研究助理，翁秀琪老師正在做成露茜、殷允芃等女報人的生命史訪談，也讓我間接透過書面資料去「知道」Lucie。

這些淵源都不足夠支撐我寫下對Lucie的全面觀察，然而，以她親炙學生的緣分，以身為記者成職志的我，卻很

想寫下我對Lucie的幾幕記憶，還有她給我的深深感動。認識Lucie十多年，真的是直到二〇〇七年那一年，Lucie骨癌治療後回報社，我打從心底對Lucie作為女報人的性格，真正正的尊敬和感動。

那一天，是我跟著Toronto和靜如等社發所畢業的學生，約好要探望骨癌病後的Lucie，還私下告知其他同學們「趕快來看社長」。事先跟她的秘書約了，知道Lucie從醫院出來，在家裡休養一段時間，一直待不住，提早回到報社和學校上班，於是，我們探望這位骨癌化療後的病人，不是在醫院或家中，而是約在學校的辦公室。

Lucie走進來小會議室，巍巍顫顫，走路不太穩，隨時都怕跌倒，但她戴著帽子，穿得光鮮亮麗，沒有倦容。帽子是因為她做了化療，頭髮少了才戴上，她貼身有位看護，怕她隨時都可能跌倒再骨折，所以看護像她的保母，看顧她；熱愛工作的Lucie一忙起來，就忘了休息，所以，看護更像親人，隨時提醒她要吃藥，甚至要催她歇一歇，拉她回家去，也在她走路時候，盡量伴著她，

讓她不受傷。

她緩慢移動，坐進位置，沒有等我們開口，她自己報告「病情」，她說：「你們也知道我的那個情況，就是之前骨折住進醫院，才給發現的，後來就做了治療，現在情況還不錯。」兩三句話就跳過了這個生死關卡的大問題，壓根就沒提過癌症兩個字。

她不談自己的病情，我們也不好圍繞著病情談話，她隨後就開始轉向我們身上，她問問我們，現在都忙些什麼、做些什麼、想些什麼，耐心而專注地傾聽，滿心歡喜的模樣。當時恰逢樂生抗爭等幾個社會運動的事件，她完全知道狀況，我們驚訝地反問：「所長怎麼都知道？」她說，因為自己都有跟隨著進度，除了看新聞，也會上網看論戰和討論。她甚至還從理論思考的層次，問我們，幾個社運的事件是不是有辦法用大論述統合起來，串聯起來？這不是一個可能性？

仔細回想，Lucie提問的這個大問題，也不是第一次問我們。早在她社會發展理論的課堂上，早在我學生時期參

與「苦勞網」的期間，Lucie都不忘在聊天的時候，問問這個問題：這麼多的社運事件，是不是會有大論述的可能性？我想，這是她對台灣社運的關懷和思考點之一。

然後，讓我驚訝的是，我們的話題一轉，她問：「你們對發行網路版的想法是什麼？紙本還有用處嗎？怎麼看待網路媒體？」她說，她正在思索《立報》和《破報》不發紙本，改用網路發行的想法，畢竟，《立報》、《破報》的經費有限制。

她跟我們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沒有一點病容，好像眼前的她，從來都沒有得癌症，她滿腦子思索《立報》和《破報》的發展方向，儘管她連走起路都那麼脆弱不堪，她的精神卻充滿力氣，沒有行將就木的驚慌和焦躁，沒有趕著要將自己一生榮耀論定的虛榮。她的樣子，從容不迫的，只往前看，那麼篤定而自信。

那天，她唯一的「往後看」，就是起身帶我們去看她主導規劃、甫完成的舍我紀念館，看爸爸的歷史。她帶我們

走了一圈，一一講解館內珍藏的歷史文件。印象最深的，是Lucie指著幾張圈滿紅字的報紙，說到成舍我辦報，自己必定是第一個讀者，每天仔細讀報，然後再用小條子寫下自己的意見給記者或總編，當時童年的Lucie就陪著爸爸看報，爸爸定了一個遊戲，就是找到錯字用紅筆圈起來，可以發一分錢獎金，Lucie常爲了拿獎金，就看報找錯字。

Lucie站著陪我們看完整段成舍我生平的介紹影片，影片的時間可能有十幾、二十幾分鐘，我不斷擔心Lucie是不是可以久站，但她充滿興致。影片拍攝成舍我先生在大陸開辦二十多個報紙和媒體的歷程，以及台灣後，擔任立委直言不諱，開創新聞教育——世新的格局，甚至，成舍我先生直到台灣在一九八八年報紙解禁，以九十歲高齡重新開辦《立報》，更還自己出去跑新聞。影片中的受訪對象說，他可能是全世界最高齡的辦報人和最高齡的記者，直到九十四歲高齡辭世，從事新聞工作

共八十多年，更可說是資歷最長的新聞工作者。

看著成舍我的一生，才感覺到Lucie接下報業的感情之深，肩負責任之重，傳承意味之濃。也隱然體會到，Lucie對生命和工作的堅強和韌性，也來自成舍我先生。

作爲記者，作爲她的學生，就在那一天，我深深感覺到她作爲女報人的堅持，也體會到所謂的實踐，就是她在跟身體健康拔河之際，仍有那麼強的意志力，不太在乎自己的病痛，而更擔憂報社的預算經費，思索報社的發展和未來。這樣堅強的韌性和意志力，是Lucie最爲人感動和佩服之處。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Torrent要申請學校出國，求教Lucie，也請她寫推薦信。她在辦公室裡，微笑地回答申請美國社會所的種種詢問，她桌上堆著一疊學生論文，正打算要批閱，回答問題當中，她輕巧地起身，從書架上找資料。聊天過程，她說那段時間前後，已去了

幾趟香港和大陸，主要是跟哥哥成思危碰面，也到大陸去看看，還笑著說，因爲成思危的維安等級過高，隨身有一大堆公安，出門浩浩蕩蕩，實在不方便，後來還是改約在香港碰面，沒有公安隊伍，比較方便。這時候的Lucie，走路輕巧靈敏，完全沒有前一年化療模樣。退出辦公室，我們小聲交換意見：Lucie從骨癌康復了，這麼神奇，整個人精神奕奕地。我完全相信，這是Lucie的意志力完全戰勝了病魔。

Lucie辭世短短幾個小時，維基百科已旋即加入此消息，好像就開始讓Lucie走入「歷史」，成爲歷史人物。Lucie作爲《立報》、《破報》和《四方報》的社長，自然有傳播學者用嚴謹的研究，爲她定位。但是，在我的心裡面，Lucie作爲女報人的格局和氣度，就展現在那一天的探望，她不自覺地流露出的堅強和從容，以及帶我們進入成舍我辦報歷史的深情凝視，以及孜孜不倦於工作的每個當下。

有立有破

社長的眼淚

廖雲章

二月二十七日，盛大美麗且獨具風格的追思會上，眾人訴說著對她無盡的懷念與鮮為人知的英勇事蹟，我望著台上那張現代感十足的「Luice in the sky」畫像，想到的卻是當年離開她時，她流下的眼淚。

剛進社發所那一年，發生九二一地震，地震沒多久，就有人來挖角。那是我喜歡的新聞路線、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和資源，我很心動，也很猶豫。大學還沒畢業就進了報社，九七年底的報社轉型整併中，我是唯一被回聘的記者，後來，社長甚至讓我一邊工作一邊上課，而我居然想離開她？

猶豫了幾天，某個下班陪她散步回家的深夜，我坦白地告訴她我的掙扎。報社人事流動頻繁，來來去去看似稀鬆平常，可是每次有人離開，我總是感覺很難受，有種說不上來的浮躁與無力。我老實地說出了自己的無力感，月光下，她晶亮的眼神黯淡下來。沉默了

一會兒，她說：「身為你的主管，我非常不願意妳走；但是作為妳的老師，我樂見妳有機會到外面見識，有更好的發展……」聽到這話時，我感動幾乎掉下眼淚，她的眼睛閃著淚光，我低著頭，她拍拍我的肩膀，「想想吧，決定了再告訴我。」

周遭的人，包括社發所的老師都支持我跳槽增廣見聞，但那個願意提供高薪的媒體無法提供勞健保，社長輾轉知道了，居然讓我的勞健保繼續掛在立報。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老闆也很不一樣，沒有一個媒體老闆會甘心情願讓員工一邊念書一邊工作，除了社長。為了新工作，我一個學期上不到十堂課，指導老師益仁勸我：「再好的工作再找就有，回來把書念完吧！」偶爾在所上遇到社長，她也總是關心我的新工作和上課能否兼顧。

我終於決定辭職，回社發所專心念書。信行揶揄我：「妳居然爲了我這麼

爛的課，辭掉了那麼好的工作？」沒多久，社長找我吃飯，找我「回鍋」《立報》，從記者轉型學編輯。而後，我在報社內不同單位流轉，編輯、編譯、專題記者、編輯中心主任。每一次的輪調多半是因為救火，有人走了，臨時補不上，就去幫忙，做著做著就上手，感覺永遠都處在一種充滿挑戰與前進的狀態，充滿旺盛活力。

社發所畢業之後，某個下班的深夜，她告訴我，她打算改變我的職務為「執行副總編」。我遲疑了，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承擔得起，我說：「可是我才二十八歲……」「妳爲什麼覺得年紀是個問題？」她微笑看著我：「妳有沒有意願？」我是個膽小的人，個性害羞又容易臉紅。可是，我一次次在她的鼓勵下，硬著頭皮，去做自己一點信心都沒有的事：考社發所、採訪組長、編輯主任、副總編輯。我不知道她爲什麼這麼信任我，破格錄用一個其實不太有自

信又總是對自己的年輕很介意的膽小女生。

從社發所畢業之後，我有一點了解她的用意了。進入社發所前，我不太清楚自己想要什麼，離開社發所，我卻有種「無敵感」：我什麼事都可以做，什麼都不介意，我認識了自己的底線，也願意追求未知的極限。

那時，社長剛發現癌症，報社氣氛低迷，許多蜚短流長的傳言。她把我去，不談病情，只說了更多她想做的事情，更快速地將人事規劃到位。那是我第二回看到她的眼淚，要我承諾她的交託，給了更多的責任和任務，她說：「我把妳看成革命夥伴，我們可以一起幹些事兒。」那是個有月亮的夜晚，送她上樓後，我獨自走回早安綠莊住處，想了一整晚，輾轉難眠。

除了報社，社長還有一長串工作清單：她接任傳播學院，推動傳播技能學程，張正、益民及我負責設計新聞系教材並參與教學；她是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董事，參與「希望閱讀」計畫，我奉派代表她參與選書會議；她是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的理監事，我代表她出席會議。

她不斷給我新的任務與機會，有時候覺得自己像「超級馬利」，面對未知的挑戰，每次破關都像是褪皮，把我的生澀和膽小一層一層抹去，練出不怕生的臉皮和膽識，在多元嘗試中拓展視野，發掘並認識自己「真心想做的事」。偶爾，遇到一些非做不可的難題時，她從不讓我輕易放棄，她會說：「那就勉為其難吧！」

二〇〇七年，我「勉為其難」接下了一個她交付的年鑑主編工作，在每週要出五天報、教三堂課的情況下，這項「外件」的負擔很沉重，更沉重的是得知截稿期居然要提前一個月，那時只剩不到一個月時間完成編印工作。那一年，她剛剛動過手術，因為休養，很少進報社，常打電話交代事情。為了擔心無法如期出版，她多次跟我確認「來得及嗎？」即使心裡焦急協調編輯進度，但是面對她，我永遠肯定地說：「來得及」。那本年鑑終於提前出版，發表會的那天，她在社務會議上誇獎我：「妳真是太厲害了！」那對我的意義是：「妳又過了一關！」

十幾年來，我們就這樣，一關過一關，難關很多，也都過了。然而生死

這一關，她卻沒能順利挺過。社長過世後，我們接下了一連串的思考會相關工作，天天面對她的照片、口述歷史、文字、影片檔，日思夜想，大家都輪流夢到了社長。

二〇〇八年秋天，我即將結束在胡志明市的短期進修，社長想到越南走走，問我可否安排。後來，她臨時有事無法離開，等我回國，她幾次問我：「什麼時候再去越南啊？」

追思會前一天，我夢到她在旅館大廳等我，那是胡志明市一座法式殖民風格飯店，我匆忙拿著她的追思手冊的大樣、西貢旅遊行程給她審閱，她翻了幾頁，點點頭，說：「妳幫我看看吧！」然後，拿著旅遊行程，迫不及待地推開旋轉門，走了……外頭陽光燦爛，我只見到她的背影，走入亮晃晃的光中，走了。

夢中的形象歷歷在目，社長走了，繼續她未完成的環遊世界旅行，這一回，她不必趕進度，沒有一百件事情等著她決定處理，她終於可以真正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作者現為《台灣立報》副總編輯、世新大學新聞系兼任講師）

當妳成為傳說

張約翰

一月二十八日凌晨兩點多，在臉書上看到報社電腦中心同仁留言，他還待在辦公室。於是給了個回應：「如果社長回來，記得拍張照留作紀念啊！」

一月二十七日，台灣立報社長成露茜博士病逝。社長是世新大學老校長成舍我的女兒。世新的同學代代相傳許多老校長顯靈的故事，比方半夜現身叫同學們不要浪費電、在圖書館提醒用功的同學記得休息等等。老校長辛苦興學、愛惜人才的過往，就透過這些校園傳說，在嚴肅的史料之外流傳下來，就連他過世後才出生的大學生都知道。

向來以父親為偶像的社長，當然知道這些故事，她也以自己的方式，繼承並體現了老校長的作風——《立報》成為社運與媒體的人才庫。長期投身原住民運動的作家利格拉樂·阿烏；台灣文化、社運圈知名的《破報》總編輯黃孫權；為外配、新移民發聲，在台越南人幾乎無人不識的《四方報》總編輯張正與發言人廖雲章；連馬英九都要藉捐錢給它以表達自己關懷弱勢的《苦勞網》創辦人孫窮理；明明是漢人卻投身部落

培力的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理事長金惠雯。這些人曾是、或現在仍是《立報》的同事。

與他們相比，我實在很想問社長：為什麼妳會錄用我？

我在《立報》已經快十年了。二〇〇〇年，當時我在戰略高手總公司工作，代表老闆出席《破報》主辦的一場關於網路世代的座談會。與會者發言一輪後由現場聽眾提問，滿場的年輕人靜悄悄，只有一位年約半百（後來知道應該是六十歲）的女士起立發問，那就是社長。她並沒有坐在什麼貴賓席，就那樣混在人群中。那是我與社長的第一次見面。

過沒多久，高中同學張正因為身兼《立報》專題中心主任與發行經理，忙不過來，找我去《立報》接專題中心。我高中、大學都念了五年而且沒畢業，大學是大傳系的沒錯，主修卻是廣電，工作資歷只有一年半電視攝影師，雜誌編採、網路企劃各半年，為什麼可以到報社當主管呢？社長到底在想什麼？

如今回顧，愈發不能理解。進了

《立報》，同仁來來去去的見得多了，編輯部決定錄用記者、編譯、版主後，社長都會面談。我進《立報》時，卻只是由張正陪同，進社長室打聲招呼，就直接參加編前會了。現在以副總編輯的立場來看，覺得這種用人的器量實在不可思議，百思不解，也沒有機會得到答案了。

現在世新大學的傳播大樓，當年是成舍我建來給《立報》用的，頂樓有「台灣立報」幾個大字。我進立報的時候，三、五、六樓都已被學校收回，立報在四樓，編前會在資料室的小會議室舉行。社長每天親自主持，最常問的問題是：我們為什麼要作這則新聞？如果報稿單報出一則只想填版面的新聞，常會被問到啞口無言。

所以，很多主流報紙熱中的報導，立報不會湊熱鬧；就算《立報》跟進，也採取截然不同的角度切入，例如從階級、性別、族群去看問題，而不是隨著主流報紙起舞。《立報》編輯部的同仁們也不在乎傳統的新聞作法，不相信雙方說法並陳就叫做平衡報導，而是儘

可能給弱勢的一方最大的發言空間。社長有時會因此對外說：「《立報》就是要平衡主流媒體的報導。」

然而，這樣的另類媒體，實在太寂寞了。偶有同仁受不了這種寂寞。有記者因為《立報》的發行量與知名度比不上主流媒體，在新聞現場吃虧後決定離職，卻又無法接受主流媒體的作法，回歸《立報》。也有記者因為為弱勢發聲的立場鮮明，想進政府部門採訪會議被擋在門外，還被電視媒體拍下來以「自稱記者的女性」羞辱，成為電視新聞並貼上部落格。

《立報》的待遇也很低，只有主流報紙的三分之二左右，職務愈高，與外界差距愈大。因此，常常在《立報》稍有表現的記者，馬上就被挖角，很少超過兩年。社長對這點有心無力，只能認為《立報》是在散播種子，藉此讓主流報紙產生改變。

但是，我時常慶幸自己服務的媒體沒有任何一條新聞成為壓迫者的幫兇，可以理直氣壯的向任何人說我在報社工作。因此，我不會覺得十年沒有年終獎金很委屈，那是應有的代價，也是對社長能任用我這種人擔任主管的回報。

社長去世一個月以來，不少門生故舊撰文緬懷。提到《立報》，都認同是一份有價值的報紙。

問題是，《立報》的價值是對誰有價值？如果今天沒有成露茜，這個價值還存不存在？社長曾說，另類媒體的價值不在於自己的存活，而在於任務是否完成；當任務完成，就是退場的時候。我們的任務是什麼？完成了嗎？

《立報》為弱勢發聲，而且採取的角度迥異主流媒體，觀點比主流報紙前進得多。台灣第一個原住民專版（現稱族群版）、第一個性別版（不是婦女版、家庭版），都出現在《台灣立報》。三鶯尾牙，滿滿一面牆貼滿《立報》的報導；同志運動，只有《立報》敢於發聲，而不只是獵奇式刊刊變裝照；保衛樂生，只有《立報》始終如一。比較活躍的社運團體、關心社運的青年朋友，大概都知道《立報》，也知道《立報》的立場。

《立報》十幾年來不間斷的關注各種社會運動，但台灣的社運能量仍然在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主導的主流媒體壓制之下，始終缺乏正面的能見度。《立報》能與資本家、政治侍從的主流報紙

拚搏至今，世新的支援當然是主要原因，而能夠得到世新的支援，就是靠社長爭取而來。

為了讓這樣一份報紙生存，社長每年向世新爭取經費。維持一份日報的錢，對大學來講不是小錢，世新校內因此常有反對聲音，《立報》爭取到的補助金額也愈來愈少，人員愈來愈不足，工作愈來愈重。

每年春天編預算時，一想到社長在校內預算會議可能面對的閒言閒語，我身為《立報》編輯部主管，卻沒能為報社帶來什麼收入，只好繼續假裝沒看到預算表上少得可憐的編制，以及各版主編們偏低的薪資。而社長也年復一年為這份不以賺錢為目的的報紙向學校伸手。

連主流報紙都面臨嚴峻的生存考驗，社長當然知道《立報》這樣一份另類媒體不可能賺錢，所以她要求起碼《立報》要能發揮影響力，才能讓她面對校內質疑時不至於無言以對。

台灣立報社在二〇〇七年卓越新聞獎第二屆社會公器獎評選時，曾進入複選；二〇〇九年第三屆社會公器獎，更一路進到決選，在與平常合作的伙伴台

灣環境資訊協會的較量中，沒能獲勝。就差這一步。本來想在第四屆時更加把勁，讓社長能以女報人的身分上台領獎風光一下，現在是不可能了。

社長非常在意她身為台灣立報社發行人這個身分，儘可能在任何場合爭取《立報》的露出機會。二〇〇九年第一屆星雲真善美新聞貢獻獎，老校長得到新聞典範人物獎，社長與姐姐成嘉玲董事長共同出席，主持人在介紹身分時沒提社長的《台灣立報》頭銜，社長還在台上發言更正；主辦單位為老校長拍的紀錄片以《小世界》畫面收尾，社長也不滿的說，《立報》是老校長辦的最後一份報紙，怎麼重點卻全放在《小世界》？

我大概是最常被社長修理的編輯部主管。雖然曾聽說我進《立報》前她有拍桌的紀錄，但十年來我沒看過她發脾氣罵人。她不滿的時候，最多是用「很差」、「不要再扯了」、「我很失望」等字眼，當然這些我統統挨過。「很差」用在她對我選用的一張半身裸畫，「不要再扯了」用在編輯部上班時間看世界盃決賽，「我很失望」則是她想推動記者自己indesign、自寫自編而我消

極反對。

《立報》編輯部主管與社長開會的次數太多了。除了例行的編前會、月會，偶爾社長還會找主管們腦力激盪。這種會議都會開很久，所以常伴隨著食物。

第一次參加這種會議時是在社長家，社長知道張正嗜酒，從冰箱裡拿罐啤酒出來，仔細一看，冰箱裡幾罐啤酒全都過期了，也沒丟掉。當場張正提起社長有名的佚事「水餃事件」：社長曾在家與《小世界》週報前社長康健老師吃水餃，一邊吃，一邊才向康老師提起這個水餃已經在冷凍庫一年了。社長辦公室裡一瓶義大利Chianti產區的紅酒，也是一放四、五年，直到她去世，代理社長魏瀚顧問才叫我拿走。

最後一次與社長吃飯，是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在世新旁邊萬善橋頭的世新川菜館吃中餐。砂鍋魚頭、豆干炒肉絲、東坡肉、炒青菜。同席只有張正、雲章，邊吃邊聊《立報》新聞在各大入口網站露出後的效應如何評估並利用。由於一般人的中餐對我來講是早餐，我吃得不多，魚頭剩下一大鍋，社長惦記著看護阿英喜歡吃魚，打包帶回去。

那天離開餐廳去社長家續攤的路上，社長爲了她《批判的媒體識讀》第二版放了我的文章，作者介紹頁卻把我漏掉一事向我道歉。坦白說，我覺得自己寫的那一章很不怎麼樣，只怕拉低全書水準，該道歉的是我，沒放作者介紹正好遮醜，何況我既沒博士學位，在學術圈又沒沒名，跟一堆專家博士並列豈不突兀？

社長是我的老闆，給我工作機會，給我維生的薪水，給我唸碩士的時間，我爲她的書回報一篇文章實在是太微不足道。

知道我以漫畫爲研究主題，二〇〇六年社長從美國回來，送了一本好幾公斤重的 *Masters of American Comics* 給我，還告訴我是一路親手提回來的。之後不久，她的癌症復發，由手臂疼痛開始。我一直懷疑會不會是因爲那本書太重的緣故。

二〇〇七年五月，我在世新學生學術論文發表會有論文發表，校園裡遇到剛從一連串手術與半年休養後復出的社長。她那時行動不便，有時要坐輪椅。當天她拄著拐杖問我去哪，簡單幾句話後我就離開了。那一場我是最後一個發

表，居然看到社長就這麼顛巍巍的走進會場來，聽我發表那篇很不怎麼樣的論文。

每年二月社長生日，都會有人送非常好吃的起司蛋糕給社長，社長都是給同仁們分享。今年，蛋糕一樣送來了，

壽星卻已經真的成了天上星斗。

二月二十七日追思會，來了一千人。場面很溫暖，沒有令人不自在的號泣，只有壓抑哀傷歡喜送行的氣氛。不知道社長有沒有看到這一幕。

就像她崇拜的父親成舍我一樣，社

長已經成為傳說的一部分。就讓她的傳說在世間延續以為紀念，避免她留下的報紙一起成為紀念中的傳說。

（作者現為《台灣立報》副總編輯）

大俠成露茜

——有學有術有膽識，亦儒亦俠亦慧黠

張 正

第一次聽到社長的聲音，是在二十五歲半夢半醒等待工作的一個秋日午後。

掛了電話，只記得有一位《台灣立報》的「ㄟ」小姐打電話來，約我隔天面試。

依約在下午到了《立報》。下午的編輯部，空空蕩蕩，燈火未明。總算找到個人，說我是來面試的。

「跟誰面試？」

「ㄟ小姐。」

「ㄟ小姐？」

這人叫我等等，回頭進了個房間。

一會兒要我進去。

原來「ㄟ小姐」，就是「成社

長」。在那之前，我壓根沒聽過成露茜的大名。

面試講了些什麼早已不記得。我沒有新聞科系的背景，說自己想以文字謀生，好像承諾會待個兩年。

也許是那天社長心情好，也許我們真的很投緣，聊得很愉快，我被錄取了。後來總是聽說大家都怕社長，我始終沒能理解。而她為什麼以社長之尊通知我去應徵一名小記者？這十五年來我竟然都忘了問，以後也問不到了。

這是個難得有陽光的冬日，我和雲章去醫院看社長。

前一天，管中祥打電話來問我社長的病情。我一問三不知。

這幾年，社長總是在醫院進進出出，這陣子尤其頻繁。但我總以為她比布魯斯威力還有威力，超級die hard。即使生病期間，她只要進報社，仍是精神奕奕，裝扮時髦，社務會議前處理掉一批公文，開完會之後，還去《傳記文學》、《破報》巡視一圈。

管中祥說社長已經簽了放棄急救書，但又好像沒事，所以打電話來問我。我心裡不安，撥電話給社長的貼身看護阿英，阿英沒接電話，我回頭一忙，就忘了。

隔天中午想起，撥通了阿英的手機。阿英的說法反反覆覆。一會兒說能撐過這兩三天就好，一會兒又說狀況不

樂觀，總之已經在加護病房，但是探視時間有限制，叫我不需要來。

掛了電話，抽了一根菸，想想，還是去一趟醫院的好。社長連續幾個禮拜都沒來開會，也沒聯絡，去醫院就算講不上話，看看也好。

和雲章叫了計程車，請司機開快一點，想趕在探視時間之前到。在迷宮般的台大醫院裡轉來轉去總算找到加護病房，社長的姊姊成嘉玲、好友殷允芃、學生黃順星以及一些世新的老師們已經在門口。說是不要進去的好，免得感染病人。

大家在門口小聲的交換資訊。我想進去看看社長，似乎又不妥。正在躊躇，加護病房的門打開，阿英探出頭來，神情落寞，請社長的姊姊成嘉玲進去。還有人也想進去，問行不行，問還有沒有防護衣可以穿。我好像看見阿英輕輕嘆了一聲，說沒關係，都進去吧，社長已經過去了。

衆人圍在社長的床邊，啜泣。醫生像在演影集似的宣佈死亡時間，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七日下午兩點二十四分。

回到報社，李姐說我很有福，能

見到社長最後一面。我的確有點小小的得意，幸好當時決定搭車趕去，如果沒去，會有更大的遺憾。但又怎麼知道，這一去，竟是永別。怎麼能相信，我以為是最強的社長，終究還是不敵天年。

「大俠成露茜：有學有術有膽識，亦儒亦俠亦詼諧」這個標題，是社長過世當晚，我躺在床上半個鐘頭睡不著覺，覺得最可以總結我所瞭解的社長的一句話。

社長喜歡武俠片，替弱勢發聲，愛打抱不平，這正是「俠」。本來還在想應該用「俠女」還是「女俠」，不過幸好沒忘記，反對刻板性別的社長，應該也會反對在「俠」的前面或後面硬要加個女字。俠就俠，有什麼女男之別？

有學。社長雖然有忙不完的事，但卻也似乎看過所有的書，總是可以旁徵博引，這在我大膽找她指導我的碩士論文時，領教過了。

有學加上有術，是她創辦的世新社發所的Slogan，也是她的自我要求。辦報、教學、研究，都是例子。

有膽識。一個例子，是她六十幾歲時，竟然去做近視雷射手術。另一個例

子，她有種去美國大峽谷的空中玻璃走道。而她在《立報》財務如此困窘的情況下，仍想要再辦一份《四方報》，也算有膽子吧！

「亦儒亦俠」講過了。所謂「亦詼諧」，我最記得的，是她總愛「炫耀」，三不五時會遇到有眼不識泰山的莽撞男子，以為她比實際年齡小個一二十歲，然後發動追求。

「大俠成露茜：有學有術有膽識，亦儒亦俠亦詼諧」這句子，後來用作「再見，Lucie」追思會的主題，不過社長姊姊成嘉玲和好友殷允芃，把「詼諧」兩字改成「慧黠」。挺好。社長總能打破僵局，總有獨到見解，總愛一鳴驚人，的確是慧黠、的確聰明靈敏。

社長過世後，常常夢到她。最清楚的夢，是追思會前兩天，我在夢裡冷靜地「回到」她去世的那一天，一月二十七日，心裡想著，如果我可以改變當天的某件事、某個小關鍵，也許就能阻止「社長過世」這件事情的發生。

夢裡的一月二十七日，社長神采奕奕地領著一群國外來的學者參觀世新校園，完全不知道自己等會兒就要死去。

我亦步亦趨地跟著社長。社長沒跟我說什麼，倒是她姊姊成嘉玲問我怎麼老是跟在後面。

校園繞了一大圈（這明明是我的國中校園），社長真的無預警地倒下。我扶住她，看了看時間，就是她過世的下午兩點二十四分。我眼睜睜地看著她死去。我什麼也改變不了，什麼都不能挽回。

得自天下雜誌發行人、社長好友殷允芃的靈感，《四方報》巴比的幫忙，社長過世隔天，「成露茜紀念網站」（<http://www.luciememory.org/>）很快就架設起來。來自各方的文章、照片，以及社長生前的文章、照片、影音，有

了暫時的集中地。

一頭忙著即使社長過去了也不能停下來，《四方報》，一頭栽進社長身後種種的籌辦活動。閱讀每一篇追悼、緬懷或是社長自己的文章與影片，分類、挑選上千張社長七十一年來的照片，和世新、《立報》的同仁頻繁地溝通、開會、腦力激盪。跨過農曆年的一個月來，非常充實。

靠著很多很多人的努力，追思會準時在二月二十七日舉辦。瑕不掩瑜，盛大而有風格。天公也幫忙，風和日麗。

好久沒這樣哭了。兒時奶奶出殯時在靈車上哭，年輕時和女友分分合合哭，也沒像現在快四十歲，還因為社長

的過世一哭再哭。

社長是老闆、是老師，也承蒙她不棄，把我和雲章像朋友一樣對待。

社長走了，沒辦法。心裡空空的，今後沒人可問、沒人可抱怨，得自立自強了。

但社長也沒走。她留下的不只是《傳記文學》、《立報》、《破報》、《四方報》，她七十一年來的種種想法、作法，肯定改造了許多人，創造了好多好多「分身」。我希望我能是其中之一。

（作者現為《四方報》總編輯）

紀念一位最奇特的老闆·Lucie

呂淑姮

多年前剛從學校畢業，因緣際會下來到《立報》，當時懵懵懂懂地，不太清楚究竟自己未來可以做什麼。

記得面試我的主管說了一句很奇妙的話：「要想清楚啊，這工作可是個火坑。」我似懂非懂，只覺得自己喜歡想

些有的沒的、喜歡寫東寫西，記者的工作可以問問題，感覺很有趣。其實，很多事情也是從有興趣開始的。

自己去想要做什麼

到了《立報》第一天，沒人告訴我要幹嘛。我待在位子上東摸摸、西摸摸，看看辦公室的環境，然後逛去資料室……這時候才真的開始想：我到底可以去做什麼？沒有人告訴我，這代表我該自己去想。

在小學生時期，我很喜歡問老師問題，有點像《哈利波特》裡的妙麗，會舉手發問和回答。離開國小之後，大家都知道碰到升學壓力會發生什麼事情，教室裡會出現這種詭異的景象：老師不停地問，還有沒有人有問題？當真的有人有問題但老師回答不出的時候，師長們就會開始用「這個世界很競爭」那套理論來糊弄你。

但是，在《立報》幾年，我卻覺得，《立報》比任何一個我待過的學校，都更有一個真正學校的樣子，讓人在問與答中不停地思考，督促自己、不能迴避許多該去深思的問題，即使那些問題不見得有答案，或者我們要的從來就不是答案。

深夜的會議

到了《立報》沒多久，大約是二〇〇〇年的時候吧，碰到一次深夜的會議。沒記錯的話，那次似乎從晚上十點多開始，一直開到將近凌晨一點。這在當時算是很常見的事。

社長把當時還在辦公室的編輯和記者、主管們都一起拉進會議室，午夜十一、十二點了，她仍舊精神抖擻，然後拋出一個又一個我覺得再過十年都沒辦法回答的問題。

「做為教育專業報，《立報》還可以做什麼？」「未來的《立報》，應該怎麼呈現？」社長滿面笑容地，大眼睛很有神，環顧在場的同事們，她臉上的笑容總是上揚著，感覺上是一種努力，但不虛偽。

那時的我，只是呆呆地看著社長，心想，這問題好難。然後不由自主地走神，想著：「奇怪，現在都幾點了，社長明天不用上課？難道不用睡覺嗎？這樣對身體不好吧……。」

那次深夜的開會，我回到家之後，大概已經是一點多了。當時家人很擔心，總覺得我的工作內容是不是很奇怪？要我重新考慮工作。我悶著不出聲，有些不太開心，這時候雖然還沒辦法清楚地說出為何《立報》的特質吸引我，但是我不會重新考慮換工作。

可以實驗和實踐的場所

過了二、三年，我看著身邊的同事來來去去，有的是世新來實習的半職記者，有的是來了又走的過客，已經記不住那麼多的名字了。這之間，看著特色各異的人們來來去去、還有時不時轉換風格的版面和內容，剛開始令我感到很迷惑。

但是，這份迷惑我只放在心底，沒有問出口。原因之一也許是，有時候在工作現場，總會覺得媒體工作者偶爾會讓人反感，是來自於那份肆無忌憚、絲毫沒有同理心。有些時候，問問題真的不是得到答案最好的方式。想到這一點之後，我也不再不爽那些曾經不回答我問題的老師了。

再過了一陣子，某次突然發現，原來這樣讓我迷惑的答案，是「實驗」。《立報》是一個可以實驗的場所，而且可以實踐一些有趣的想法的。有想法的話，就去做看看，如果行不通，當你發現成果不對、或者發現錯誤，自然就能了解行不通的地方在哪。

想到這一點，我有點開心，也想到一事：其實，我在《立報》要做什麼專題或報導，事前幾乎沒人會跟我說這不行、那不好。事後再來檢討。反倒是我會自己懷疑起來，真的都可以嗎？戰戰兢兢地，設限地反而是自己。

這真的是很寶貴的特點，而我卻在日後才更加深刻體會。許多老師都已經提過，學校該是容許學生犯錯、重新再來的場域，但如今的校園是否能有這樣的氣度和擔當？也許有的可以，有的不行。我直到擁有這樣的機會之後，才明白這是多麼不容易的。

後來看到社長的訪談，她也提及《立報》可以實驗和實踐的特性，看到訪問內容，讓人感到很高興。似乎又可以更了解《立報》一些了。

犀利提問 引導方向

社長的問題，相信也讓許多人冷汗直流、張口結舌。在日前的追思會上，還有近日的《立報》中，可以看到社長的學生們都提到過。我沒有榮幸成為社

長的學生，但也被社長的問題問到失眠。包括非常經典的一問：「《立報》是要給誰看的？」

我想，社長的問題雖然當下會讓人目瞪口呆，但是仔細想想，那是她在給我們指引一條思考的方向，從雜亂無章的思緒裡點起一盞明燈。目前的我還在一片迷霧裡面打轉。但我想，既然《立報》是可以實驗的，那麼社長應該不會介意那些不成熟的思考和嘗試才對。

超有特色的老闆和同事

再來，聊一聊奇特的社長和她的周遭吧！學術上的成就，大家已經說了很多。剛開始進入報社的時候，就覺得《立報》和《破報》的氣氛真是有意思，很多人都穿得很隨興，每個人都很有自己的風格，真好！如果要穿套裝上班、胸前掛著識別證，我想我會有點反胃。

員工都是這樣了，社長更加不同凡響。我從來沒看過社長穿著暗色的服裝，她的衣服就像她的人生一樣鮮豔多

彩，湖水綠、亮橘、嫩粉紅、鮮黃，我們相差四十歲，卻覺得她的色彩比我亮眼四十倍。

社長會彈琴，很喜歡跳舞，有次尾牙看她翩翩起舞，在舞池裡轉得好開心，閃亮地旋轉燈光打在地板上，社長的腳步錯落著，側面有著一貫的笑容。那次尾牙有誰、吃了什麼，我沒什麼印象，但是對這個畫面印象很深。

還有更奇怪的一件事：社長會換廁所的衛生紙捲。好幾年以前，有次在廁所碰到了社長，剛好沒有衛生紙了，社長叫我從小櫃子拿出一捲圓形的衛生紙，然後告訴我替換的方法。結果反倒是我這小員工不會，社長會。

「我們社長會換衛生紙耶！」我呆呆地跟朋友說，結果反應不一。有人說：「妳很不伶俐耶！沒加薪餉！」也有人說：「就是這種老闆才讓人佩服。」不過前者居多。

後來，我認真地觀察了一下廁所，替換紙捲不是什麼難事，如果有心觀察自然就會。但是我想許多人會跟我一樣，這間沒紙，那換另一間不就得

了……。我努力地想了又想，試著想學「Lucie式思考」來解決問題（就算小如換廁紙），假設問題是一塊路上的大石頭，如果是Lucie，她會繞過那塊石頭？轟掉那塊石頭？還是飛天遁地？或者變成那塊石頭……？

社長像俠女

記不起來是哪次開會，社長突然提到以前的往事。也許是不怎麼認同學校高壓束縛管教學生的話題起的頭，她

說：「以前念北一女的時候，我還不是偷偷翻牆出去玩。」聽到社長這麼說，我第一個反應竟是：「騙人！」但是再看看她眼角眉梢流露出來的些許倨傲，又覺得似乎很有那麼一回事。

當時，隱約地想到了《神鵬俠侶》的小東邪郭襄。在風陵渡口的雪夜，聽到了江湖中人稱讚神鵬大俠，又聽說他少了條手臂，好奇之下定要跟名門正派所不屑的江湖人士去探真相……Lucie，這位奇特的社長給人的感覺也很類似這樣，如果是平常人，也許不能坦然面對

自己不同於他人之處，或者學著極力隱藏吧！

追思會上，聽著許多前輩和長者分享關於社長的回憶，我收穫良多、也感觸良多。恐怕沒有多少人的離去，反而能夠如此發人深省。紀念一位永遠不會替自己找藉口、啟發我們太多太多的長輩，謝謝社長給我們最難得的自由，您的問句雖然犀利地可怕，卻是工作和思考最好的依歸。

（作者現為《台灣立報》記者、生活版版主）

從原民版到原動力

——為弱勢發聲的露茜

一九九九年的九二一大地震，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

那一年，在社長的支持下，《立報》創立了原民版，利格拉樂·阿烏成爲首任版主，但是九二一地震把阿烏震回了台中縣和平鄉的災區，把我震進了原住民工作的領域。二〇〇〇年一月，

我正式被真除爲原民版的版主，戰戰兢兢地接手第一份全職的正式工作，當時我對原住民領域還是半調子，每天被三千字的稿壓得喘不過氣來。

老闆與報人的社長

還記得當時社長（也是我的指導老師）有時會把我叫到辦公室，她總會問：「你覺得原民版是要做給誰看的？」被問得語塞，往往都是這種對話結束的時候，但卻也養成了我每件事都學著想清楚，並且站在受眾角度思考的態度和習慣。

金惠雯

二〇〇一年三月，我決定到南投重建區工作而辭掉了《立報》原民版主編的工作，對於已接手一年多的版面經營，著實有不捨，但是社長對於我要離職這件事卻一言不發，讓我毫無後顧之憂的投身重建區的工作。

二〇〇二年年底，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成立之後，媒體人出身的我覺得宣傳是一個組織最重要的工作，但不能老是在自己的圈子裡，得想辦法走出去。於是我厚著臉回到《立報》向社長提出每週給一個版面登文章的請求，不但馬上獲得允諾，並且還跟我說：「你負責的內容就不用擔心了。」

那是我第一次聽到社長對我的讚許，也讓我心中懸著的大石頭放下了，因為社長不是沒有看到我的努力，而是希望更砥礪我的進步。從二〇〇二年底開始，原促會不間斷的每週提供文章，並且每季集結成《原動力報》，就是有《立報》提供版面的壓力，讓我們的《原動力報》從來沒有中斷過，也成為我們最好的宣傳工具。

亦師亦友的露茜

一月二十七日下午，現任族群版主編威任在MSZ告訴我社長過世的消息，與大多數人一樣有震驚與不捨，但對我而言，有更多的遺憾！

二〇〇五年，歷經三年抗戰的我，終於考上了博士班，一直叨叨絮絮地要去請露茜吃飯，也屢次從《立報》副總編雲章那裡得知露茜跌倒受傷的消息，但未料到再聽到消息時，已經是天人永隔，這頓飯始終沒有去吃。

幾天來，腦中不斷的回想曾經與露茜見面的點點滴滴，汗顏的是，身為她的學生，卻只去見了她三次：第一次是去簽指導老師同意書，連論文內容都沒有談就同意了；第二次是因為工作太忙擔心寫不完論文而想去談談休學，她只用一句「我告訴所有人妳一定會畢業」而擋下；第三次帶了一張論文的概念圖去講給她聽，她說：「可以去寫了。」

在論文口試的會場上，口試委員中就屬露茜的提問最犀利，還讓其他口試委員跳出來幫忙我回答，其中一個至

今對我而言最具震撼性的提問：「以前毛澤東下鄉時，提到農民們因為物資缺乏，常常是一家人共舔一條鹹魚配飯吃，做為組織工作者，究竟該不該共同去舔那條鹹魚來表示同甘共苦呢？」我忘了當時的回答，但這個提問影響我至今，讓我不斷的思考，究竟該如何面對生活方式與價值觀都迥異的組織工作現場。

現在想起來，覺得自己很像是浪費了向露茜學習的這段時間，由於投身於重建區的工作，時間與空間的距離，使得我只能把論文當做一件事做完，而一直縈繞在心的不是成績，而是覺得自己努力不夠，未能達成露茜的要求，然而露茜卻對我這個學生與員工，總是笑容以對，總是讓我予取予求，總是給我足夠的空間去想清楚自己在做的事。

露茜真的是我的老師也是好友，提醒而不指責，不僅是在資源上提供我們子彈，同時也默默地在競爭激烈的媒體環境中支撐著一份獨立且為弱勢發聲的媒體，這種堅持的精神，也成為我工作立足的基石。我對露茜社長的回憶不

多，但永遠記得的是在每個課堂上向講演者的提問態度與方式，一針見血但不咄咄逼人，這種「溫柔而堅定」的學習態度一直是我還在努力的方向。

尊重多元文化發聲

《台灣立報》的原民版，是台灣線上媒體第一個創立的原住民專屬版面；原動力版，是第一個線上媒體與民間團體合作的版面。無論是原民版或是原動力，露茜社長重視的是弱勢發聲的機會，所以即使在強調教育專業報的立場上，原動力版從來沒有被干預過內容，我們恣意的書寫著工作現場發生的事情，培養出願意長期經營部落格的工作伙伴。長達八年的記錄工作，不但將原促會的點點滴滴都記下來，也讓所有曾經來過原促會貢獻心力的伙伴們留下了隻字片語，豐富了一個民間團體的生命史，也改變了很多人对原住民團體的印象：不再是光說不練，而是說到做到。

老實說，文字的書寫對基層的工作者而言，真的是相當痛苦的過程，尤其

對原住民工作者而言，因為那不是他們習慣的表達方式。

猶記得在原民版工作時，有位作者是先布農語寫作之後，再逐字翻成中文，因此用的是布農族的文法，從中文的角度來看根本是不通順，爲了保存原貌，我要求校稿人員不得順稿而如實刊登，社長把我找去討論這件事，只問：「這樣的寫法誰看得懂？」本來以爲她反對再繼續刊登，結果是她希望這樣的做法能有說明，能強化這種做法的重要性。

到了原促會的原動力版，許多工作伙伴從來沒有寫過文章，當第一篇文章被登在《立報》上時，他們臉上的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八年來，我們從逼大家寫文章填版面，到現在開始會有伙伴主動投稿，負責修改文章的同事說：「有人的文章進步了哦！」

或許站在報社的立場，一定會覺得這種不但不專業，甚至可能是塗鴉的文章會影響到報紙的專業性，對我而言，露茜社長的這種情義相挺，能夠讓這種非專業的文章刊登在主要的版面上，帶

給我們的不只是鼓舞，同時也是一種支持的力量，讓這些工作者可以不再妄自菲薄，認真面對自己的發言與書寫，這不只是提供機會，更是一種自信心的提升。

永遠的懷念與感恩

今年二月六日，應世新大學的邀請，前去錄製了一段懷念露茜的談話，本來心情平靜的我，講著講著居然哽咽了起來，雖然沒有在鏡頭面前失態，但是才發現自己對露茜的情感竟是如此之深，不知不覺的我已經把露茜視爲學習的對象，她的每一句話，都仍影響著我的工作方向以及待人處事的態度，因爲她的包容與提攜，讓我可以恣意而爲，在安全的環境中嘗試與成長，除了感謝，也很難再有更好的形容詞了，現在只想遙敬露茜社長一杯，與您「握手」！

（作者現爲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秘書長）

師生之間

與Lucie老師的最後相處

黃順星

二〇〇一年進入世新傳播所後，除了第一個學期沒遇上Lucie，這麼多年來自己的課表上總少不了她的名字，但與Lucie真正的頻繁互動，是在她大病初癒後的二〇〇七年。那時Lucie逐漸康復，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十二樓，其他兩位受指導的博士生也順利畢業，不曉得是她自己閒得發慌，或者是想趕緊出清我這存貨，還是要治癒我的懶病，〇七年的夏天，在她要求我每個禮拜都得見面討論的緊湊節奏中，度過我博士班的最後一年。二〇〇八年論文口試過後，那張口試委員同意通過的簽名表被她扣押下來，要我將其他委員的意見修改好才讓我畢業。當時心裡有些埋怨，因為口試過後沒幾天，Lucie自己就要去大峽谷玩了，卻要留著我面對好不容易才擺脫的論文。

出國前最後一次見面時我對Lucie

說：「聽說大峽谷那兒新建了一個天空步道，整個人可以凌空站立，往下俯瞰大峽谷，不知道妳想不想去看看？」Lucie聽著我說，心裡似乎也覺得有趣。等旅程歸來再次碰面時，看見她背後的窗台上放著她在天空步道上的照片。我有些驚訝地說：「妳還真的敢走上去？」她開心地笑說：「是呀，你不是不相信我敢走上去嗎，我和郭良文還有素甘，可是花了好多時間，換了好多交通工具才到那兒。」她的神情與笑容似乎是在告訴我：Hey，你猜錯了吧，我可是敢走上去的呢！

畢業後等待工作的空檔，Lucie看我繼續發著懶病，也恰好紀念館需要人手幫忙，於是讓我在紀念館從事博士後研究，繼而以兼任助理研究員的名義協助她的研究案，同時出些點子幫忙規劃紀念館的活動。這段日子我們時常聚在一

起討論，有時是她跑來研究室要我煮咖啡喝，有時是在辦公室裡一起翻書或查看資料文獻。一回在書店買了《紅軍》與《雷鋒》兩本圖文書，帶回學校後我們各據一角翻閱。看到一半，以為自己好像瞭解了些什麼，於是抬起頭來對Lucie說：「老師，我覺得妳根本不是左派，也不是馬派，妳是毛派！」Lucie聽了，哈哈大笑。

剛接觸Lucie時，曾經問她一個問題：美國社會學界究竟是如何定位妳這個人？Lucie說了許多，我也聽了許多，但印象最深刻的是Lucie說，無論學界或她自己，Marxism Intellectual是多數人對她的印象與標籤。所以深刻不在什麼意識型態的終結，或是在這個社會主義已破滅的消費社會裡，還有人這樣老古板地說自己是個馬克思主義者；而是聽她述說這一切時，Lucie所流露出的純粹與

對馬克思知識體系的確信，並且堅認這不是理想主義的烏托邦，而是一個實際可行的替代性（alternative）道路，儘管Lucie始終認為結構重於行動。

嚴肅的學術議題外，另一個話題就是音樂。在某次期末聚餐時，Lucie看我剛買到手的霍洛維茲（V. Horowitz）專輯，她興致勃勃地拿起來，還問我你也喜歡古典音樂？那時我未曾聽聞白色大鋼琴的傳說，也不曉得Lucie先學音樂而非社會學的經歷，於是我隨口胡謔，Lucie未置一語地聽著我班門弄斧。當我無力招架她一連串的嚴苛拷問時，音樂成為我拿來轉移話題的方法。往後Lucie見到我就不只問我論文進度，還會問我最近聽了什麼、買了什麼CD。忘了是那位大師來台演出，Lucie問我有沒有打算去聽，我搖頭，我說那種場合不只嚴肅拘謹，還很炫耀與布爾喬亞。她微笑地點頭：「我懂你的意思，在台灣我也不喜歡去。」

Lucie康復後曾問她，你還彈琴嗎？她搖頭：「你也知道，彈琴很花力氣的，現在我的體力不行了。」我不會彈

琴，也不會任何樂器，只能理解力量消逝的缺憾，無法真正地體會不能彈琴的失落。於是開始將我的採購與Lucie一起分享，她喜歡顧爾德（G. Gould），但似乎不大喜歡俄國的李希特（S. Richter），即便是那個被顧爾德讚譽有佳的舒伯特 D960 的演繹，她還是直搖頭說太生硬了。一晚Lucie還突然打電話給我：「你給我的那套許納貝爾（A. Schnabel）會跳針，明天我叫阿英拿給你，幫我換一套新的回來。」

因為音樂，才知道Lucie與李歐梵、王文興是台大同學，也知道Lucie與這些老友們還保持著聯絡。過去這一年常聽Lucie提到與王文興教授間的通信，不知道是王教授的慧眼或是Lucie主動提供，王教授對舍我先生的詩詞創作極感興趣，並且認為是值得深入挖掘的文學寶藏。當我們這些學生打算以紀念館的名義，舉辦一場新聞典範與另類媒體的研討會時，Lucie毫不猶豫地說那請李歐梵和葉文心來吧，也可以寫信問問 Chris Aton與 John Downing，看他們有沒有興趣來參加。我不解何以她要勞師動衆

找這些大師出席小學生們搞的同樂會，特別提醒她，看過文章後再決定是否邀請他們出席，還告訴Lucie若被這些大師批評的體無完膚，也算是師門蒙羞。Lucie揮了揮手笑說：「你這麼小器，這麼怕被人批評呀，寫不好被人批評是應該的。」

我想起論文口試時，Lucie除了寒暄與客套的串場，整個口試過程她未曾多說一句，也沒嘗試替我辯駁，她只坐在那兒聽著其他老師對我的質疑與提問。這種置身其外、宛若觀眾的冷漠，我們這群學生始終不懂。直到這半年因為著手進行新聞教育的研究案，才約略領會一二。初步討論時，Lucie問起世新的教育有哪些不同，我沒說出個所以然，只是瑣碎地叨唸專科時期舍我先生的吝嗇、學校資源的匱乏，流傳著世新的小孩子是靠自己長大的說法等等。她只是聽我說，說的愈多，愈覺得這經驗的相似性，於是對Lucie說：「老師，老先生對你和董事長好像也一樣吧，搞不好還更糟糕。」她點頭也開心地笑，好像是讚許我掌握到關鍵了。老實說，這種嚴苛

的態度與舍我先生的教育理念間有什麼關聯，我依舊不清楚，若要說理解了什麼，應該是看到在Lucie身上所映照出舍我先生的巨大身影。

在Lucie生病後我一直沒敢多問，也不清楚究竟是生了怎樣的大病，但從她出院並逐漸恢復後，我以為奇蹟又在Lucie身上發生，或者是Lucie以她強韌的意志克服另一個難關。於是她繼續開心地忙碌著，二〇〇九年的上半年，Lucie讓她所指導的博士生參加資格考，也都順利地成為博士候選人。她也接受邀約途經香港回到她在中國的田野：台山；暑假時先在夏威夷待了一陣才回到洛杉磯。這些在她生命歷程中佔有特殊意義的地方，似乎她都重新瀏覽了一次。即便夏天在日本昏倒，我還是相信並無大礙，以為只是年老體衰的必然，只是叨叨絮絮地告訴她別這麼貪玩了。

後續的時間裡，時常聽說Lucie上午還在台大看診，下午就又現身與我們這些學生或其他老師們攪和。大家都勸她多休息別這麼忙碌，但Lucie就是閒不下來：紀念館的活動她要出席，博士生

的會面依舊持續，傳院的課程也熱心地提供意見，手上的文章持續修改著。更讓人氣結的是，Lucie還可以趁候診的空檔，溜到台大醫院的誠品翻書、買書，又或者不知道從那兒找書回來，交代我向她報告內容是什麼，有何可取之處。也總是催促著說：「那本書看完沒？快點看呀，不是要和我一起討論嗎！」最後一次住院時，還為了準備出席中研院的研討會，用電話交代著該找哪些資料，也請蘭琪還轉告國富和我，該動手籌辦研討會，否則時間會過於倉促。

儘管Lucie身體時有狀況，但這些日子裡Lucie應該是開心與幸福的。時常在電梯間看著阿英為了讓她放下工作，將她押解回家休息，或在辦公室裡接到神祕電話然後說：「我姐姐找不到我，我得趕快回家。」當阿英回大陸申辦證件離開台灣時，還有蘭琪陪伴著打理一切；當蘭琪擔心過年沒人陪伴Lucie時，雲章與張正，義不容辭地邀請Lucie到家裡吃年夜飯；葉子與國富這些博士生，也規劃著一日遊的行程，打算帶這愛玩的老師走走。十月份，真善美新聞獎將

新聞典範人物頒贈給舍我先生，為了這個獎項的訪談，Lucie找我談了好多次。她思索著該怎麼不落俗套地談自己的父親，該怎麼告訴無緣親炙舍我先生的後輩們，自己父親的成就。也在這個月，Lucie在世新指導的第一位博士林照真，根據論文所改寫的《收視率新聞學：台灣電視新聞商品化》，得到曾虛白新聞學術獎的肯定。

年底幫著Lucie整理葉明勳董事長捐給紀念館的書，一邊整理Lucie一邊告訴我參加葉董事長追思會的感動。聊著聊著，Lucie問起我是否參加了當年舍我先生的告別追思會。我據實以對，她以一貫的微笑回應我，絲毫不以為忤。她說當天看著舍我先生的門生故舊絡繹不絕地前來，心裡覺得自己的父親應該真的做了些事，也影響了一些人吧！在同一段時間，Lucie交給我舍我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紀念文集《繼志一年》，要我好好看才能揣摩舍我先生的種種理念。當我拼湊這些瑣碎片段的回憶，總覺得Lucie似乎已經準備好了，所掛念的依舊是父親舍我先生的遺志。舍我先生是否滿意

Lucie的作為，恐怕無人能知，或許現在的Lucie，就像我們這些學生面對她時一樣地戒慎恐懼，正拿著小凳子端坐在舍

我先生面前，聽著父親的教誨、期待父親的肯定。但我想告訴Lucie，別忘了好好地替母親演奏一次孟德爾頌的迴旋曲

吧！
（作者現為舍我紀念館助理研究員）

慶幸遇見Lucie老師

楊 潔

Lucie老師走了。從一月二十七日當晚到台大醫院為老師誦經，中間還有告別式、追思會，到最近三月十六日的七七四九天誦經會，身體隨著儀式節奏而擺動，懷念隨著回憶填充得以追思，一開始的悲傷情緒逐漸沉澱下來。在不同的儀式裏，會遇見老師曾經合作的夥伴，或者多年的老朋友，還有同事學生，甚至是從未打過照面卻敬仰老師的陌生人。有些人是之前經常聽見老師提起的名字，但從未見過面，都在之後的弔祭與追思而看見那人。這段期間，關於老師許多未知或已知的事，藉由老師的好友、同事、學生的口語流傳或書寫下來的，成了我追憶老師與化解悲傷最大的力量。現在，「回想」與老師種種的相處也較能理出一些清晰的思緒。

仔細算一算日子，當了老師「性別

與發展」課程一學期的學生，後來變成了老師的研究助理，維持兩個禮拜碰面一次，真正相處的時間大概一年半。等我從馬來西亞做完田野回到台北，距離最後一次碰面時間已過大半年，而老師已經入院了。老師走了以後，我會覺得與老師相識得太晚，也不禁地問自己為何會如此難過不捨。

做Lucie老師的學生，我們的討論方式習慣性地先是老師問說：你讀到了什麼？再「提問」你的想法或看法是什麼，然後「追問」你為什麼這麼想，最後就是更多的「問問題」。除非你的說法與思考跳出老師所預期的，她就會說「這個講法很有意思」。我想與老師上過討論課的學生或多或少都有出現類似「語塞」、「腦袋當機」或者陷入沉思久久不語的經驗。老師「問問題」的姿

態，不是要問倒你，而是逼近自己「想得更清楚」的思考練習，當中老師當然也有基於好奇心而想要多知道、多了解。

我的討論習慣是邊想邊說，不是想清楚之後才說，也因此跟在跟老師說話時，常常會找不到適當的詞彙說出想法，或者講到一半就卡住，但老師總是包容我的「亂講」與「亂想」，而且總是有辦法引導我去思考更多問題。現在回想起來，會不禁理解老師那時的耐心，或許對老師而言，不成熟的想法或未抽象化為學術語言都不是最緊要，較重要的是願意將想法說出來，不斷說清楚也想得更清楚。其實會聽過有學生說老師的要求是很嚴厲的，因此不少人在老師面前說話總是倍感壓力。雖然我遇見的老師不似形容般嚴厲，可是卻很清

楚她是對學生有要求的。如果她發現討論讀本時你沒有準備好，就會說：「回去再讀讀，下次再來討論一遍。」

與老師討論的過程，有個插曲是我一直記得的。那次老師在問了我幾次之後，她忍不住說：「爲什麼我問你的看法的時候，你都說別人怎麼說，你呢？你自己怎麼看呢？」老師一語道破了我那「觀望知識」的姿態，對自身想法缺乏信心，總以爲用幾個大理論家、學術者的話來回應問題就是比較「安全」的方法。後來自己反省著這樣一味挪用他人的知識話語，是一種搪塞的態度，其實難以爲自身思考基礎累積語言，久而久之更會令自己的想法難以啓齒。老師這句話，在後來其他討論課或在自己閱讀的時候，時不時就會從腦裏跳出來，不斷提醒自己面對知識或現象都應有反身性思考。

老師追思會那天，蘭琪問起我與激紛（另一位助理與學生）關於老師研究光州事件新聞比較分析案子的背後動機，結果我們都說不清楚。蘭琪就驚訝地說：「你們每次關上門討論就是三小

時，我還以爲你們是因爲研究案子，才討論得這麼久。」我和激紛笑了笑說：

「前半段時間是有在討論案子，後半段時間就是閒聊了。」很難想像，身兼數職如此忙碌的老師，總是樂意撥出時間詢問我們的論文進度，然後發揮她「問題」的本色。有時候聽見我們的困惑或面對的壓力，老師總會分享她過去研究的經驗，也會聊起她的小故事或者遇見的有趣人事物。這樣地閒聊總會在兩三小時之後，直到蘭琪與阿英敲門進來喊卡爲止。

一開始當老師的研究助理，是關於移民與台山女人的研究，這個過程經常還是覺得自己「學生」身分重量多些。無論是從老師的研究案或者是自己的論文方向，老師所分享的或提醒的，更多時候是一種對研究問題或態度的堅持與反省。即使我本身做的是馬來西亞研究問題，老師卻依然能同理心地嘗試去理解馬來西亞現象，並從自身學術涵養扣聯不同地方的現象，給予任何大膽可能性的思考方向。老師保持好奇與專注的神情，那種鼓勵與開放討論的態度，一

直讓我覺得面對自己研究焦慮與不肯定時，總是不孤單。

老師走了以後，反而更清楚地了解老師做過許多了不起的學術與運動改革，與很多了不起的人共事過，也有許多她爲人處世、生活原則態度。在世人看來，老師的身影如此地巨大、視野如此地寬廣、涉獵範圍如此多元；而在我眼前，老師總是輕描淡寫地略過這些豐功偉績，不居功不自誇，如此輕巧的巨人，讓個性莽撞的我卻依然深刻感受到老師背後的心胸與視野是很大的。

我跟激紛說起最後一次與老師碰面，老師留下的那句話：「要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成了最後一句話。激紛說：「那不是最好的一句話嗎？」了解老師曾經經歷過學術與運動改革的困境，卻依然堅定與熱情地擁抱自己的志業，這句話是老師對做事與學習的原則，的確珍貴。有什麼比自己喜歡做的事獲得突破與滿足更爲激勵人心呢？

我懂爲什麼對老師如此不捨，這樣的一位老師，不僅僅只是教授知識的老師，她教我怎麼練習思考、怎麼面

對自己知識盲點與弱點，更多時候的追問是要我去面對自己思考背後的價值與立場，並且想像實踐的可能與行動。老師給的是一種態度，一種「多看、多思考、多思量」、結合學術知識與行動政治的態度。

最近夢見Lucie老師，醒來只記得夢

的時間很長，可是細節都記不清楚了。只有兩個畫面是還深刻的，一幕是老師與學生在上課討論的情景，老師，你不是在天堂開課？另一幕則是老師似乎在望著我，那個「要我搞清楚」的表情是我熟悉的，卻剛好出現在我最近又陷入研究思考混亂的時間點。

老師，雖然相識時間不長，也有很晚的感覺，但回頭想想，也慶幸是研究生這段期間遇見了老師。Lucie老師，謝謝你，也想念你。

（作者為台灣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生，成露茜教授研究助理）

永遠的微笑・Lucie

吳裕勝

我坐在博士班入學考的口試教室裡，在桌子的另一端是個男老師與二位女

老師，老實說，對他們並不熟悉，但由於態度都十分親切，消弭些許在應試時的緊張感。坐在中間的女老師翻著我的備審資料，邊翻邊問「那你的碩士論文呢？」那時的碩士論文並未完全成形，故我設計出十餘頁的論文精簡版本，排編在著作與得獎記錄裡，的確很容易就讓人輕忽了。我回答說，「大概是在這本資料的第幾頁到第幾頁中，那是我的論文精簡版本。」女老師翻到那裡，一面看著，一面微笑。後來，幸運地進了

博士班就讀，我才知道當時的發問者就是Lucie老師。

博一時選修「媒體與文化研究的關鍵辯論」這堂課，那是安排在週四早上九點到十二點的課程，當時排定的授課者是Lucie老師，課程是以演講的方式進行，故平均二到三週會有不同講者進行其研究領域的討論。原本想Lucie老師應該只是掛名而已，到時是不會出席的，可是出乎意料之外，她幾乎每節課都與修課者同聆聽講者的演講，並進行討論與提問。這時我已對她有更深層的認識，如《破報》、《立報》、《傳記文

學》與她的關係，世新大學創辦人與她的關聯，她在台灣的學術位置等，知道愈多她的事情後，更由衷讓人敬佩，尤其身處在繁重的工作下，亦能在這上課場合出席。當她用堅定的語氣說出看法時，我時常感到羞愧，因這些意見或提問是自己從未仔細想過的，而她清晰的思維理路也總是適時點出問題的所在，除讓人茅塞頓開外，更是有種難以言喻的嘆服感。

那時這門課需要有個記錄者，需要金錢維生的我，也就跟助理表示有意願擔任，助理那時說沒有問題，但至於工

讀金有多少就得跟Lucie院長再討論。找了天上完課的空堂，跟助理約了院長的時間，跟她說明要跟她討論是工讀金的問題後，她先是懷疑的神情，但後來就粲然地說，「這工讀金部分不用擔心，會依學校的安排給你的。」後來，工讀金果真如數的到達自己帳戶裡。而在這課堂記錄工作中，原以為這些發生過的記錄大概無人會再搭理，想不到Lucie老師卻時常跟我說哪裡可能記錄有誤，要我再做出修改，回想那年的課堂記錄工作，著實讓我精進不少。

之後在同學間傳開Lucie老師得癌的消息，那時最常聽到的說法是她不願意太多人去探望她，故多數時候總是呈現狀況不明的情況，我心裡願她能一切安好。但似乎奇蹟似的，當我再次在校園看到Lucie老師時，她依舊是個面帶笑容且精神奕奕的溫柔長者，絲毫沒有什麼病痛在身上發生過的痕跡。後來，她爲了自己的心願成立舍我紀念館，並爲新聞史的工作不遺餘力，在多次的紀念館的演講場合，她總是微笑地跟講者介紹我們博士班的學生。有陣子她帶著

口罩，聽說是感冒了，卻仍聽完整場演講，並在討論時間裡拿下口罩提出她的見解。另外，在「媒體識讀」的教學會議裡，她也不斷地對自己的想法提出多次的討論，像近來這門課被縮減爲二學分，她也是在對現況理解後，並極力在其他場合提出這樣做法的不妥處，以便提出解決之道。我常跟曉南老師討論功課時，提到她因爲自己擇善固執讓身體與精神呈現過大負荷的狀況，在尊崇之餘其實掩藏著更多的不捨。而這些強韌與溫柔的種種，成爲我對Lucie老師無法磨滅的記憶片段。

前幾天到學校靈堂弔唁Lucie老師，在鮮花環繞中的她，依舊是面露笑靨。靜默默地站在她照片前，想起這些日子以來的相處，她那待人有禮且隨時的笑容，彷彿是股軟甜甜的溫流，讓人永遠有希望的感覺。走出靈堂，站在連日陰霾後露出陽光的冬日午後，翠谷吹起薄寒的風，吹散地面落葉塵沙，卻無法吹散Lucie老師刻印在我心頭那永遠的笑顏。（作者現爲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博士生）



▲一九八〇年九月四日，廣州中山大學英語培訓中心開學典禮，JOLA副校長斯文森致詞。
廣州中山大學英語培訓中心開學典禮。



書寫 Lucie

勇者的故事：成露茜

鍾秀梅

成露茜 (Lucie Cheng)，一九三九年出生於香港，美國夏威夷大學畢業，獲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博士學位，任教該校多年，受聘為終身教授。一九七二年首次回中國大陸受周恩來總理接見。現任世新大學傳播學院院長、台灣《立報》發行人兼社長、《傳記文學》出版社社長。曾主編《近代中國婦女史英文資料目錄》(Women in China: Bibliography of Available English Language Materials)；著有《舍我先生志節文粹》。

逃亡與求學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襲擊珍珠港①，給中國人民一個希望，自從一九三五年「九一八」事變（編按：應為一九三一年）以後，日本帝國主義侵

略中國，與西方幾個帝國角逐，試圖通過侵略壟斷對中國的殖民，中國人民幾經日軍摧殘，許多的家離散，無數的冤魂在中國土地上飄盪，但是日本帝國主義同時樹立了外部的敵人，其與西方列強在中國的矛盾加劇了。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大陸內部軍閥割據處於內戰狀態，創造了主要革命政黨——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的可能性。在此動盪的年代成露茜在香港出生了。

成露茜的家庭同家國的命運休戚與共。父親成舍我於一九三五年在上海辦了《立報》，是著名的報業家②，因為抗日戰爭，一九三八年移至香港，但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立報》停刊。成舍我出席重慶參政會未歸。」③成露茜隨母親蕭宗讓、哥哥成思危、姊姊成嘉玲四處逃難，先後到桂林、重慶，抗戰勝利

到了北平，後來又到了香港。露茜回憶起：

母親在法國唸書，回國也沒有做事就結婚了，然後生下我們三人，然後就沒做什麼事，好像就這樣一生就沒有了。可是後來我想一想，我父親是現代史上很有名的人，可是他每一次就是抗戰、戰爭的時候，日本人來時他就被抓，他就總是跳上車，帶把牙刷就跑了。就是我母親帶著我們三個小孩逃難。④

一九五二年，成露茜舉家搬到台灣，有好幾年，父親的狀況是「本擬在台北復刊《世界日報》，因國民黨政府實施報禁，辦報計劃擱置，成舍我說：從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四年，『這幾年中，我就斷絕了辦報念頭，一面教書，一面寫點評論或專欄之類的文章』（馬之驢，《新聞界三老兵》，頁三〇九）。於是決心興辦新聞學校，培訓一萬名新聞幹部回大陸。」⑤沒想到這一

留，成舍我竟在台灣度過五十幾年的光陰。

成舍我教育子女的方式很民主，從小給孩子自由的環境，並培養他們獨立的個性。成舍我也教導小孩用錢的態度，從很小的故事就可看出，在她的回憶中提到：

小學時，如果替我父親做點事情，比如說，我父親有剪報的習慣，他剪了報以後，都是你再把它剪了，然後貼在他那「X」的白紙上，這個工作，基本上是我跟姊姊承擔，貼一張給一分錢，長大一點，我們就替他抄稿子，抄一百個字一毛錢，他弄一個存摺，上面寫父親銀行，下面有我們的名字，他就給我們記帳。⑥

完成高中學業後，成露茜考上了台大外文系，後來聽了聖公會的建議到夏威夷唸書。父親反對她選擇音樂為專業，支持她的母親把鋼琴賣了，加上她自己的全部積蓄，才籌了一百美金，她就這樣遠離台灣，負笈他鄉。

美國學術生涯

露茜成為社會學教授，事出於偶然。剛到美國讀書的第一年，身兼五個工作，一年下來積勞成疾，無法負荷對體力要求相當大的音樂訓練，她便把音樂變成輔修，社會學是主修。後來到芝加哥唸碩士，在一個聖誕節暈倒在百貨店，才知腎臟出了問題，露茜讓救護車送進了醫院，同時也失去了一個腎臟。

露茜大學畢業後，同一位日裔美人結婚，他正在服兵役。露茜在芝加哥唸書時，丈夫被派往韓國。她病倒後，整個症狀是疲倦、體重減輕、發燒咳嗽等，一度被海軍醫院誤診為活性結核病，社區的衛生單位緊張的不得了，還跑到露茜住的校舍消毒，曾經三餐飯後要吃五十種藥，結果，芝加哥大學的醫生證明她那個腎臟被割除是冤枉的。

因為這次事件，有人建議露茜要求把先生調回來，她透過夏威夷的參議員要求把先生調到芝加哥，沒想到成了。此事件讓露茜對美國社會有了較深刻的看法，她說：「其實在美國那個社會，只要你知道你的權益所在，你去爭取你就是有的，不必一定就是忍氣吞聲或是

什麼的。」⑦

露茜美國的學習生涯中，經歷了美式獨立思考、勇於表達自我想法的訓練。過程中，露茜因為對英文沒自信，不敢表達自己的想法，有個老師就覺得這個學生像個小偷，到課堂偷聽大家的想法，然後變成自己的想法。後來，露茜克服種種困難，在課堂大聲說出自己的看法時，這名老師就非常欣賞露茜的分析能力。

芝加哥生病期間，母親在台灣過世，因為當時在醫院沒接到家裡的消息，所以在母親的葬禮上缺席了，是露茜一生最大的遺憾。露茜覺得對家裡有虧欠，芝加哥大學碩士畢業後，回到台大教大眾傳播，陪了父親一年。之後，夏威夷大學博士班的錄取通知，又把她留在美國。幾年後，露茜成為夏大第一個博士生，後來種種原因，露茜獲聘加州UCLA大學的教職，展開了她人生中較為戰鬥的長頁。

成露茜在芝加哥的學習生活中，就感覺到種族歧視的存在，比方說，有些社區的房子不願租給有色人種。到了洛

杉磯，在學校她是屬於弱勢學校畢業、女性與少數民族，因為一九七〇年代黑人民權運動，凸顯了美國種族平等的重要性，同時女性主義運動的興起，讓露茜在UCLA社會系老師聘任的過程中，取得了政治正確的優勢，但是露茜在工作的過程中，也受盡委屈，「戰！戰！戰！」，成為她在美國社會的座右銘，過程之艱辛，很難用幾句話帶過。經過多年努力，成露茜獲聘亞洲美國研究中心（Asia American Study Center）的主任，過去這個職務幾乎都是終身教授擔任，成露茜破天荒的被錄用。

露茜帶領下的亞洲美國研究中心性質是跟當時美國社會運動的興起有關，成露茜說：「本來UCLA和BERKLEY有一個協議，就是那時在實驗一些新的組織型態，來因應整個社會運動的潮流，有些成立少數民族系，UCLA成立研究中心。」⑧但是，成教授不理會學校的規定，她組了三到四人的核心教授群，配合一些對少數民族運動有承諾的學生，展開族群教育與研究，轟動當時美國整體上還是保守的學院氣氛。

這個研究中心也參與反對越南戰爭的運動，同時介入了對越南戰爭的分析，這個研究團隊認為，這個戰爭參軍的都是黑人，黑人死傷最多，所以美國帝國主義讓美國國內種族矛盾外延化。中心辦了《亞洲行動刊物》（Asia Action），是美國唯一的亞裔學術刊物，露茜教授也開了亞洲婦女（Asian of women）的研究，把學生帶到唐人街做研究，露茜感到較為自豪的研究，是關於美國的中國妓女研究，她花了許多時間在圖書館、墓地、唐人街等找資料，最後拼湊了四千多個離鄉背井到美國討生活的華人性工作者的故事。

成露茜教授還有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向，是分析資本流動與世界體系的關係，特別是亞洲做為國際分工的一環，其努力密集產業的基礎，是建立在大量從農村到城市的廉價女工，但是這種研究取向也是鬥爭來的，特別是受到當時保守的區域研究的反對。成露茜強調：「我的研究不是一個地域的研究，它是一個研究關係的、是一個研究太平洋地區所有國家互動的、研究貨物的流通、

人的移民、資本的流動。」⑨

社會介入

露茜的學院生活是行動派，她反對知識分子不理會國與國的權力關係，奢談世界公民，因為學院教授最理想的是無國界的流動，什麼地方工資好就往哪跑，但是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露茜是如何做到社會實踐？一九七二年加州的中國城成衣業很發達，有兩個重要的團體在裡面活動，一派主張要組工會，一派要搞合作社，成露茜帶著大學生挨家挨戶做調查，才發現成衣業的社會關係網絡都是親族關係，搞工會會有困難，露茜就建議他們搞合作社。

後來我們就下去跟他們一起組織，一開始是非常好的，因為我們做了研究，所以知道這個地區需要什麼，我們做了家庭訊息資料，有英文、中文、西班牙文。基本上是給家庭的，內容講婚姻暴力防治方法，另外，我們賣菜，通常早上四點到菜場把很便宜的菜買進來，在中國城賣出去，合作社也組織做成衣，接回來，大家一起做。⑩

合作社的盈餘分配由大家開會決定，一開始還好，但是賺了錢後集體的公共性不見了，居民寧願買電視，也不願辦公共托兒所。這次的受挫，露茜並不氣餒，她覺得知識分子就要知民間疾苦，不要眼高手低，只會說不會動。

一九七二年對成家而言是重要的一年，受父親的託付，露茜隻身前往北京找離散多年的哥哥成思危。

成思危的逆境一直到一九七二年才有所轉變，這一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緊張的中美關係開始「解凍」。此時，早在五〇年代就移居台灣的成舍我先生感到尋找多年來日夜牽掛的兒子的機會有了。他派在美國留學的四女兒成露茜專程回中國尋找哥哥，同年十一月，周恩來總理在北京接風了成露茜，並稱成舍我是「民族資產階級鬥士」。隨之，在有關方面的安排下，兄妹見了面。接下來，成思危頭上的罪名不提了。再接下來，成思危很快從瀋陽調入北京，到化工部石油科學研究院工作。

⑪

營救哥哥之前，成露茜就被台灣

國民黨當局列入黑名單，因為她在課堂上批評國民黨被打小報告，一直到一九七五年因為UCLA和台灣有教育行政的關係，她才得以回台。雖然哥哥在大陸的遭遇和自己被台灣當局的對待，露茜對兩地的熱情依舊，她覺得「我不是國族主義者，所以我長住美國、住在台灣、住在大陸，從民族感情來講統獨的考慮沒有意義。我相信人民自決，現在講統或獨沒有意義。」^⑫

回台辦報與辦學

一九九一年因為父親年歲已大又生病，露茜答應他接下《台灣立報》，有十幾年的歲月，露茜奔波於美國和台灣，也因為這樣，她的第二任猶太丈夫受不了在台灣的生活而離異。

《台灣立報》是眾多商業報紙之外的另類選擇，它是批判的、多元觀點、教育的、性別的與社運觀點的報紙，《立報》成為台灣媒體界的異類，可是卻如實的報導事件的發生。《立報》

承接了成舍我在上海辦報的傳統，有三大大目標，實現理論與實踐結合的教育理念、發揚公正獨立的媒體傳統、不依靠龐大的資本為後盾。

《立報》是一份四開的小型報，這份資金常常短缺的非主流媒體，在一九九〇年代多變的台灣社會，如實報導各種各樣人民自發的運動與想法，露茜幾乎每天下午到報社，要忙到晚上十一點才結束，現在台灣許多優秀的媒體工作者，都曾在此鍛練過。

一九九六年露茜又辦了《破報》，其宗旨是：「有立必有破，有破才有立，世代的交替，在立和破的辯證軌道上滑行。沒有一個世代保有完全和永恆的優勢，『破』和『立』也不會是任何一個世代專利。」《破報》和《立報》的創立是要在參與這個過程中的人，留下一些種子，能夠在台灣這片土地發芽茁壯。^⑬

推動世新大學成立社會發展研究所，也是成露茜重要的成就，這個研究所鼓勵學生參與社會的另類發展研究。幾位老師都是行動派的知識分子，他們

分別介入學運、工運、移民權等運動，帶領學生進入批判的、互動學習的、基層實踐的行動研究方法。二千年之後，台灣媒體的惡質化越來越嚴重，露茜掌管起世新傳播學院的院長職務，培養起更多的優質媒體人才。

露茜常想為何我們會對強者認同，對弱者無所感覺？成露茜過去所做的努力，打破了這個常規，她幫助弱勢者爭取發言空間，訓練並鼓勵年輕人投入社會運動，讓進步的聲音在單一的政治文化中有發聲的機會，堅持並維繫另類媒體的獨特風格，不向主流妥協。露茜的勇氣與眼界，為她所努力的多個社會留下無形的資產。

（作者現為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

系助理教授）

〔編按：本文出自陳順馨等主編，《多彩的和平：108名婦女的故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二〇〇七年五月一日）。在此感謝編者與作者的授權使用。〕

註釋：

- ① 太平洋戰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是日本與美國等同盟國之間的戰爭，開始於日本聯合艦隊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偷襲珍珠港，結束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無條件投降，中國大陸正處於國共內戰，情勢緊張。
- ② 關於成舍我資料請參閱成舍我紀念網站 <http://csw.shu.edu.tw/timeline/view.php3?or>

der=YEAR_NO&limit=10&view=all

- ③ 資料來源同上。
- ④ 關於成露茜教授的訪談，均參照翁秀琪教授在一九九八年的訪談整理，經成露茜教授同意運用。
- ⑤ http://csw.shu.edu.tw/timeline/view.php3?or=YEAR_NO&limit=10&view=all：馬之驢，《新聞界三老兵》，頁三〇九。
- ⑥ 資料來源：翁秀琪教授訪談。
- ⑦ 資料來源同上。
- ⑧ 資料來源同上。
- ⑨ 資料來源同上。
- ⑩ 資料來源同上。
- ⑪ 華南理工大學創校五十週年的專文〈從書生到副委員長——記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思危〉。
- ⑫ 資料來源：翁秀琪教授訪談。
- ⑬ 參考《立報》與《破報》簡介。

成舍我女兒 嘉玲露茜 彼此的反對黨

林怡婷 徐國淦 梁玉芳

老報人成舍我留給台灣的資產，不只是培育新聞人才的「世界新聞專科學校」，還有他傑出的兩位女兒：成嘉玲

和成露茜。儘管她們行事與風格南轅北轍，卻都是讓「世新」招牌閃亮的大功臣。

報人家裡裡培養出意識形態光譜上截然不同的三兄妹：獨子成思危十六歲決定隻身由香港走過羅湖橋，回大陸擁

抱他的「新中國」，如今是中共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二女成嘉玲是篤信資本力量的經濟學者，么女成露茜則懷抱改善社會的理想，做了折衷者。

儘管姊妹兩人從小就是「彼此的反對者」，但從走過大半個世界及人生，她們發現：有姊妹陪伴，是多麼美好的事！以下是成氏姊妹的相對論。

看電影 姊妹坐樓上樓下

記者問：妳們姊妹倆，所學不同，似乎個性、價值觀也很不一樣？

成嘉玲（以下簡稱「玲」）：我們只差一歲多，個性那麼不同。小時候，我跟我妹從來不一起出去；她的朋友跟她吵架了，就變成我的朋友。一起去看電影，一定一個坐樓上，一個坐樓下。現在年紀大啦，反而比較好，常常吃飯、逛街，聊聊天。

但是我們不能談公事，一談就要吵架。還好，是我不當校長之後，她才來當（傳播學院）院長的。

成露茜（以下簡稱「茜」）：我們

個性、看法、理念都不一樣。還好我們生在同一家，否則一定是對手。

玲：拿做事來說，我注重成本，Lucie（成露茜）說只為理念，不為賺錢。但理念也得靠錢啊，沒有資本怎麼存活？我說這是學經濟跟社會學的不同，可她反駁我，說學經濟的也有像她那樣的。但是就我所知，很少。

茜：姊姊是從input、output看，重視投下多少、得到多少；我重視過程和結構。

玲：我只管結果，怎麼做我不管。我常笑Lucie是「論文式管理」，她要人家想該怎麼做，成天為怎麼做打轉，倒把結果放一邊。

茜：這樣說很不公平。這不只是給魚或魚竿的問題，我希望跟我共事的人，不僅知道釣魚的方法，也知道最後有沒有釣到魚，跟有沒有魚可釣等其他條件有關。

玲：我還是覺得不大對，妳指導太多。

茜：我是訓練邏輯思考，是教一套方法，訓練出來的人能夠做系統性思

考。

愛鬥嘴 老爸調教出來的

問：妳們平常都是這樣鬥嘴嗎？

玲：嚇！平常鬥嘴比這厲害多了。通常是她講的、我不接受，我講的、她不接受，永遠鬥不完。

茜：我比較客氣。我不打口水戰！

玲：這也是她自己說的。鬥嘴是我父親的訓練——每天下午四、五點，選個題目全家大辯論。我們叫「磨牙」。

問：通常讓你們不可開交的事是什麼？

茜：我們對學校方向有不同看法。

玲：我對《立報》也有意見，所以，我絕對不看，因為一看我就有意見，但我妹是絕對不接受我意見的。

茜：她是不大看，但意見很多。還會說誰誰又有什麼意見啦，等等。

玲：我總得轉達一下人家的意見。我不喜歡歷史，我只往前看，過去的事沒辦法糾正，不要吃懊悔藥，所以我很快樂。

茜：所以說，她沒有反省能力！

問：你們是彼此的反對黨？

玲、茜（同時）：對對對，是互相的反對黨。

茜：但我們對彼此尊重，不會在後面拆台——或許她有，我不知道，哈哈。

玲：沒有，沒有！都是捧妳的場！我們當然知道對方的優點，只是不願意講，心裡也還滿欣賞對方的。像劉紹唐太太找我們接《傳記文學》，Lucy有興趣，我就支持。這個年齡，能有個妹妹在一起，是很好的事情。

要學費 不想聽訓自己賺

問：父親是知名報人，可是，據說妳們得打工自己付學費？

玲：爸爸不是不給，而是每次都要訓話！說他十幾歲就賺錢，廿幾歲就辦報，這些那些。我乾脆自己賺，我逃課當家教。

茜：在台大我拿書卷獎，免學費。不過，大二想提早出國學音樂，父親不

贊成，我得自己籌錢。我媽幫我把鋼琴賣了，做路費，身上只有一百美元。到美國時幫人燒飯、帶小孩、清理房間，這段日子跟我以後對族群、階級敏感很有關。

當時教會安排我住美國人家裡，幫忙帶小孩、做家事。那戶人家兩個孩子偷抽菸，卻告訴他媽媽是我抽的！有一次，我飯沒做好，女主人指著我額頭說：「我不管你多聰明，你實在很笨！」這些經驗，讓我知道文化差異和權力關係等很多事情。

問：這麼辛苦，對父親有怨言嗎？

茜：其實父親的方式讓我很好吃苦。我在美國讀大學時曾經同時打五個工：替兩個教堂彈鋼琴、在汽車餐館當穿著短裙、踩咕嚕鞋（溜冰鞋）滑到車子旁邊送食物的服務員、還在報社當採訪編輯、研究助理。

有人徵求助理把中國樂譜轉換成五線譜，我學過崑曲，宮商角徵羽難不倒我，這讓我可以繳宿舍費。

問：妳們在各自專業領域裡很傑出，曾感受到性別壓力嗎？

玲：我是台灣第一個大學的女院長。一九七九年東吳大學校長端木愷要我當商學院院長，有人反對，但校長挺我。

搞革命 入UCLA校史

出國時，原本指導教授是日本人，他覺得我是可造之材，可當經濟學的「大學者」，規定我不能交男朋友。有一次，我出去玩被他抓到，他很生氣。我說，這是男女不平等，男教授能約會、結婚，女生就不行？那我不要當「大學者」了。

茜：我在UCLA任教第二年，就入選很有權力的「人事預算委員會」，是第一個少數民族女性委員，我有些飄然。

第一次去開會，全都是白人男性，還都留鬍子。Chairman（主席）一來，就說，啊，如果有人去弄咖啡多好？我說，好啊，就去弄了。一坐下，他把本子推過來，「請妳做筆記吧」。第二次開會，又是這樣。

辦學校 聘許多異議人士

剛開始我認為替大家服務沒什麼，平常在朋友間我也是會做的；但是，為什麼注定是我！第三次，我開始反省，我要反抗……（玲大聲：嘿，要是我，第一次就反對了！）但我也很有壓力：在座有諾貝爾獎得主，我又是新人，我不會小題大作呢？但如果不吭聲，我不是強化了這樣的對待？

第三次開會，大家都等著我去弄咖啡，我不動。一分一秒過去，大家很不安，主席又說：「誰給我們弄點咖啡？」我還是不動。主席不好意思，起身去煮咖啡。我把筆記本推給旁邊的人：「輪到你記了。」

第二天我遇到校長，校長劈頭跟我說：「Lucie，聽說妳昨天搞了一場革命！」哈哈，這件事還被人寫入UCLA的校史裡。

問：你們一起接下父親辦學的擔子，當初怎麼分工的？

茜：剛開始，我是黑名單，不能回台灣的。他們說我左傾。到一九八〇以後，我才能回來。父親過世，葉明勳先生要我們接，就由姊姊當校長。

玲：我爸當然不放心把學校交給我，因為他知道我很會花錢。早先我當世新教務長時，我覺得廁所要多、班級要小，這都要花錢，他都反對。吵僵了，我就不幹了。

他過世後，我接下世新。每次要花錢，我會指指牆上爸爸的照片說：「他一定在皺眉頭！」世新這些年的變化，他一定很高興。

問：世新在成舍我先生手上，曾經接納不少政治異議人物任教？

玲：父親早年因為批評時政坐過牢，他辦學也兼容並蓄，聘了許多異議人士，像王曉波、陳鼓應、黃煌雄、蔣勻田、沈雲龍等，師資非常好。獨、統立場不同的李筱峰與王曉波，都在世新開「台灣史」，那可精彩了。有學生說，到底要聽誰的？我說，大學就是要訓練你獨立思考與判斷。

茜：自由的風氣很重要，但是批評和批判是兩碼事；沒有理論立場的批評，那只是個人看法。

玲：哎喲，有些左派的學者，都是嘴上講，老要從大處著眼，哪那麼多大處？由小處著手就會影響大處了。像我近年在大陸辦希望小學，包括在母親的故鄉江西永興，窮小孩不要輸在起跑點上。雖然我個人生活是很資本主義的……

茜：妳思想也是。妳講的這套，就是資本主義邏輯（玲：妳不出錢，還講）。我是不做慈善事業的，貧窮是結構性問題，不是個人跑得快慢的問題，要從根本去改革。

穿走舞會新衣 姊當年如此對待妹

同樣有著父親成舍我的才氣與大氣，但成嘉玲、成露茜這對姊妹卻有太多不同，像是同一家庭裡長出來的兩個品種。

打扮摩登的姊姊成嘉玲，學經濟，篤信成本效益；像有用不完的精力和運氣，理直氣壯行走世間。父親創辦的世新專校，在她手上升格為大學，她讓全

校一級主管全到夏威夷大學去觀摩，好大氣魄。

念社會學的妹妹成露茜，出國留學時吃了一些苦，開啓她用種族、階級、性別的眼光看待世情。在加州大學歷經民權運動洗禮，回台後她創辦《破報》、開設左派理想的「社會發展研究所」，也就理所當然。

「妳告訴他們，當年妳怎麼欺負我的？」成露茜對姊姊說。成嘉玲老實招認，少女時代要參加舞會，她就到裁縫那兒，直接把妹妹的新衣給穿走啦。

訪談中，記者問一個問題，她們自己就辯論起來，最貨真價實的「相對論」，旁人根本插不了嘴。幾次唇槍舌劍，常是妹妹成露茜稍稍讓步；幼年學講話，她可比大一歲的姊姊早開竅。她們爭辯的不是柴米油鹽，也非口頭意氣，而是看世界的方法；她們談及的人物，像是上世紀的中國名人堂，透露兩人的世家書卷氣。

她們的父親成舍我，是我國報業史上第一個獨力創辦三份報紙的報人。到了台灣，因為報禁，他賣了妻子的七

根金條，買地創辦世新——不能辦報，培養報業人才總可以吧！成舍我與現代寵愛子女的父親很不同：對兒女絕不誇獎、要零用錢自己賺、要出國自己想辦法，節省到女兒的北一女黑裙子也是一補再補。

成露茜說，父親寧願孩子吃苦，學會解決問題的大能力。成嘉玲理解父親成長在動亂，爲了辦學校，把他的立委薪水都捐出來發老師薪水，看金錢必和他們不同。

成氏姊妹說，父親從不讓她們覺得自己夠好。這點不無遺憾，但溫柔的母親蕭宗讓是她們心靈的撫慰者。留學法國的蕭宗讓在巴黎一家餐廳裡，讓同是報人的程滄波和成舍我驚豔，最後她成了「成太太」。大文豪蕭伯納訪華時，她曾擔任翻譯。

成嘉玲說，母親原本在北平女師大教法文，結婚後，父親覺得她太美了，不讓她再工作，她只好「成天在家打麻將」。母親的遭遇也是成家姊妹的性別啓蒙之一：「母親告訴我們：婚後，絕對不要放棄自己的工作！」姊妹倆至今

遵行不悖。

老爸讓十六歲哥哥單飛大陸

問：據說父親對子女很嚴厲，可以談談對父親的印象嗎？

茜：我們不覺得他嚴厲啊！在北平的時候，他在日報跟晚報中間的空檔，會帶母親和我們到中山公園吃小點心。他會講故事，也會教我們念詩詞，像「弔影分爲千里雁，辭根散作九秋蓬」呀，或是「少小離家老大回」這些。我們的國學基礎不是從學校，是從他來的。

玲：在香港的時候，爸爸教我們念〈陋室銘〉這些古文，背完一篇就有一塊錢港幣。需要錢的時候，我一天可以背好多篇。我們國文基礎來自父親，英文來自母親。父親不太關心我們功課，連我們念什麼學校、幾年級都不清楚。

茜：他的圖章就放在床頭櫃抽屜，想賴學，就自己蓋請假單，沒人管。

玲：留法的母親是自由派，什麼東西都要我們學：鋼琴、太極拳、畫畫、

崑曲，但不學也沒關係。所以，Lucie 鋼琴彈得很好，哥哥到現在也還打太極拳。我現在也還在畫畫。

茜：家裡真是不太注意我們小孩在幹嘛。逃難到香港，我哥（成思危）朋友介紹他去念中學，他念得很開心。他畢業典禮，我媽和我都去了，典禮開始唱國歌，我跟媽媽開口就唱：「三民主義……」哪知其他人都唱：「起來，不願作奴隸的人們……」（編按：《義勇軍進行曲》，現為中共國歌）我們才知道：哎呀，那是個親共中學！

玲：所以，我哥十六歲畢業就回大陸去「建設新中國」了。

父親總是在看書、寫字、念英文、聽廣播，他是身教。家裡有幾千本書，我們就坐在書堆裡亂看。我跟Lucie都是對自己不滿意的人，覺得自己不夠好——因為爸爸會讓你覺得自己不夠好。像我們都念北一女中、台大，但爸爸就會說，連你們都考取，顯示現在學校程度很差！很氣人呀。不過，後來才知道他在朋友夏濤聲、雷震面前還蠻誇

我們的。

茜：我小學作文比賽第一名，爸爸就說：「小時了了，大未必佳。」還好，我們已經習慣了。有一次他很生氣，因為我在《大華晚報》寫小說，叫「女生宿舍」，其實只是大學女生交男朋友的故事故，他說是黃色小說。那句很流行的「大一驕、大二傲、大三拉警報、大四沒人要」，就是我在那篇小說裡寫出來的！

玲：中學時，有人寫情書給我，寄到家裡，爸爸全沒收，還偷看。看完故意跟我說：「陳伯伯看到你在公車站牌那裡跟男生約會。」不過，他還是有原則的啦，他有「三不」政策：不干預子女的婚姻、政治、職業。

茜：但他會讓你知，他不是很贊成。

問：當年你們的哥哥成思危選擇回大陸，父親會不會很失望？

茜：我母親很不贊成，她希望父親能阻止我哥。父親跟哥談，我在門口偷聽。父親問了一堆問題後，出來說：

「他已經想清楚了，讓他去吧，他自己負責。」

我母親喊：「他才十六歲的小孩，要他怎麼負責？」我爸又開始說他十六歲就出來賺錢，如何如何。

最近我編父親的資料，許多東西我看來很新鮮。像有外國人說，父親讓哥哥回大陸，是有目標的一個布局，說他早看到未來兩岸的局面，所以讓小孩分在不同地方。（問玲）妳同意嗎？

玲：不同意！外國人不懂。母親才慘，從此沒有見過我哥。文革時期，我哥的海外關係讓他吃了苦，我媽寫了幾百封信詢問我哥的下落。她五十幾歲就過世，我想跟想念我哥有關。

茜：所以，我姊一對我哥不滿意，就用這件事去提醒他！後來父親病重，哥哥終於來台兩次探親。但現在他是中共人大副委員長，不能來了。

（編按：本文原發表於《聯合報》二〇〇五年四月十二日A10版。由記者林怡婷、徐國淦、梁玉芳訪問撰寫。）

懷念成露茜女士

林深靖

台灣立報社長成露茜博士於昨日辭世，我們謹在此致上無限的敬重與哀思。

成女士畢生勇毅卓絕，她在美國求學期間即受到民權運動的啟發，長期致力於弱勢族群、弱勢婦女的研究，並透過書寫與行動，為弱者爭取發言權。她的努力受到美國學界的重視，很年輕就獲聘為洛杉磯加州大學（UCLA）「亞洲美國研究中心」（Asia American Study Center）主任。她主導研究中心介入越戰的分析，揭露美國帝國主義透過戰爭將國內種族矛盾外延化的事實。同時，她還創辦了《亞洲行動》刊物（Asia Action），當時是美國唯一的亞裔學術刊物。做為UCLA教授，她在學校開辦亞洲婦女（Asian of women）研究，把學生帶到唐人街追索華人婦女移民血淚，埋首於圖書館、墓地、街頭店面尋找資料，經由艱辛的挖掘，重新拼貼建構了

無數華人女性離鄉背井到美國討生活的故事。

成露茜教授有深厚的左翼情懷，除了終其一生為弱者行動、為弱者發聲之外，她並從馬克思思想出發，分析資本流動與世界體系的關係。特別是亞洲做為國際分工的一環，其努力密集產業的性質。她深入探討亞太地區的生產關係，乃至國家之間的互動、貨物的流通、人民的遷移、資本的流動。

一九九一年，成露茜從父親的手上接下《台灣立報》的棒子，承接老報人成舍我在上海辦報的三大理想：實現理論與實踐結合的教育理念、發揚公正獨立的媒體精神、不依靠龐大的資本為後盾。

一九九五年，成露茜又創辦了《破報》。發刊宗旨是：「有立必有破，有破才有立，世代的交替，在立和破的辯證軌道上滑行。」《立報》和《破報》

長期堅持批判的、多元的、教育的、社運的觀點，在台灣眾多商業取向的媒體之外，提供了另類的選擇。二〇〇六年，成露茜再創辦台灣第一份越南文與泰文月刊《四方報》，為在台的國際移民與新移民女性發聲。

推動世新大學成立「社會發展研究所」，也是成露茜重要的貢獻。社發所採取批判的、互動學習的、基層實踐的行動研究方法，鼓勵師生介入社會，採取行動。二〇〇〇年之後，台灣媒體日趨惡質化，成教授即使身體虛弱，依然承接世新大學傳播學院院長職務，為培養更多優質媒體人才而努力。

成露茜女士生前經常質問：為何人們習慣對強者認同，對弱者卻無所感覺？她過去所做的努力，即在試圖打破這個常規，幫助弱勢者爭取發言空間，訓練並鼓勵年輕人投入社會，讓進步的聲音得以在單一思維的政治文化中被聽

見。做為社會學家和媒體負責人，她堅持並維繫另類媒體，不向主流妥協。我們相信，她的勇氣與眼界，她所開創出

來的思想與行動空間，已是台灣社會的共同資產。

（編按：本文原發表於《台灣立

報》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七日二版社論。）

永悼六八年世代在台唯一一人

趙萬來

成露茜逝去，也逝去一九六八年造反世代在台灣的唯一子遺。

成露茜走過大彎度的人生，形成多方的面貌，但是賦予她靈命志氣的，

即是一九六八年從美國到西歐到日本等環球各頂級大學所掀起的反體制運動。

固然，也有不少台灣留學生被捲入此一時代狂飆，而今一千人皆至垂暮。回首

四十二年軌跡，證明幾乎無人領受進步主義如淪肌浹髓般，獨在Lucie身上已

化為生命的組成要素，流露為日常間言行，表現為永不言棄的意圖。

當然，這不意謂她純度百分百，但是衡量台灣近二十年的逆境，她力促社

會變革一馬當先，連生徒僚屬都望塵莫及，大呼異類，這才知道，其人精粹，

不精粹的是環境污染，要是不回台，以她青壯年在美國的行事風格，直可斷

言，她繼續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六八年世代之女，在洋人同儕或不那麼珍稀，但相較台灣留學生同儕，她是一朵絕無僅有的奇葩。

成露茜如此突出，凸顯一個事實：台灣太反動了！從六十年前到六十年後

今天，反動的根愈深、蒂愈固，所以早年出國的高等人受到進步時潮沖擊，也

只是少數人附會一時，不久也就回復本然；所以解除戒嚴後，庶民獲得解綁，

反而嚴加管戒自己。空降在這一世界反動島，成露茜注定要落空，不落空不

落寞，只得隨俗，焉知她隨俗從眾不是更深的無奈與禁抑？

永遠悼念六八年世代在台唯一的唯一一人！

（作者為大學教授）
（編按：本文原發表於《台灣立

報》二〇一〇年二月二日二版「立報左右看」。）



►二〇〇六年，舍我紀念館揭幕典禮。